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王麗斐 博士

諮商專業工作者與個案的
雙文化自我概念契合與諮商效能之關係

研究生：江曉珍 撰

中華民國一零一年六月

誌謝

感謝上天安排這份機緣，讓我在人生這階段能夠念書、交朋友、以及在學術研究的這個領域走上一回。

感謝學術界的先進們，「如果我看得更遠，是因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非常敬佩你們在學術上的耕耘。

感謝本研究所有的參與者，因為有你們的無私的分享，才有這樣的成果。

感謝王麗斐老師，總不吝給予鼓勵和肯定，豐厚的學術知識、嚴謹的研究指導，都讓我學習良多、十分受用。

感謝兩位論文口委，林以正老師提供的資料與針對研究書寫的提醒，王櫻芬老師於口試中許多建議與指教，都使我獲得許多修正論文的寶貴知識。

感謝曉芬、珮茹和雨霖，不僅是事務上的幫忙，更是我心中重要的支持。

感謝母親以我為傲，期勉的意涵、對我論文與身體的關心，讓人好感動。

感謝俊傑的體貼與包容，在我身邊一起面對生活中的挑戰，以及共同經營溫暖的家、養育可愛的女兒遇安。

感謝在論文的書寫過程、生命的交會之中，還有許多幫助我的人兒，無法一一具名致謝，但你們的好，點滴在我心頭，無盡感恩。

最後，感謝自己在這段時間的投入、磨練與享受，更期許帶著這些體驗與成長，繼續生命的路。

江曉珍 謹誌

2012年6月

摘要

本研究採以雙文化自我概念的建構反映現代華人心理特色，探討諮商專業工作者和個案各自的自我概念取向以及彼此間的契合性與諮商效能之關係。本研究邀請從事諮商與輔導之專業工作人員（女性 84 位、男性 14 位，平均 32 歲，平均專業工作年資為 4 年）及一位與其晤談三次以上的個案（女性 59 位、男性 39 位，平均 20 歲）共同參與研究。研究結果發現，諮商專業工作者和個案的自我概念對自評諮商效能之影響均達顯著，且為正向關係；在自我概念契合的部分，諮商雙方在個人取向自我概念的差異程度，對諮商專業工作者自評諮商效能有顯著負向影響，在社會取向自我概念的差異程度，則對個案評定諮商效能有顯著正向影響；以及，無論在自我概念或取向契合對諮商效能的關係模式中，諮商者評定諮商效能對個案評定諮商效能均有顯著影響。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實務與研究上的建議。

關鍵字：雙文化自我、諮商效能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tness of the Counseling Professional's and the Client's Bicultural Self-concept and Counseling Efficacy

Hsiao Chen Chiang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ttempted to reflect the Chines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modern society by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bicultural self-concept orientation of the counselor and the client and the effects of the fitness of the orientation on counseling efficacy.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included 98 counselors (84 women, 14 men, with the average age of 32 years old and the average professional seniority of 4 years) and 98 clients (59 women, 39 men, with the average age of 20 years old) who received psychotherapy from these counselors for at least 3 tim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both the counselor's and the client's self-concept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s on their self-rated counseling efficacy. In terms of the fitness of the counselor's and the client's self-concep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unselor's and the client's individual-oriented self-concept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counselor's self-rated counseling efficacy while the difference of social-oriented self-concept between the counselor and the client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lient-rated counseling efficacy. In addition, the counselor-rated counseling efficacy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lient-rated counseling efficacy in the model of self-concept as well as the model of orientation fitness. Finally, sugges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were proposed.

Key words: **bicultural self** 、 **efficacy**

目次

誌謝.....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目次.....	iv
表次.....	vi
圖次.....	v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	8
第二章 文獻探討.....	9
第一節 諮商效能指標.....	9
第二節 自我概念的內涵與相關研究.....	19
第三節 華人文化下的自我概念.....	26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9
第一節 研究參與者.....	39
第二節 模式架構.....	41
第三節 研究工具.....	44
第四節 資料蒐集、整理與分析.....	48
第五節 倫理議題.....	50
第四章 研究結果.....	51
第一節 前導分析.....	51
第二節 諮商者與個案的自我概念取向與諮商效能關係之分析.....	55
第三節 諮商者與個案自我概念取向的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之分析.....	62
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71
第一節 結果討論.....	71
第二節 限制與建議.....	80
參考文獻.....	83
中文部分.....	83
西文部分.....	87

附錄.....	92
附錄一 諮商專業工作人員版問卷.....	92
附錄二 當事人版問卷.....	96
附錄三 獨立我與互依我量表使用授權同意書.....	100
附錄四 修訂羅徹斯特社會互動量表使用授權同意書.....	101
附錄五 中國人幸福感量表使用授權同意書.....	102

表次

表 3-1	諮商專業工作者人口變項資料表	40
表 3-2	個案人口變項資料表	41
表 4-1	諮商者之性別對諮商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51
表 4-2	諮商者之婚姻狀況對諮商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52
表 4-3	諮商者之教育程度對諮商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52
表 4-4	諮商者之專業身分對諮商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52
表 4-5	諮商者之工作區域對諮商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52
表 4-6	諮商者之工作地點對諮商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52
表 4-7	諮商者之有無督導對諮商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53
表 4-8	諮商者之專業證照對諮商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53
表 4-9	諮商者之年齡對諮商效能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53
表 4-10	諮商者之專業工作年資對諮商效能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53
表 4-11	晤談次數對諮商效能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53
表 4-12	諮商者評估造成個案困擾之核心議題與獨立和相依之相關程度填寫次數與百分比	54
表 4-13	諮商者評估造成個案困擾之核心議題與獨立和相依的相關程度與各量表之相關	54
表 4-14	各量表平均數與標準差	56
表 4-15	各量表之相關矩陣	56
表 4-16	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的估計參數顯著性考驗與標準化數值	58
表 4-17	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整體適配度考驗結果	59
表 4-18	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的個別指標信度、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	61
表 4-19	諮商者與個案自我概念取向契合度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62
表 4-20	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初始模式的估計參數顯著性考驗與標準化數值	63
表 4-21	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修正模式的估計參數顯著性考驗與標準化數值	66
表 4-22	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整體適配度考驗結果	68
表 4-23	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的個別指標信度、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	69

圖次

圖 3-1 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	42
圖 3-2 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	44
圖 4-1 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標準化徑路係數	57
圖 4-2 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修改模式	64
圖 4-3 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標準化徑路係數	65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長期以來，諮商與心理治療學者企圖從治療理論的角度，取得心理治療療效的支持證據；然而不同治療理論有其不同的人性和病理觀，不僅難以取得直接證據，比較療效的相關研究，結果也未達顯著差異；及另針對特定的病理類別，比較特定的心理治療理論和介入措施的療效，也無法有一致的結論(Wampold, 2001, 2007)，因而諮商心理治療的療效因子一直被關切、但也被認為是個難以證實的謎。然而，在實務工作現場，不論是比較藥物與心理治療的效果差異(Blatt, Sanislow, Zuroff, & Pilkonis, 1996)，及安慰劑效果的檢驗設計(Baskin, Tierney, Minami, & Wampold, 2003)，或是諮商專業工作者的評估、個案的自我報告(Bike, Norcross, & Schatz, 2009)，多年來的研究資料，都支持心理治療確實對於改善個案的心理健康與生活適應有真實性效果存在(Hunsley & Lee, 2007 ; Wampold, 2007)。

諮商與心理治療效能透過諮商專業工作者（以下簡稱諮商者）對心理治療的體現，以及諮商者與個案的互動才能發揮其意義與功能，成功的治療需仰賴案主對諮商者的信任，願意朝向目標改變的合作過程，而近年的研究結果也支持這個方向，顯示諮商者的同理、溫暖與一致的態度和治療關係與療效的相關，優於治療取向的效益(Lambert & Barley, 2001)。特別是針對同盟關係對療效影響與預測的研究，更是獲得相當一致的支持，顯示治療關係是跨情境療效因子的核心(Horvath, 2001; Pos, Greenberg, & Warwar, 2009; Wampold, 2001; Zuroff, & Blatt, 2006)。Baldwin, Wampold 和 Imel (2007)進一步探究同盟關係，分析 331 位個案對 80 位諮商者的研究資料，澄清諮商者與個案兩方對關係的影響力是否有差異，結果發現諮商者的個人因素對關係的影響力較個案因素為高，並據此建議，在臨床上，諮商者應該監測自己對同盟關係的影響、善用個案對同盟關係給予的回饋；另外，Wampold (2001)也曾針對療效因子的相關研究提出批判，指出過去的研究中，統計

方法因疏忽諮商者的影響因素，導致高估了治療理論的變異量，若重新估計過去的研究結果，甚至有研究顯示諮商者所佔效果比例可高達 70%。此外，Wampold 和 Brown (2005)檢視了 581 位諮商者的 6,146 份案例資料，保守估計約有 5%療效的變異量來自諮商者。雖然諮商者所佔療效比例未有定論，但，過去的研究顯示諮商者的素質在治療效能中佔有重要地位(Blatt, Sanislow, Zuroff, & Pilkonis, 1996)。因此，Wampold (2007)認為心理治療之所以有效，並非僅是治療本身，治療關係反而是致使療效產生的關鍵因素，亦即諮商者與個案建立同盟關係的能力，被視為是更重要的關鍵；所以，Wampold 強烈建議，加強諮商者與個案建立關係的知能，將是諮商者訓練的重要課題，而諮商者與個案的人際交互作用歷程，更將是未來研究探究心理治療的重要焦點。基於此，更多探討諮商者的個人因素，以及在與案主互動時，如何影響彼此形成有效的諮商關係，實為協助澄清療效因子樣貌的重要研究方向。

所謂諮商者個人因素包括主觀與客觀特徵，客觀特徵主要為年齡、性別、種族、治療取向等，主觀特徵則為人格、價值觀、態度信念、哲學取向、治療關係等等(Beutler et al., 1994; 引自 Wampold, 2001)。許多研究指出諮商者的年齡、性別、治療經驗年資、學位等客觀特徵僅佔極小的影響程度，也就是客觀特徵並非療效的關鍵，這樣的看法在其他研究也獲得一致的支持(Bowman, Scogin, Floyd, & McKendree-Smith, 2001; Horvath, 2001; Lutz, Leon, Martinovich, Lyons, & Stiles, 2007; Jennings & Skovholt, 1999; Owen, Wong, & Rodolfa, 2009; Wampold & Brown, 2005)。因此，諮商者個人因素中的主觀特徵，恐怕將是後續研究最值得探究的療效因子項目之一。

若更詳細端看主觀特徵的項目，除了諮商者的同理、溫暖態度和諮商關係等共同因素，被證實比其他治療干預更有預測力外(Lambert & Barley, 2001)，其他項目的研究則未有一致結論；例如，諮商心理學界一致認為諮商者的「人格特質」很重要，許多研究也嘗試探索出有效諮商者的人格特質，然而研究資料豐富、卻

仍難有定論(Wampold, 2001)。國內學者廖鳳池(1994)對此現象提出解釋：他以為過去針對諮商者個人特質與諮商效果直接關連性的研究，無法獲得定論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過去研究將個人因素視為能力或人格方面的特質(traits)，然而這樣的概念與諮商者的自我(self)狀態並非同一個構念。因此，廖鳳池乃選擇從認知中介影響與自我基模理論的概念為觸發，探討諮商者在治療中的自我認知，對諮商關係與行為的影響狀況。結果支持其假設，雖然將諮商者的自我區分為一般、人際和晤談中三種型態，但透過不同的中介變項，都影響到個案的晤談感受與諮商關係，顯示自我認知是影響諮商關係和諮商行為的重要變項。

特別是，廖鳳池的研究顯示諮商者的自我，可能是過去探究療效因子中有關諮商者個人因素，重要卻被忽略的方向。自我一向被視為個人經驗彙整的中樞(陸洛，2003)，是心理學界中重要的討論主題之一，企圖了解自我的本質與自我心理歷程開展的動力，因而相關研究相當蓬勃，其中被關注最多的是自我概念(郭為藩，1972)。自我概念為人格結構中的重要核心構念，許多研究都指出自我概念和行為、生活適應、學業成就、人際關係、心理健康等有密切關係(侯雅齡，1998；郭為藩，1972)。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是諮商者以個人自我為參照工具，與個案互動的助人過程，所以諮商者的自我了解與覺察，對營造有效性的治療基礎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因而，在諮商者的個人主觀特徵中，本研究以為若能聚焦於諮商者的主觀特徵之一「自我概念」，將有助於澄清與理解諮商者個人因素對療效的影響。

所謂「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一種個人對自己系統性的了解與知識形成發展的過程中，西方心理學家認為「主體」的自我整合自身感受與行為，又能以自我視為覺察自省的「客體」，透過如此反覆的過程經驗到「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逐漸建構出自我概念的內涵，亦在其中根據生活經驗、他人互動與環境影響，了解到自己與他人的不同，將自己視為獨特的整體(陸洛，2003，2007；廖鳳池，1994)。簡而言之，對自我概念的看法強調人的主動建構、個人行動的參照架構，更強調個體自我概念的形成，脫離不了社會互動、人我關係的影響。另外，在文

化系統的觀點下，更清楚指出自我的分類深受社會因素影響，獨立或相依的文化假設差異，決定了人如何看待自我(Triandis, 2001)，相依性與獨立性自我建構，在人的認知、情緒和動機上，皆產生根本而深刻的影響(Markus & Kitayama, 1991)。總之，研究者以為社會文化的差異恐怕也深刻影響著諮商的內涵（洪莉竹、陳秉華，2005；陳祥美，2005；Sue & Sue, 2007），因此若欲清楚了解台灣本土諮商的治療效果，以及諮商者的自我概念對諮商的影響，有必要將文化因素的觀點納入。

值得注意的是，華人深受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人我關係是華人文化型塑其自我的關鍵，與西方比對之下，西方文化人我關係疏離，創造出「獨立我」的建構，華人文化人我關係交融，創造出「互依我」的構念，展現不同的價值信念（陸洛，2003）。針對華人文化的研究亦普遍發現，華人深受傳統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哲學與宗教內涵影響，在這些傳統思想脈絡與生活指導原則下，個人被鼓勵追求實現的自我是社會自我、真實自我和非我(Hwang, 2009)。因應華人文化看重關係、合諧和自我修養等內涵，個人會因不同的人際互動情境而運作不同的自我類型（陸洛，2007），對關係與信任的建構，都有別西方文化（王怡文、陳亮全、黃光國，2006），個人在求助的態度、方式和目標等，都與西方個人主義傾向殊異(Hwang, 2009)。但是，近代西風東漸、社會變遷，受到東方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潮流交互的影響，台灣社會呈現多元文化共存現象，華人的自我概念在許多研究中發現已非純然傳統的互依自我，亦非全然變成現代的獨立自我，而是逐漸化合、出現折衷自我的運作，形成一套「雙文化自我」的系統，會依涉及的互動場域或情境的合適性，運作不同社會取向和個人取向的心理特性（陸洛，2003，2007；楊國樞，2004；楊國樞、陸洛，2004；Lu & Yang, 2006）。

反應於諮商中，更容易見到雙文化自我對現代華人的影響。許多研究顯示華人案主展現許多個人自我與關係性自我的衝突，常在做自己與維繫和諧之間擺盪受苦，「關係」成為心理問題的核心（范嵐欣，2008；陳秉華，2001；陳秉華、李素芬、林美珣，2008；陳祥美，2005；曾素真，2010；趙容嬋，2010）。傳統華人

文化非常看重關係與和諧，而吸收西方文化後出現個人自我的需求，如此雙文化自我的落差與適應，自然產生許多心理問題。不過，上述研究也顯示透過諮商協助經驗到人際衝突與困擾的夫妻，增加個人自我的覺察、互動關係的了解、溝通表達，能有助自我與人我關係的協調，降低內在自我衝突，兼顧個人自我需求與關係和諧（范嵐欣，2008；陳秉華，2001；陳秉華、李素芬、林美珣，2008）；也發現透過諮商介入，個案可以在諮商歷程中釋放關係困境的壓抑情緒、獲得自我的強化，並逐漸展現在做自己與維繫關係間的協調平衡狀態（趙容嬋，2010）。總之，在雙文化衝擊下，兩取向的自我皆需要被滿足，並且在諮商介入歷程中，透過自我的強化、覺察與溝通的增加，能促進自我協調，進而逐漸達到華人心理企求的平衡和諧目標。可見在諮商工作中，西方個人主義所強調的價值，對發生雙文化取向自我衝突的個案能有所助益，但是仍必須切合華人看重關係和諧、社會秩序的文化脈絡。

但是，上述研究卻忽略華人文化對諮商者這個角色的重要影響。成長在華人文化脈絡下的諮商工作者，在自我的發展與形塑，或是在學習與應用西方諮商專業的過程，都經驗到許多文化信念的衝突（洪莉竹、陳秉華，2005）。針對台灣諮商者的諮商關係建構經驗之分析研究，在諮商目標的訂定、諮商架構的建立、關係界線的劃分、諮商者的角色定位、自我表達和語言的使用等方面，都出現文化衝擊，需要轉化所學西方理論的思維（許雅惠，2009），更有研究顯示雙文化取向的價值觀明顯影響助人工作者的專業判斷（王叢桂，2004）；也有研究針對本身接受心理治療的諮商者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受訪者成為個案後一樣呈現許多華人傳統性格，如重視權威、努力維繫諮商關係和諧、對自主權與自我揭露的焦慮（葉寶玲，2010）。簡言之，雙文化自我的現象，除了直接反應在個案的自我狀態與心理問題，對諮商歷程與關係的發展，以及諮商者這個角色也造成明顯衝突，因此，研究者認為以雙文化取向的自我構念反映現代華人的心理特性，才能更澄清諮商者與個案的自我概念對療效的影響作用，增加對華人諮商療效特性的了解。

在相關研究方面，雖然有研究顯示獨立我能預測台灣民眾的主觀幸福感，互依我則與幸福感無觀(Lu & Gilmour, 2004; Lu, Gilmour, & Kao, 2001)，不過，更多研究以現代性與傳統性的相關內涵，探討對個人的幸福感、心理適應上的影響結果尚無一致的方向與模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人際關係中，研究結果卻大致支持雙方在心理特性配對的型態差異，影響人際的關係品質與心理感受（高旭繁、陸洛，2006；張依君，2009；張詩音，2007；陳芬憶，2001；陸洛、翁克成，2007；陸洛、高旭繁、陳芬憶，2006）。據此，考量華人文化脈絡與雙文化自我對人際關係有密切影響，也呼應 Wampold(2007)所強調諮商雙方人際交互作用的重要，顯示研究除了探究諮商者與個案各自雙文化自我的表現情形與諮商效能的關係外，似乎也必須同時關注諮商者與個案不同取向自我的契合程度對雙方人際互動的影響。

進一步分析上述人際關係研究，雖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之不同，但仍可大致歸納出契合度佳的關係品質與心理正向感受相關，其次，若雙方心理特性的差異形成愈符合華人文化所重視的家庭、男性、權威等有上下階層的關係特性，即上位者有較高的傳統性，較容易造成下位者的負面影響，相反地，若下位者能知覺到上位者有較高的現代心理特性，則較易帶來正向感受。基於諮商關係並非具有階層特性，且研究顯示建立在維繫關係和諧的目標脈絡下，個案接受諮商能有較多對個人自我的看重，進而能夠重新檢視人我關係狀態、學習以較平衡的方式兼顧兩取向的需求（范嵐欣，2008；陳秉華，2001；陳秉華、李素芬、林美珣，2008；趙容嬋，2010），顯示諮商雙方自我的契合、諮商者促進或表現個人取向自我可能與諮商效能有關。再加以從諮商歷程視之，研究者認為互依我是在華人看重關係與和諧的文化中孕育而生，諮商初期時應與雙方諮商關係的正向知覺有關，但是帶著人際困擾的個案求助諮商，也即希望於諮商中長出自我的力量，以面對與調整人我關係的衝突，因此諮商關係必須展現不同於傳統階層關係的特性，以及諮商者協助個案增進獨立我的覺察、個人的自主成長，才能發揮諮商的助益；因此，

研究者積極推論諮商者與個案的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自我概念表現可能與諮商關係中的正向知覺均有關，不過，在人際互動作用中，諮商雙方個人取向自我概念表現的契合度，可能更有益於諮商效能。

此外，若欲反映華人內在心理狀態與真實的治療效果，恐怕在研究工具的選取，亦需注意對本土化的契合。已有研究顯示文化具有強大的力量影響人對自我的建構、如何思考快樂和應付生活中的困難，因此不同的社會文化形塑出人如何獲得幸福與心理福祉的不同意義(Lu, 2008)；Vasquez 與 Texas (2007)的研究更指出文化差異會干擾工作同盟的建立。因此，在選取治療效能指標的測量工具時，本研究擬採取已被證實為測量治療效果良好指標-「工作同盟」(Horvath & Greenberg, 1994)做為依變項之外，考量華人文化脈絡下，顯示人際情感常為關係親疏的判斷與行為依據，以及華人偏好心理內在的安適與和諧之兩項特性，因此亦增納對關係親密感、中國人幸福感的評估作為指標，而且研究者認為，若能藉此初步探究本研究中諮商效能指標的相關情形，亦將是本研究具有意義的貢獻。

綜上所述，治療關係是目前治療效能較清楚的預測因子，而諮商者的個人因素主觀特徵對諮商關係與療效的影響有其重要性，但其影響的作用途徑仍待澄清了解，因此，本研究特別選定個人主觀特徵中核心主題之一：自我概念，探究諮商專業工作者的雙文化取向自我概念之強度表現狀態，以及與諮商效能的關係；再者，從人際交互作用的研究角度，初步探究諮商者和個案雙方的自我取向契合度，對晤談情緒感受與諮商關係的相關情形。

第二節 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欲探究的問題如下：

- 一、諮商者的自我概念取向狀況，與諮商效能的關係為何？
- 二、個案的自我概念取向狀況，與諮商效能的關係為何？
- 三、諮商者與個案的自我概念取向的契合程度，與諮商效能的關係為何？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在說明本研究諮商效能指標之選擇，並納入華人文化信念為選擇考量之探討。第二節探討自我概念的內涵，以及敘述國內相關研究的成果與省思。最後，第三節著眼於中西文化差異，進一步探討華人文化下的自我概念內涵之特性，說明雙文化自我取向的構念內容與相關實徵研究成果。

第一節 諮商效能指標

本節將介紹本研究採取的效能指標項目，並納入華人文化信念對諮商效能影響的探討，以說明選擇的原因。

一、諮商效能與諮商關係

多年來的研究資料，都支持心理治療確實對於改善個案的心理健康與生活適應有實徵性效果存在(Hunsley & Lee, 2007; Wampold, 2007)。其中，Lambert 和 Barley (2001)的研究指出諮商者的同理、溫暖態度和治療關係等共同因素，被證實比其他治療干預更有預測力。端看近年對於諮商效能的研究結果，顯示諮商關係是跨情境療效因子的核心，對於正向的諮商成效有顯著且實質的貢獻，特別是針對工作同盟（working alliance）對療效影響與預測的研究，更是獲得相當一致的支持(Beutler et al., 2004; Horvath, 2001; Horvath, Flückiger, & Symonds, 2011; Horvath & Greenberg, 1994; Horvath & Symonds, 1991; Pos, Greenberg, & Warwar, 2009; Wampold, 2001, 2007; Zuroff & Blatt, 2006)。

工作同盟的概念源自心理動力學派早期的文獻，後來普遍被接受為諮商關係的重要因素之一（張娟鳳，2001），研究工作同盟的先驅之一 Bordin (1979) 認為個案如果經驗到和諮商者有正向的工作同盟，則較可能產生成功的治療效果，他定義工作同盟的內涵包括了三個向度：首先是個案與諮商者之間發展出的情感連結（bond），經驗到彼此間正向的情感依附、信任與接納，再來是雙方對共同建立出來的治療目標（goal）有所共識，以及雙方對治療過程中所需達成任務的同

意程度，亦指對任務的共識 (task)。此定義因涵蓋了諮商雙方在工作關係中的內在感受、外在的認知與行為表現，因此被廣泛採用 (簡華奴，2007)，Bordin 所提出的工作同盟模式也獲得很多學者支持 (Horvath & Greenberg, 1994)，國內的相關研究也都採用該理論架構與研究工具 (張娟鳳，2001)。而後，多個針對工作同盟的相關文獻進行的後設分析或回顧，也都指出目前的研究清楚顯示工作同盟與治療效果之間有穩定的相關，且不受其他變項影響，也不受評定人員改變 (Horvath & Symonds, 1991; Horvath, Flückiger, & Symonds, 2011; Martin, Garske, & Davis, 2000; Orlinsky, Ronnestad, & Willutzki, 2004)。因此，工作同盟一直被視預測治療效能的良好指標。

此外，關於工作同盟的研究也都指出諮商初期工作同盟的形成，對之後諮商的發展與正向效果具有關鍵的影響 (Horvath & Greenberg, 1994; Horvath & Symonds, 1991)。初期工作同盟，通常指前三次諮商會談，諮商者與個案之間所形成的工作同盟就已達到某種穩定狀態，所評定的工作同盟即可以預測後期的諮商效果 (陳斐娟，1996；張娟鳳，2001；Horvath & Greenberg, 1994; Horvath & Symonds, 1991)。另一方面，部分研究仍認為個案對工作同盟的知覺與評定比諮商者的評定對諮商效果更具有預測性 (Horvath & Symonds, 1991; Orlinsky, Ronnestad, & Willutzki, 2004)。

綜上所述，本研究擬採工作同盟作為評估諮商效能的指標之一，又因本研究欲探討諮商者與個案的關係契合度，且 Bordin (1979)對工作同盟的定義本質為諮商者與個案雙方間的感受與共識，因此本研究採邀請諮商者與晤談三次以上之個案，分別評定對工作同盟的知覺。

二、華人文化下的關係親疏與情感成分

工作同盟被西方心理學界普遍接受為諮商關係的重要因素之一與良好的預測效能指標，但是，能夠反映受東方傳統文化影響的華人內在心理特性與其諮商關係嗎？

已有研究指出文化差異會干擾工作同盟的建立 (Vasquez & Texas, 2007)，文

化差異形成相依性與獨立性自我不同的建構，而相依性自我被視為與周遭環境互動的、或與他人有關連的自我，不論是表達、情緒的經驗以及動機，都會考慮與他人的關係(Markus & Kitayama, 1991)。而華人文化即為強調關係取向的社會，儒家倫理的核心更是一套人際關係與人際互動的規範，關係現象呈現豐富的內涵與獨特性，是探討華人文化中重要議題之一（陸洛，2003；黃光國，1988；楊國樞，2004）。受到傳統文化與儒家思想影響，華人常以自己為中心，將他人依親疏遠近分成幾個同心圓，用不同的標準對待和自己關係不同的人（費孝通，1948）。因此，人際關係更被視為是一種情感型態（鄭伯璜，1999）。

在華人的文化脈絡下，楊中芳和彭泗清（2005）認為人際情感與人際關係之間關係密切，兩人將中國人的情感細分為義務性的既定情感「人情」，如依據人倫或對社會既定關係類別所期待的應該有的情感，以及自願性的真正情感「感情」，具有兩人之間自發的、沒有理性算計的性質；雙方依據交往場合的目的與需求進行互動，彼此人情滿足是發展兩人關係的信任基礎，而當超越了此基本互惠的預期，感情成分才會增加，而感情層面的進展是關係深入發展的關鍵。黃光國（1988）進一步提出人情與面子的概念，說明華人會用不同的交易法則和關係不同的人交往，關係網絡內的人屬於情感性關係，以需求法則互動，例如家庭內的每一個成員都應該為家庭盡力、而家庭也應當提供他生活所需，但是，關係網絡外的人屬於工具性關係，則使用公平法則，例如店員與顧客，雙方交往以達成自身目的；特別的是，網絡內外之間還存有混合性關係，具有多寡程度不一的情感與工具性質，例如親戚、鄰居、師生、同事等，諮商關係亦歸屬於此，彼此認識且有一定程度的情感關係，但又不夠深厚到隨意表現真誠行為，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這類關係具有時間的延續性特色，必須藉著人與人時常往來加以維繫，即交往雙方以一種將來可能會以關係內情感性交往的預期，而使用給予人情與面子等方式來影響彼此的關係距離感。

「人情」在中國文化中具有多種意涵。簡單而言，可以是中國社會中人們相處的社會規範；也可以是人與人進行社會交易時，雙方用來餽贈彼此的一種資

源，因此人情不僅是具體的物品或服務，而且包括抽象的情感；在情感方面的涵義則指個人遭遇到各種生活情境時，可能產生的喜怒哀樂等情緒反應，因而通曉人情，在西方心理學的概念中，也即具有同理心的意思，可以喜其所喜、哀其所哀，所以華人使用的人情法則相當複雜（黃光國，1988）。綜觀這些理論，均指出華人文化的獨特特性深刻影響人際間關係的判斷與互動，華人重視人際關係的情感成分與人情資源，以其作為劃分親疏程度與情感表露、互動行為等之判斷依據，換言之，人情的運作與知覺，亦是改變關係親疏、進入真誠感情交流與互動層面的關鍵。

而以上關於華人重視人際關係與交往的情感因素，與社會心理學探究社會互動轉化為人際關係歷程中所談的「親密感」(intimacy)，有異曲同工之意涵。社會心理學有關人際關係與社會認知判斷的認知歷程研究，強調關係是個人對自身行為與他人反應等經驗的主觀詮釋，透過日常生活中自發性的社會互動，轉化為人際關係，其過程中「親密感」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林以正、黃金蘭，2006）。Reis 及 Shaver(1988)將親密感視為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間的動態歷程，意指關係親密感的形成歷程，始於人際互動中的一方，表達內在的情感或訊息，另一方又能回饋出適當的反應，意即表露者能感受到另一方充分了解、誠心關懷，在這個過程中，隨著時間發生愈多的自我表露與回應，可增進雙方的了解，將有效的降低關係初期的不確定感，而且研究指出適當的回應可以維持互動的和諧性、鼓勵自我表露、增強喜歡與信任感；因此，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皆是關係親密感形成的重要因素與預測因子（引自林以正、黃金蘭，2006）。

林以正和黃金蘭（2006）亦於國內研究驗證 Reis 和 Shaver(1988)的理論，其以修訂羅徹斯特社會互動量表（Rochester Interaction Record, RIR）記錄大學生的社會互動、以 Q 分類法測量人際親密感，結果顯示參與者的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在時間橫斷面上與關係親密感具顯著相關，在時間縱貫面上更具有顯著穩定性與預測力，特別是知覺同伴回應對親密感更有獨立且穩定的預測效果；此外，該研究亦請受試者對喜歡、信任、對關係的確定感、內外團體區辨等進行同

樣的分類作業，結果顯示親密與信任的相關為 0.75、親密與自己人的相關為 0.79、信任與自己人之間的相關為 0.75，顯示三者概念仍存有差異，但確實有高度相關性。

至此可知，親密感是社會互動轉化為人際關係的重要基礎，是關係親疏程度的關鍵，與華人文化所談的人情滿足程度涵義相似，意即要被華人視為關係網絡內的「自己人」，必須改變混合關係中情感與工具性質的比例，增加情感、降低工具，雙方必須有一定的人情滿意或關係親密感。所以關照雙方互動中的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兩因子的情形，應是探究關係品質、是否成為「自己人」或靠近網絡內的重要依據。

對照諮商關係呢？研究指出華人對「信任」的建構分為根植於血緣與情感認同的關係網絡內信任，以及基於習俗、專業與利益計算的關係網絡外之社會信任（王怡文、陳亮全、黃光國，2006），然而，華人的際困擾，多源自原生家庭際衝突所產生的親情困頓，以及人情交易複雜性所帶來的人情困境等問題（黃光國，1988）。可見轉離關係網絡內信任而尋求諮商協助的初始，尚僅奠基於社會信任基礎，要真的產生諮商效果，仍必須厚實信任程度以進入情感交流的層面。也因此多項研究發現華人的治療情境裡，治療者常必須要滿足個案的期待，讓病人覺得諮商者是專家、有經驗的角色，慢慢有「自己人」的感覺，才能取得病人的信賴與合作，帶出更多自我袒露（洪莉竹、陳秉華，2005；許雅惠，2009；曾文星，1996）。此外，許雅惠（2009）以質性方式研究台灣諮商人員諮商關係建構的經驗發現，諮商者知覺諮商關係的內涵與西方一致，都強調開放自在的氣氛、雙方主動積極的投入與厚實的信任基礎，但是，在不同的諮商階段，諮商者知覺良好諮商關係的指標則有所差異，諮商初期的指標包含有個案願意持續且依照約定時間來談、願意開始談論自身相關議題、在談話的語調與姿態等非口語訊息的表達上較自在；諮商中期的指標包含個案願意自我袒露個人深入的議題、願意聚焦於一個議題深入討論、在諮商關係中配合度增加；在結束階段指標則包含個案可以諒解諮商的限制、對於諮商者感到感謝，以及個案將諮商關係視為長久

的關係。從以上的研究可以發現諮商歷程中，諮商關係開始於對專家角色的社會信任，但在此混合關係中帶著情感性交往的預期與人情法則互動，因此諮商者營造出良好的互動氣氛有助個案逐漸增加「自我表露」的深度，而諮商者的同理心表現，讓個案「知覺到諮商者的回應」進而形成「關係親密感」，達到求助諮商的目的、獲得「人情」滿意，而同時真正的「感情」感受也逐漸增加，因而對雙方進入「關係內」的進展判斷下，自願地表達情感、願意合作與改變，諮商工作因此能朝向正向發展，此歷程確實符合上述所討論華人人際交往模式的特性。

另一方面，人際關係的交往模式亦常以依附理論的觀點解釋。「依附」是嬰孩出生後的第一個人際關係，尋求與依附對象接近是一種主動的、情感性表現，而依附的功能在於提供舒適、安全、保護的堡壘，可以讓嬰兒自在探索內外世界，因此，依附具有非常強烈的情感成分，安全堡壘（secure base）更是 Bowlby 與 Ainsworth 發展依附關係理論的重要核心概念（葉寶玲，2010）。但是依附理論被廣泛討論，更是因為關注到嬰兒早年的依附相關經驗發展，會類比為記憶中的基模或腳本，以一種內在運作模式表徵出來，尤其是在壓力情境下更容易被激發，是一種安全與保護之動機行為系統、認知和情感性的基模，不僅對自己會形成一組看待自己價值感與能力感的信念，更是形成對他人與世界知覺與關連的基礎，不過，個人一生中的依附模式並非線性發展，不同的發展階段可能尋求不同的依附對象，因而隨著時間進展有不同的依附經驗，形成依附模式的變化（Sroufe, 2005）。換言之，先前依附互動的期待，情感、信念歷史，可以預測自我與他人的行為，以及未來可能的人際依附關係發展。而以依附理論作為基礎的心理治療研究相當多，但近來有關研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學者提出人際解釋機制的概念，強調依附轉移到成人，不只是與照顧者互動累積的經驗，而是一種經歷新經驗的機制、一種在心理上對經驗、資訊、情感分享的能力，亦分別指對壓力反應與控制的能力、維持專注的能力、解釋自己與他人心理狀態的能力，並藉由個人的人際策略，保持與他人間最佳的心理距離（Fonagy & Target, 2002）。簡而言之，依附可以說是一種人際關係的形成歷程與重要因素，具有強烈的情感成

分，依附理論強調的安全感，更是探索與建構自我、世界與人際關係的起點。

而在諮商關係上，諮商者也具有類似案主安全堡壘的功能，對案主而言，與諮商者之間的情感連結，就彷彿是依附關係的再現(Farber & Metzger, 2009; Pistole, 1999)。且在此概念下，Farber 與 Metzger (2009)說明了案主與諮商者依附關係發展的假設性指標，即提到首先在依附之前的階段，案主會尋求接近一個更有能力協助他解決困擾與痛苦的諮商者，並依賴其內在運作模式來了解諮商者的行為；第二階段形成依附，案主與諮商者發展出依附關係，會將諮商者當做安全的堡壘，思考安全的程度，以探索自己的脆弱與失敗，可是諮商者接納與支持其坦露，創造出安全的氛圍，讓案主在信任下探索自己新的存在方式、經驗到與其需求一致的關係；第三階段則為清楚劃分的依附階段，案主會知覺到與諮商者分離，渴望在談話期間見諮商者、有強烈情感需求，感到被拋棄或背叛；最後為調整目標的夥伴關係階段，指嬰兒隨著發展逐漸能忍受與主要照顧者分離，有能力延後滿足，並內化依附對象，在諮商關係上，則是安全感建立後，案主減少過度依附行為，開始可以把焦點放在困擾問題。此外，研究亦證實案主的依附類型會影響案主對治療的真實關係的知覺(Marmarosh, Gelso, Markin, Mallery, & Choi, 2009)和工作同盟的建立(Goldman & Anderson, 2007; Sauer, Lopez, & Gormley, 2003)。因此，案主亦以自己內在的依附模式與諮商者建立關係，可以發現依附感所帶來的人際互動和心理分享能力，相似於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於關係親密感形成的動態效應，而案主的袒露是基於對安全感的判斷，其實與上述所討論諮商關係中所需的關係內情感成分或關係親密感，作為治療的信任基礎與進入工作階段的關鍵，並無二致，而且可以發現案主的揭露與對諮商者如何回應的知覺，對依附的形成和探索的發生有重要影響，意即無論自我表露與知覺回應，或安全感與探索間，實是諮商中一體兩面的表現。

整理上述，除了證實情感因素對諮商效果的重要，更一再顯示華人個案對諮商既定關係中人情互動的法則，與西方工作同盟關係的內涵有所不同。諮商與心理治療原來自西方文化，諮商關係對華人文化而言，屬於人際關係的特殊型態之

一，所以華人的諮商關係，與西方諮商專業的概念中雙方互動為維持平等與工作契約上的單純性質恐怕不同，因而台灣諮商工作者在建立諮商關係的歷程中，可能需要納入更多情感因素的考量，以判斷良好諮商關係的關鍵，也就是在於個案能將諮商者視為關係內的一員，足夠的信任、與對關係進展的判斷下，個案才能有真正的情感流露與行為表現，因為安全而能放心探索。因此，若諮商關係是療效的核心(Wampold, 2007)，那麼了解華人建立關係的關鍵：情感（或稱「人情」）投入的程度，亦謂關係親密感，恐怕是探究華人諮商療效的重要方向之一。

此外，親密感理論包含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兩大因素。在諮商關係中，前者，不只國外研究顯示自我表露與關係、信任的建立發展有正向關係(Baxter, 1979; Collins & Miller, 1994; Cozby, 1973; Derlega, Metts, Petronio, & Margulis, 1993; Stricker & Fisher, 1990; Wheelless & Grotz, 1977)，以及研究參與者在日常社會的互動中，表露正向生活事件與正向情緒經驗，最能夠預測其主觀幸福感(Gable, Reis, Impett & Asher, 2004)，國內研究也顯示諮商者與個案皆認定自我表露屬於諮商進展的正向重要事件（陳斐娟，1996），因而，個案自我表露的內容與深淺，是諮商者知覺良好諮商關係的指標之一（許雅惠，2009）；後者知覺同伴回應，亦類似個案知覺諮商者同理心之經驗感受，關於諮商者的同理心，研究指出具有安全依附的諮商者有較佳的同理心，促進與個案的情感連結、提供足夠的安全感，因此可建立工作同盟的形成(Pistole, 1999)，研究也多指出在諮商歷程能促進個案的自我覺察、袒露與反思，可以幫助個案有更健康的心理功能(Bachelor, 1988)，同理心、溫暖和治療關係等共同因素，也被證實比其他治療干預更有預測力(Lambert & Barley, 2001)。另一方面，親密感與人際適應及心理健康具有極密切的關聯，研究證實社會互動中的親密感，是決定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Reis, 1984; 引自林以正、黃金蘭，2006)。最後，關於研究方法的部分，林以正和黃金蘭（2006）研究也指出以結構式、日記式記錄作為社會互動的測量，相較於一般自評量表要求參與者針對某時間段落所發生的經驗提供主觀的整體評估，可以更具體的描述實際社會互動，降低可能的誤差。因此，基於華

人的「人情」難以直接測量、國內尚未建立適合工具，所以本研究欲增加關係親密感的測量工具，並且為契合華人關係建構歷程的特性，擬透過對雙方互動的記錄與評估作為依據，探究與反映諮商關係品質是否達到「關係內」的親密感程度，並假設關係親密感愈高，諮商效能愈佳。

綜上所述，華人的關係具有情感成分決定親疏關係的特性，而在社會互動中發展關係知覺，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是親密感歷程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擬以關係親密感作為諮商關係品質的依據，評量諮商者與個案互動情形與感受，以期能夠較全面的評估諮商關係品質，也就是以社會互動量表作為諮商關係的測量指標之一。

三、華人文化下的幸福信念與諮商效能

文化除了影響人際關係的交往模式與影響因素，文化強大的力量，影響人對自我的建構、如何思考快樂和應付生活困難的行為，不同的社會文化形塑出人如何獲得幸福與心理福祉的不同意義(Triandis, 2001; Lu, 2008)。毫無疑問地，判斷問題與健康與否，必須將個案放置於社會文化背景下來檢視(Ibrahim, 2001)。因此，心理健康與文化信念密切關連，欲反映華人內在心理狀態與真實的治療效果，實須納入文化因素的觀點。

西方心理學將主觀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與心理治療聯結，視為反映個體心理健康的指標，亦為對自身生活滿意程度的評價，是一種個人內在正向的心理狀態，近年更是正向心理學領域的重要議題(邢占軍, 2005; 陸洛, 1998)。不過，在跨文化的研究中發現個人的主觀幸福感受到所成長的文化背景與社會環境因素，呈現部分不同的文化內涵 (Lu, 2005)。李怡真 (2009) 研究就發現華人文化偏好的情感幸福，是一種個體體驗到內在的平靜與安適，與歐裔美人所強調正向情感為快樂興奮、追求單純享樂情緒的方式不一樣。

Lu (2005)整理中西方關於主觀幸福感的相關研究文獻，歸納出現在「幸福」的一般定義為正面的優勢超過負面影響，被視為整體的生活滿意度，而且幸福的特徵是一個朝向更好的概念，而不是短暫的情緒狀態。但是根據文化差異的觀

點，研究一致認為西方文化重視獨立的概念，幸福的內涵也較強調自主責任、能力表現、正向情感等，因此獨立自我透過整體自尊獲得幸福感，相反地華人文化重視相依的概念，主觀幸福感的理解是履行個人義務與維持動態平衡，相依自我則以與他人相融和諧的人際關係為幸福來源（陸洛，1998；韓貴香，2003；簡晉龍，2003；簡晉龍、李美枝、黃曬莉，2009；Lu, 2005, 2008）。可見，文化除了直接形塑幸福觀的內涵，也透過建構出不同的社會取向和個人取向自我觀，以及藉由不同的機制調控個體追求幸福時的感受、想法和行為，影響其擁有社會取向和個人取向的主觀幸福感(Lu, 2005, 2008)。簡而言之，幸福感與心理健康、正向情感的意義密切關連，並具不同的文化內涵，華人對情感和幸福的認定與反映，偏受其關係狀態的影響，更偏愛和諧等內在感受。

另外，相關的研究也指出，台灣社會東西文化交織於生活中，個人的主觀幸福感亦有東、西方文化並存的現象（高旭繁、陸洛，2006；韓貴香，2003；簡晉龍，2003；簡晉龍、李美枝、黃曬莉，2009；Lu, 2005, 2008）。因此，東西方文化各有其對幸福的獨特觀念與意涵，當成長過程中吸納多元的文化因子，現今個人對主觀幸福感的偏好與追求也展現出兼具現代與傳統的雙文化取向現象。

而在雙文化自我的脈絡下，韓貴香（2003）和簡晉龍（2003）的研究都發現個人有不同強度的相依我與獨立我的自我概念，其間的差異能預測其對不同生活向度的滿足所帶來的正、負向情感感受，例如自我概念為「高相依／低獨立」者，其與相依我相關的生活向度滿足狀況，能預測其正負向情感感受。另外，簡晉龍、李美枝、黃曬莉（2009）則分析雙重自我在追求幸福感時，其路徑與中介因子的異同，其分析結果也驗證了相依自我透過與重要他人的關係和諧，也可以提昇自我價值，進而產生幸福感，與獨立自我獲得幸福感的路徑有匯合之處。此外，國內針對關係契合與人際適應情形的研究也都採用中國人幸福感量表作為心理狀態或情緒感受的正向指標（張依君，2009；陸洛、高旭繁、陳芬憶，2006；陸洛、翁克成，2007；韓貴香，2003）。因此，研究者認為個案對幸福感的評定，應能呈現其在諮商歷程中，其個人的內在心理狀態。基於以上探討，本研究也將個案

對幸福感的評定納為諮商效能的指標，並採取契合本土化的幸福感測量工具。

總而言之，呼應 Pedersen(2000)指出元文化必須同時對文化的普同性和獨特性進行考量，本研究擬同時採取同盟關係、同理心與中國人幸福感作為評定諮商效能的指標，並以諮商者與個案雙方皆評定同盟關係和關係親密感兩項指標、個案增加自評主觀幸福感的方式，期望對諮商效能進行較完整的了解。另一方面研究者認為，若能藉此初步探究本研究諮商效能指標的相關情形，亦將是本研究具有意義的貢獻。

第二節 自我概念的內涵與相關研究

本節主要在探討自我概念的內涵，包括自我的意義與功能，以及自我概念的性質、結構和發展，並介紹國內相關研究成果的整理與省思。

一、自我概念的內涵

自我 (self) 長久以來就是哲學、神學探究的對象，而心理學的辭典統上中，self 一詞若與其他詞彙結合，將構成數以百計的複合名詞，如自我實現、自我接納等，形成特定的概念 (張春興，1989)，可以窺見自我的意義與應用之廣雜。西方心理學界對自我的研究，從十九世紀起持續有 James、Baldwin、Cooley 等知名心理社會學者提出相關的討論，精神分析理論中亦有不少自我的分析，到新佛洛伊德學派崛起與社會自我論調學者 Mead、Moreno 等加入，自我心理學日益受到重視，尤其受現象學與存在論的影響，Allport、Maslow 和 Rogers 等心理學家更擺脫行為學派與精神分析學說的生物論點局面，以主觀-知覺的方法探究自我理論，形成心理學上的第三勢力，因而自我概念的探究一直是行為科學的重要題目 (郭為藩，1972)。

不過自我的定義，也在多種派別的學者看法下，發展出不同的定義解釋。最早為美國心理學的建立者 William James (1892)提出的定義：「自我是自己所知

覺、感受與思想為一個人者」，指出自我應包括「認知的主體」(I-self)與「被認知的客體」(Me-self)，前者是純粹的自我，個體是能經驗、知覺、選擇、記憶和計畫的主體，具有自覺與控制行動的主動性；後者則是經驗的自我，認為自我是將自己當成其他事物般的客體對象來知覺與評價，也是由一切與自己有關的物質、社會同伴的認可和心理力量所組成的結果（引自郭為藩，1972）。James 的貢獻是將自我分為主體我和客體我雙重性，這個看法深刻影響之後學者對自我概念的探討，成為西方自我心理學研究的典範（郭為藩，1972）。

大致而言，傳統精神分析學派探究的「ego」與「主體我」意義較為接近，強調協調內在需求、決定行為、適應外界是一組心理過程，這些意識被認為是自我的表徵，因此自我是行動的主體（郭為藩，1972）。新佛洛伊德學派的學者則加入更多人際關係和環境的互動作用的探討，Sullivan 將自我視為是反覆成長發展的自我組織（self system），形成的關鍵則是重要他人的評價，自我組織會因焦慮感的不舒服經驗，而將重要他人否認、排斥的部份排除於意識之外，因此簡要來說他人評價的整體就是自我組織（劉琨輝，2001）。

而自我心理學派，如 Rogers 所討論的自我則傾向客體我（self），指個體對自己的主觀知覺與態度，亦即自我概念的意義，自我是一種形象，也是個人認定或知覺的客體對象（郭為藩，1972）。其實 Rogers 的自我理論引發廣泛的評論，他強調個人所經驗的世界是以自己為中心的現象場（phenomenal field），整個知覺場的一部分會逐漸分化為自我，個人行為並非客觀或外在刺激決定的，而是憑著對場的知覺決定反應，因此發展過程中，個體會表達出自己的經驗，也攝取重要他人的價值觀與評價，形成自我概念，和環境他人互動的結果若與自我結構一致，就會形成穩定且適應的人格狀態（劉琨輝，2001）。

另外，社會學家 Cooley (1902) 提出了的「鏡中自我」(looking glass-self) 的看法，指出自我概念是一個人與他人互動之後，個人想像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並且評估別人對此形象的評價所形成的自我感，而人傾向爭取別人的好感（引自郭為藩，1972）。Mead 則認為 Cooley 論點中的他人，應該是「概括化他人」

(The generalized other)，是許多他人及整個周遭社會的共同態度，除了肯定社會決定因素外，還進一步提出在不同環境下，個體可能會形成不同自我概念的看法（郭為藩，1972）。綜上所述，可以瞭解到自我概念的性質為個人在生活過程中與環境（特別是他人，即重要的人際關係）交互作用而逐漸發展成有組織的態度，完全是個人主觀認定，雖不等於客觀事實，卻是個人所知覺和經驗到的主觀真實，亦是個人行動的參照架構，可知自我概念是探究個人行為的重要基石。

國內學者郭為藩（1972）在其著作「自我心理學」中也提出整理，他認為自我概念的結構大致包括三部份：對自己身體及生理需要的認定為「軀體我」、對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所擔任各種角色的認定為「社會我」、以及對某些信念、意願和價值體系的認定為「心理我」。而這三個自我的層面也分別代表自我概念的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軀體我的萌芽，稱為「惟我中心期」，當嬰兒八個月大左右不僅在知覺動作有顯著的進步，也開始發展出物體恆存的認知能力，從此開始代表著嬰兒逐漸脫離主體與客體的未分化狀態，隨著身體成長，對自身軀體的認識增加外，也開始有「他人」的觀念，到三歲左右算是成熟，此時兒童會用「我」這個字來稱呼自己，行為反應僅基於生理需求，認知思維方面也呈現出與外界的關係，是屬於自我本位的。當兒童逐漸開始社會生活，就進入了三歲到青春期間的第二個階段，個體受到社會文化、團體意識、角色認定等影響，使自我的心理內容客觀化，完成社會我觀念的發展，因此該階段又稱「客體化期」。期間個體透過各種教育意識到且瞭解自身的各種角色，例如性別角色、家庭角色、同儕角色、學校角色等認定，學習各種角色的表現，並在其中獲得情感、愉悅，以及自我形象的認識，行為更逐漸與社會準則取得一致，此階段個體對各種人際關係中的隸屬感和自我肯定的需要特別明顯。第三階段為青春到進入成年這段約十年的時間，稱為「主觀化期」，著重心理自我的成熟，個體隨著身體外觀與內在生理劇烈變化、想像力與抽象思考能力活躍發展，以及面臨升學、就業、婚姻等生涯的問題抉擇，將促使自己不斷反思自我觀點，架構一套心理我的個人價值體系，具有理想化自我的觀念傾向，是個體吸收了社會文化的精神價值等素材消化

組合而成為評量事物的準則，因此價值體系也是個人行為主觀化的基礎，個人行為、生活目標皆依此參照架構而表現。

郭為藩的看法彙整了人格與社會心理學的概念，如客體關係發展理論、角色理論、社會學習理論等討論，不僅對自我概念的結構性有完整的說明，也清楚的敘述各階段發展重點與影響因素。而 Shavelson、Hubner 和 Stanton (1976, 1985) 回顧相關研究後整理自我概念的特性，認為自我概念的多層面性反應著不同的自我參照系統，並具有階層、認知結構性、穩定但又在不斷發展中、能描述和評價自我，而且概念間又有區別性等特徵（引自趙曉美，2001）。雖然西方心理學史中不同的學者對自我概念的定義內涵和研究時的分類層面並沒有絕對的共識，但是多數傾向以客體我為探究對象，對自我概念的重要性和主觀性看法仍是一致。

簡而言之，我們可以瞭解到自我的發展必須透過個體與他人持續的互動，自我概念是個體對自身經驗的知覺和解釋之結果，會受到他人評價、增強和行為歸因的影響，也顯示社會因素對自我概念形成的重要。據上述討論，可以發現自我概念是一種個人對自己系統性的了解與知識，是一切心理歷程的起點，更與個人日常生活各種表現密切相關。

二、國內自我概念相關研究整理與省思

為詳細探討「自我」，社會心理學家楊中芳（1991a）整理了港、臺兩地所有關於自我概念的實徵研究。以下國內自我概念相關研究成果的敘述將以其整理架構為主，兼採其他研究補充說明：

第一類是以自我為知覺對象的研究成果，楊氏認為這個以西方心理學為基礎所下的自我概念定義，其內涵已包括了自我認定（self-identity）、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和自我評價（self-evaluation），香港與台灣兩地的相關研究大多由此概念出發，也有相當多的成果。接著將這些研究成果概分五個主題簡要說明：（一）在探究自我概念的特性上，自我認定分數最高、自我行動次之、自我滿意最低，多數研究大致得到相同的結果，楊中芳認為這樣的結果應與華人文化價值體系的態度有關。（二）自我概念的發展研究上，則發現自我概念與年齡

的關係結果相當不一致，因此未能定論，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可能是研究工具與對象不同所導致（趙曉美，2001）。（三）在發展影響因素的研究中，則發現多數研究結論較為一致，若學生自覺父母親對自己為關懷寬容等正面態度，及父母老師對自己的期望與自己對自己的期望一致，都和自我概念有穩定正相關，但是楊中芳也提出此類知覺評定方法易造成假象結果，甚且仍無法確認兩者的因果關係；（四）自我概念與學業成績的關係研究上，也得到相當一致的結果，即自我概念與智力與關、與學業成就的正相關並不穩定，不過有學者進一步整理西方相關研究，則認為學業成就與「學業自我概念」有交互影響（趙曉美，2001）。（五）最後，自我概念與其他行為的關係研究方面，包括人際關係、人格特徵、精神病症、犯罪行為與生活適應的相關，大致能獲得自我概念良好者，焦慮情緒較低、內控信念較強的結果，楊中芳認為這個結論仍僅印證西方量表背後對自我概念良好的定義，而且不能排除受試者社會讚許或自我防衛的可能性，另外也發現到回顧此類的研究相當雜亂，顯示自我概念這個研究領域被應用的廣泛性與非系統性。

第二類的自我研究，則將自我視為有自覺性、會主動控制外界環境的研究，此定義下的研究重心是自我對自己行動的支配與控制方面，回顧此類的研究較少，分為四方面說明：（一）自我基模：有關自我瞭解對行為所造成影響的研究不多，雖然結果都顯示對行為具有預測性，但都為實驗操弄設計。（二）自我注意：有關自我意識的研究部份，發現中學生無法驗證西方理論所提之公我與私我兩因素，作者也質疑另外的大學生受試對象所得結果能夠驗證，是因為就讀心理相關科系接收到西方注重個人本身特性的概念，另外，國內有對大學生進行西方檢校理論的驗證研究，結果顯示國人自我檢校的程度確實較高，最後是自我表現的相關研究，則大致顯示不同面子情境下，自我表現的行為並無差異。（三）自我投入：研究主要為探討行為是否依照自己的意志去做的程度，探討自我揭露的部份研究不多，但發現自我揭露的意願，與不同的人際關係、話題、關係集體傾向有關；探討自控知覺的研究部份，則大多以 Rotter 的控制理論（locus of control）為基礎，且集中再做中西方人的比較，或自控知覺與其他變量之間的簡單線性關

係討論，但是楊中芳認為所回顧多數的研究結果，既不能支持是家庭教養或社經程度的結果，也不能支持它是學業成績的原因，太過依賴西方理論而無法切實瞭解中國人的自己控制；再者為自我肯定方面的研究，研究發現自我肯定性高越高者，社會焦慮和非理性想法越低，自信、自尊、人際關係和自我情感表達則越好，而男女在不同情況表現程度也大致無異，研究成果某個程度上肯定西方的理論；探討內在承受應付壓力的自我強度部份，研究支持刺激忍受力弱的人比較會感受到生活的壓力，但在其他中介變項與應對行為方面的研究未有結果。最後，(四)自我防衛的研究方面，楊中芳整理相關研究試圖回答自我研究量表中的測謊題，是一種自我防衛的表現或是社會讚許需求高，還是一種自我批評的表現，而研究回顧後，楊中芳認為一般的測謊題或自我批評量表，要測量的因素可能隨著樣本的不同而改變，對正常樣本而言自我批評量表較屬於測量自我概念強弱，但對非社會讚許的對象時，自我批評量表的表現則有自我防衛的傾向。

回顧了港、臺有關自我的研究之後，楊中芳（1991a）以本土化研究精神的角度與實用層次提出對這些研究的反省，認為雖然自我研究的數量增加許多，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它們有幾項共通點，如測量工具多是將西方的工具加以編譯使用，且所有的研究都是採取問卷調查法，作答時間長且受社會讚許需求影響，應用這些工具來探測西方理論是否適用於港臺華人身上，另外研究對象常侷限校園學子，不僅易有偏差，也使得結果難以推論，尤其是研究理論也常依賴西方心理學的概念，非源自本土樣本的實際行為特徵的觀察，翻譯名詞意義常混淆，以致於研究概念流於抽象化，也讓研究內容失去本土精神，無法有較多層面的研究構想。楊中芳（1991a）將多年來研究進展的空白，歸因於缺乏本土化自我理論脈絡的預設，使得相關的實徵研究，最明顯的就是那些研究成果多為以相關統計分析結果作研究後的解釋，因此對於華人「自我」的文化內涵與生活形式的變化便少了實質的探究，無法反映出真實的社會現象。

事實上，在西化心理學有關自我概念的認識下，廖鳳池（1994）從認知中介影響與自我基模理論的概念為觸發，就曾研究過諮商者在諮商中的自我認知，對

諮商關係與行為的影響狀況。其結果發現諮商者自我認知可分為三種，其中的「人際」自我認知以「諮商關係」為中介途徑，而「一般」及「晤談中」自我認知則透過「諮商策略」為中介途徑，影響個案的晤談感受。該研究結果的意義，即無論何種途徑或自我認知，諮商者的自我認知皆會影響到個案的晤談感受，也初步支持了諮商者的自我概念對諮商效能有正相關的推論。因此，研究者認為，若能增加文化因素的探討，更符合華人文化自我概念特殊性的考量，應能擴充廖鳳池（1994）的研究結果。

綜上所述，自我概念是一種個人對自己系統性的了解與知識，也是行為表現的參照架構，與生活適應、心理健康狀態關係密切，自我的研究在人格、社會、認知等心理學領域探究中備受關注，在臨床心理學應用上的重要性也顯而易見，是認識個體重要的主題之一，在西方心理學的討論中已有多年、豐碩的成果，亦吸引眾多國內學者投入探究，但因為對自我所持之定義不同，研究重點亦有所偏重。另外，社會文化的差異與自我的型態關係密切(Markus & Kitayama, 1991)，自我的發展奠基於個體如何知覺與他人互動的結果，深受社會因素的影響，使得在推動本土化心理學運動的學者反思下，國內符合本土化精神有關自我的實徵研究即顯得有所不足。因而，欲瞭解國內人們的自我主觀知覺、經驗與行為現象，或是在本研究中，奠基於廖鳳池（1994）已證實諮商者的自我認知對諮商關係與行為有顯著影響的研究發現，再加上從文化角度切入探討，才能更清楚瞭解台灣諮商工作人員的自我概念對諮商效能之影響，如此本土化脈絡的思考不僅重要且顯得特別必要。因此，下一節將由本土化心理學的精神為開端，據此概念討論華人文化下自我的特殊內涵。

第三節 華人文化下的自我概念

本節主要在探討本土化心理學研究的必要性與其意義，並探討中西文化差異下，華人自我概念的內涵，藉此說明本研究根基於雙文化自我取向構念的原因，與相關實徵研究成果。

一、本土化心理學研究的意義

翻看西方心理學史，美國的實驗心理學和心理測量學可說是對世界最具有影響力的主流心理學，直到 1970 年代學者們慢慢發現兩大問題，一是過於忽視複雜的認知歷程之分析，二為過於忽視文化對心理與行為形成的影響，進而出現了「認知革命」與「文化革命」，前者促成了認知心理學的發展，後者即引發了跨文化心理學、文化心理學和本土心理學的研究浪潮(Yang, 2000)。在現實世界中，美歐等西方國家挾其經濟軍事的影響力，對非西方國家的文化、學術和教育都產生了宰制性影響，其中當然包括社會科學中的心理學，但是，各種西方的理論、概念、方法與工具遷移套用，卻無法完整深入且精緻地理解所研究的當地人們之社會現象，反而得出虛假的知識（楊國樞，2005a）。而黃光國（2005）更以建構實在論的觀點說明在某特定文化中生活的人，有一定的生活形式與語言，表現出各種思想和行為，指出心理學研究的任務便是建構各種理論或模型來描述它們，依此認為心理學的本土化是理所當然且必要的發展。

楊國樞（2005a）認為非西方心理學者創立自己的本土心理學即是對西化心理學的反彈，是一種重要的學術運動，希望建立更有效認識當地人的心理學知識體系，研究歷程中所採取的理論、概念、方法及工具，必須與本土心理或行為現象與社會文化脈絡高度契合，才能更有效地預防與處理個人適應和社會群體問題。因此，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等學者於 1976 年起開始提倡華人心理學中國化（Sinicization）運動，至 1986 年配合國際之間的使用法，改以本土化（indigenization）取代中國化(Yang, 1999)，並調整推動的工作策略，多年來的努力讓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化運動漸有成果，而整理近二十年來的研究成果，大概有

52 個不同的重要課題，分屬五大研究領域，其中以人格與社會心理學最多，其次為組織與管理心理學、發展與家庭心理學、臨床與諮商心理學，最後為異常與犯罪心理學（楊國樞，2005a）。

接著，微觀自我研究的部份，楊國樞（2005a）將臺灣探討有關華人自我的研究，分為西化研究期（1973 至 1990）和本土化研究期（1990 迄今）兩階段。前階段的研究成果部份，即為上一節有一定篇幅介紹的楊中芳（1991a）針對港臺相關研究的回顧；而第二階段的研究主要是「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下有關華人自我研究的第三個分計畫「自我歷程、自我概念、及自我評價」，為楊國樞等十名學者參與的研究團體所完成的研究，該分計畫具體實踐本土化的研究策略，建立了相關理論、概念、方法及工具，成為華人自我研究的基礎（楊國樞，2004）。為清楚理解該理論架構與相關實徵研究成果，以下將先循華人文化脈絡探討華人自我的內涵，再加以說明。

二、文化差異與華人文化下的自我概念

大多數研究在探討文化差異時，常將文化分成兩大概念：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分別有不同的自我、價值和行為的導向(Triandis, 2001)，而且在跨文化的研究中，顯示自我分類深受社會因素影響，文化的假設將決定人們如何看待自我(Markus & Kitayama, 1991)，不同的文化，會對「自我」產生一種該文化特有的想法、信念及行為實踐（陸洛，2007）。在自我的發展中，研究顯示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人，社會生活型態與價值強調個體主義，將自我視為與情境無關的、持續的性格歸因（稱為「獨立的自我建構」），重視自己內在特質，認為行為是受自我內在特質影響的主要結果；相反的，非西方文化下的社會生活型態與價值強調集體主義，人們將自己視為社會中關係的一部份，自我較重要的部份是公開的，因此要尋求與他人的合諧一致（稱為「相依的自我建構」），在此經驗與認知下，決定自己表現出來的想法、情緒和動機，以及自己如何與他人互動(Markus & Kitayama, 1991)。簡而易見，「自我」的研究確實不宜直接套用西方心理學理論。

回歸到文化脈絡中，多數學者皆認同華人深受儒家和傳統社會文化影響，形塑出獨特的自我觀與人我觀（陸洛，2003；黃光國，2001；費孝通，1948；楊中芳，1991b；楊國樞，2005b；Ho, 1995；Hsu, 1985；Hwang, 2009），也分別從此觀點提出其論述或理論。最先解析華人自我與社會關係特徵的是費孝通（1948）提出「差序格局」概念，他發現中國人常以自己為中心，將他人依親疏遠近分成幾個同心圓，用不同的交往法則對待屬於不同圓圈層次裡的人，對不同人界線又隨情境而伸縮，可以由行動者自行解釋與分割，說明了華人社會關係以「自我」為中心、以人倫作為構成關係網絡的原則、網絡具有伸縮性的三個特性，顯示華人自我與社會關係緊密。學者 Hsu(1985)亦認為西方心理學對性格的看法，是將人視為獨立的個體，但華人自我與社會文化緊密，因此無法全然解釋華人自我的特性，進而提出「情境中心取向」的概念，認為華人重視依據自己在群體中的身分做出合宜的表現、傾向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群體性質，追求一種與他人互動時人際關係的動態平衡，其更以心理社會圖（psychosociogram）來表達人存在的概念與人覺察社會情境的意識狀態，包含前意識、潛意識、未表達的意識、可表達的意識、親密的社會文化、運作的社會文化、較大的社會文化的七個層面，前四層即為傳統的性格概念，但 Hsu 認為對華人而言，人的存在並非性格的展現，而是一種與他人互動、文化的存在，因此應以人們與社會最緊密影響的四層面：未表達意識、可表達意識、親密的社會文化和運作的社會文化，作為探究華人自我的介入點。

楊中芳（1991a, 1991b）指出華人非常重視自我，是理想社會的達成工具，但是其重視與西方人並不一樣，因為在傳統儒家或中國哲學理念下，「社會」藉由人倫關係把「個人」組成一個緊密、有層次的結構，使得人與人之間有不同緊密程度的關聯，個人的行為也必須這個關係脈絡中，依著對他人所背負的責任與義務來行事，社會的秩序與和諧依賴每個人的「自我修養」，所以中國人的自我發展已經由「個己」轉化到「自己」與「社會」融為一體，也可說是一個不斷追求進步、走向道德至善的過程，與西方文化認為「社會」是由一個個平等、自由、

獨立的個體所組成，社會的秩序依賴「個人」控制，追求的是個別的幸福，兩種是很不一樣的價值體系。同樣說明儒家文化、五倫關係對傳統華人的社會行為本質的影響，Ho(1995)認為角色決定了個人的行動，進而個人重視關係認同，個人也就由重要的關係所界定，此「關係性自我」(relational self)會高度意識到他人的存在，也因人我界限無清楚劃分，自我認同深受關係認同影響，且儒家文化強調重視自我反省、要控制私心而為他人著想、透過與他人關係的和諧達到自我體現。雖然同樣認同儒家文化與倫理對中國人有深刻影響，但黃光國(2001)卻不同意Ho關於中國人的自我與他人關係密不可分的看法，認為中國人的自我仍有主體性。黃光國(2001)綜合多年以建構實在論為基礎的研究成果，提出儒家關係主義的建構，將人視作「社會的代理人」，並用「人情與面子」模式說明中國人會依社會關係處境與人際法則的不同，展現各種行為反應與衝突化解模式，用以維護心理平衡與實踐社會道德秩序。

一樣強調關係對華人自我的重要影響，陸洛(2003, 2007)也認為中國人關注的「自我」層面與西方人不同，中國人的「人我關係」界定顯現了自我的內涵，亦即人我關係才是文化型塑自我的關鍵，西方文化人我關係疏離，創造出獨立我的建構，但是華人文化人我關係交融，創造出互依我的建構，此建構強調了互依共生、角色責任、道德修為與順應環境的自我觀特徵。而楊國樞(2005b)以社會互動角度的觀點提出論述，認為傳統華人社會，在適應日常生活的方式偏向社會取向的類型，個體融入或配合社會環境生活的不同層次，有很不同的互動特徵或內涵，依華人日常社會生活最核心的四大互動場域，構成了華人社會生活的主要部份，特殊的互動方式形成四種對應的取向，因此楊氏將社會取向又分為四類次取向；第一類即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單位--家族，個人在認知、感情和意願上皆深受影響，形成一套以家族為重、個人為輕的心理行為傾向；第二類為權威取向，受歷史影響，中國傳統都是實行父權家長制，甚至延伸至君權的專制，導致人們不僅對於情境、關係中的權威存在非常敏感，亦對權威無條件的崇拜與依賴服從。

第三類為關係取向，傳統中國文化強調以人和人的社會關係來界定自己的身分，如「我是某某的兒子」，實際上也是以關係界定自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為五倫關係：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君臣，長期文化演化出一套五組的社會關係劇本，要求每個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守本分，甚至必須隱藏很多個人的特徵，融入可被對方、家族及社會接受的角色活動，意即人在面對不同的關係或社會情境，其態度與行為也會跟著轉換，因此傳統中國人在社會互動歷程中，是以外在社會情境為重心，強調「角色一致性」，而不是西方以自我意向為重心所稱的「自我一致性」。關係取向的影響，讓人非常重視關係中對偶角色的互惠，除了實質物質性的互惠，最特別的則是精神性的部分，中國人善用人際資源，利用人情、面子，達到相互回報的關係平衡。另外，中國人還存有「緣」這樣的宿命觀以強調關係的命定性，務求維護關係的和諧，以達穩定社會秩序，進而安定家族生存。不過，社會中不同的關係有其不同的親疏程度，決定了不同的人際互動的方式，大致上可分為家人、熟人和生人三大類型，各自產生不同的對待原則、互依型態和人際互動效果，例如熟人關係類型，即若互動良好，則導致有條件信任與喜好之情等正向情緒，如互動不好，則產生恥感、焦慮、敵意等負面情緒，並採合理化、自衛性投射等因應方法。

第四類是他人取向，所謂他人泛指非特定對象的他人，該取向是一種中國人在心理上希望在他人心留下好印象、行為上努力與別人相一致的強烈傾向，對他人的意見非常敏感，以求獲得贊同、避免責罰，整理他人取向具有顧慮人意、順從他人、關注規範與重視名譽四種運作特點，以致於傳統中國人極易受到他人系統影響而改變自我系統，進一步更形成對他人的公己與對自己的私己兩個自我層次，來因應自我系統的穩定和言行不一致的內心衝突。

顯然的，社會取向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的主要互動方式，影響形塑出社會取向的人格特質，但是近年來經濟與社會變遷劇烈，受到現代化、西方文化的影響，個人取向的互動特徵與內涵逐漸增加，但轉變的過程中，現代化的文化內涵出現或增強的速度並不一致，傳統化的文化內涵改變或衰退的速度也不都一樣，

傳統的思想觀念和行為仍有部分被保留而非完全被取代，亦即現代與傳統並非完全對立，因此逐漸發現當代華人心智系統中，個人取向和社會取向的內涵會同時並存與化合，個人同時擁有的不同強度的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之自我概念，在不同的生活範疇中，表現出自己心理和行為上的不同的現代化和傳統化程度（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2001；楊國樞，2004）。之後陸洛（2003）提出「折衷自我」（composite self）的構念，描述出生活在台灣的華人採取彈性的人我關係界定，用來處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間衝突的適應方式，並且兼顧個人「獨立性」與人際「關聯性」雙重需求，進而將這樣的全新自我系統以「雙文化自我」（bicultural self）稱之（陸洛，2003，2007；楊國樞，2004；Lu & Yang, 2006）。

綜合上述華人學者的看法，可歸納出學者們一致同意基於社會文化的差異，華人自我與西方心理學的自我有不同的特徵，皆認為華人自我與「關係」緊密，以自我為中心，形成有層次但界線彈性的人我關係，從另一角度來看，關係決定了自我的展現，也影響了個人對自我的了解，因此當文化中十分強調維持社會與關係的和諧，就會發展出許多極具華人特色的人際互動方式與自我觀念，如克己復禮、人情面子、緣的信念、情境中心、高度容忍公我與私我不一致等，所以華人自我的表現不像西方心理學所談之一致與獨立性，而有多面向、隨情境改變與互依的特性，但仍具有主動與自覺性。而且，也因華人自我對社會環境與他人評價非常敏感，自我可謂位於一種持續變動中的發展歷程，為適應社會變遷、東西方文化交流頻繁，現在的華人自我為整合傳統華人關係中的自我與西方獨立性的自我兩種需求，已發展出一種雙文化自我的內涵，也因根基於此，本研究欲以雙文化自我的實際現象，分析與了解諮商者與個案自我的表現狀況。

此外，研究者整理相關文獻後發現多數內容常以華人「自我」作為探討主題，而不特別強調「自我概念」，不區分其差異。不過，文獻亦指出任何有關自我的建構都一定包含自我概念，自我概念才能看到具體的對自己狀態的描述、關注客體我，反映不同場域的自我知識（陸洛，2007）。依此看法，研究者認為為更符應諮商情境之場域，了解其間個案與諮商者雙方的自我狀態，應聚焦於「自我概

念」，才能有更清晰具體的答案。

三、華人自我四元論與相關研究

在現今華人已具有雙文化的心理特性概念下，華人學者亦陸續針對華人特殊的自我內涵與人我關係等議題進行本土化的研究。同時，楊國樞（2004）彙整多年來本土化心理學對於自我研究的結果與看法，依據其華人社會取向的理論為基礎，建立「華人自我四元論」，以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為概念統合來說明自我的各種表現，依場域區分社會取向，原包含關係取向、權威取向、家族（團體）取向、及他人取向，楊氏將權威取向與關係取向合而為一，加上個人取向，合為四個次級客體我，而華人的自我系統以一個主體我發揮高度的主體性、連貫性和一致性之心智與行動的施行者，將次級自我統合為一個整體的客體我。除了以自我場域的界定，區分出關係取向、家族（團體）取向、他人取向、及個人取向四種客體我外，楊國樞（2004）繼續再將自我概念分為實際、理想、應然、可能四個部份的自我層次，以及再依自我狀態的不同分為公開與私密兩類自我概念，形成三度空間架構的華人自我概念三面模式、三十二種複合類型，楊氏認為它們是相互分離、互斥但卻不一定是窮盡的。

所以，楊國樞（2004）發展的「華人自我四元論」是以「個人取向/社會取向」的概念來說明華人自我的種種表現，例如自我概念、自尊等，較貼近的也是對客體我的解析。因此，研究者採用該理論對「整體的自我概念」的定義：主體我對客體我所獲之知識與所做之推論的總和，而以上自我概念，會依涉及的互動場域或情境的合適性，運作不同社會取向和個人取向的心理特性。

華人自我四元論發展至今已有數項實徵研究驗證（陸洛，2007；楊國樞，2004；楊國樞、陸洛，2004），有關華人「自我歷程、自我概念、及自我評價」的研究計畫成果中，亦有多項相關研究，以下分成三類簡要說明如下（楊國樞，2004）：第一類為華人自我歷程的研究，有探討社會互動中如何適當或有效呈現社會取向自我的歷程與方式、分析社會取向中關係取向在人際心理差序格局的影響，以及分別從自我肯定歷程、自我評價維持歷程、虛假獨特性、及自我設限行

為等方面證實社會取向自我與個人取向自我的差別，還有探究在成敗情境與公私條件配合下狀態自尊之增減的社會取向反應模式，最後，以焦點團體研究發現華人之折衷我的存在，共有八項較相關的實徵研究，研究結果呈現了社會取向自我在社會互動與自我呈現的重要性，更展示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自我的並存、差異與融合的事實。

第二類為華人自我概念的研究成果部分，則有對於自我概念差距與情緒的關係研究，針對不同取向和自我層次的概念編製了「華人真實自我概念量表」、「華人理想自我概念量表」、「華人應然自我概念量表」，對台灣與大陸兩岸的大學生與成人收集資料分析，研究結果除了對華人自我四元論提供了直接的實徵支持，亦以本土化的方法驗證了不同自我的差距與引發不同的情緒之關係。探討自我實現者的心理特徵部分，已編製出兩套華人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理特徵量表，與兩套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理特徵量表。另外，韓貴香（2003）和簡晉龍（2003）有關自我概念的研究也發現相依或獨立性的自我與其相關生活需求的滿足，皆能對正負向情感感受、情緒表現、主觀幸福感具有高預測性。第三類為華人自我評價的研究部分，分別有就社會取向自尊與個人取向自尊從事概念分析，編製出「華人多元自尊量表」，以及針對幸福觀進行相關的概念分析，編製出「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幸福觀量表」，兩項皆成為本土化測量的良好工具。

楊國樞（2004）表示上述有關華人「自我歷程、自我概念、及自我評價」的研究計畫成果，大致證實了華人自我四元論對當代華人同時具備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兩種自我的基本假設，且部分研究也證實除了兩種自我的作用不同外，原生的社會取向自我的影響仍大於個人取向自我。簡晉龍、李美枝和黃曬莉（2009）針對台灣民眾進行問卷調查，分析結果也支持上述雙文化兼具，以及原生社會取向影響較大的看法，甚至該研究顯示獨立與相依兩取向自我的表現都有偏高的趨勢。

四、諮商領域與關係契合相關研究

有鑑於華人自我的特殊性與本土化研究的必要性，心理治療領域在這股潮流

中也沒有缺席。諮商治療過程中容易出現個人與社會取向自我相衝突的言談、情緒和行為等，自我衝突對生活與人際互動的影響，是相當值得研究的主题（楊國樞，2004），因此近年來吸引許多學者投入，以華人文化脈絡角度思考，探究諮商實務工作經驗中的相關現象議題。例如，曾素真（2010）研究發現女性在情感關係中，出現相較於現代西方心理特徵還多的傳統華人心理特徵，影響關係中自我的展現，主導著女性的情感、想法與行動。另外，趙容嬋（2010）研究發現華人看重關係維持的必要性和好我形象的建立，並在成長歷程與社會經驗中，學到以和諧為重的信念，因此常在「做自己」與「維繫和諧」之間擺盪受苦，不過個案在兩者協調之下，因理解的增加、互動關係與自我的改變，最後歷程能達到內心的安頓平衡。因此，陳秉華（2001）從多年諮商實務與研究中，提出「協調我」的概念，指出現代社會多元的價值與衝擊中，能夠達到心理健康與社會適應良好的人，即是能在人我關係中，不斷覺察個人自我與關係的自我，與兩者不斷協調的歷程，以達兼顧自我需求的滿足與維持社會和諧的目標。范嵐欣（2008）續以人我關係協調模式與華人自我四元論為基礎，介入與探討夫妻衝突的諮商改變歷程，研究結果發現協調初期除了關係衝突之外，也有個人自我的衝突，同時，協調目標仍以關係為重、照顧對方的自我需求為次，歷程中會透過「內在自我協調」和「夫妻關係協調」兩種動態歷程，以及與外在環境的交互影響而達成，該研究也提出了文化角度的詮釋，認為傳統華人文化對現代夫妻仍具有影響力，夫妻間傳統性與現代性心理特徵的差異會帶來衝突，但也可以帶來影響與改變。此外，陳秉華、李素芬和林美珣（2008）針對伴侶關係中自我協調的歷程進行紮根分析，研究結果也與上述類似，發現個人同時在自我面向增加自我覺察與溝通表達、在關係性自我面上增加情感關係的覺察與溝通表達，會有助於促進自我協調、增加對自我與關係的滿意。可見，雙文化取向的自我皆需要被滿足，兩者的平衡和諧仍是華人心理企求的目標，而覺察與情感仍是改變的起點，啟動調整的感受與行動。

以上研究，顯示個案確實因個人與社會取向自我的衝突，產生許多心理困擾

而求助諮商，如此受文化脈絡影響的歷程與問題，是諮商者必須看見與理解的，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取向的落差帶來自我內在與關係的衝突，此形塑出問題的關鍵，卻也是改變的介入點，因此研究者以為，諮商與心理治療工作若能透過諮商者的理解、以及協助個案增加對自我與關係有更全貌的理解與調整，將能走上在失衡中朝向平衡的改變歷程。但是，上述研究卻經常忽略「諮商關係」變項，特別是華人文化對諮商者這個角色的重要影響。

事實上，雙文化取向確實對諮商者有明顯影響，王叢桂（2004）在價值觀這個議題，針對在處理家暴事件的情境下，探討助人工作者的和諧價值觀與個人取向價值觀兩傾向程度對專業判斷的影響，該研究除了發現助人工作者個人本身的價值觀與其專業判斷相關，傳統和諧價值觀仍可以預測受過歐美專業訓練的助人工作者的行為決策、給受暴者的建議，該研究更發現重視個人成長價值觀的助人工作者不如預期支持受暴者離婚，分析後發現華人專業助人工作者的自我概念深受和諧價值觀與社會規範影響，對自我的定義，仍重視關係中他人的看法，對自我獨立成長的期望並非完全像是西方的重視自我，而是可以透過建立家庭與人際和諧以達到個人成長的目標。王叢桂（2004）的研究結果呼應前述人我關係協調的相關研究，兩取向自我需求均需兼顧與平衡，才是理想的狀態（范嵐欣，2008；陳秉華，2001；陳秉華、李素芬、林美珣，2008；趙容嬋，2010），也支持楊國樞（2004）的整理，顯示兩種自我的作用不同外，原生的社會取向自我的影響仍大於個人取向自我，但後者與葉寶玲（2010）研究發現卻稍有不同。葉寶玲（2010）進行有關諮商者接受個人心理治療後的改變分析，結果發現受訪的諮商者呈現出個人狀態下的自我與關係狀態下的自我兩者均衡的現象，諮商者的個人狀態自我仍有華人傳統克己的性格，且指出心理治療中的諮商者除了關注個人自我之外，還有受關係影響下的自我，特別是接受個人心理治療後，更傾向獨立自主的個人自我。這樣的結果似乎與王叢桂（2004）的研究發現，以為助人工作者較受到本身社會取向影響的結果不太相同。這樣的差異可能來自研究問題的差異，也或許是因為社會環境又有改變，或是心理治療的本質會促進個人取向自我的增強，或

諮商者對自己的期許和工作中的表現兩者之間有差異所致，不過這些皆需有更多的研究探究才能理解，不過無論如何，諮商者自我取向的表現與衝突，恐怕是影響諮商效果的重要變項之一，值得未來研究繼續努力。

至於國內研究雙文化自我對自身適應與感受的關聯，以及在人際配對中，取向的契合度與關係品質的相關情形，長期跨文化的研究顯示，獨立我能預測台灣學生和民眾的主觀幸福感，但相依我則與幸福感無關(Lu & Gilmour, 2004; Lu, Gilmour, & Kao, 2001)；張詩音(2007)研究發現對不同關係對象想要表現之情緒，受到個人文化傾向、性格及關係品質之影響，而且影響程度不一，其中，對老師及認識的人之情緒表現，主要取決即於關係品質的好壞；陳芬憶(2001)研究親子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孝道的契合與幸福感的關係，結果顯示親子的雙文化取向與孝道內涵、觀念上皆有顯著差異，父母的傳統性高於子女、子女的現代性高於父母，且差異與幸福感達負相關；但是，後續陸洛、高旭繁和陳芬憶(2006)的研究結果卻獲得不一樣的發現，除了發現心理傳統性、現代性和孝道觀念明顯改變外，該研究結果顯示在親子對偶關係中，雙方的心理傳統性與現代性對自身的幸福感均無關，但明顯受到彼此孝道觀念影響。

此外，高旭繁和陸洛(2006)研究針對夫妻配對調查，發現夫妻雙方在心理傳統性與現代性特質的契合，會影響其婚姻適應與心理感受，其中丈夫整體傳統性高於妻子、妻子整體現代性高於丈夫，雙方的婚姻適應較差；以及，陸洛和翁克成(2007)針對台灣碩士研究生，探討其與指導老師的師生心理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契合情形，對其關係互動品質與學生心理福祉影響的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知覺到老師的現代性是唯一能預測良好的師生關係品質的有效因子，除此之外也發現學生的傳統性會減低其正向感受，但良好的師生品質能提高其正向感受；張依君(2009)則以職場中的個人與組織的關係為對象，發現傳統性與現代性心理特徵對於個人和組織契合度、職場關係品質及幸福感，皆有部分顯著正向影響，其中傳統性越高會降低員工的幸福感，但契合度和關係品質對幸福感有正向影響。

分析歸納以上配對研究，發現他們多採取楊國樞、余安邦和葉明華(2001)

發表的個人現代性/個人傳統性心理特徵概念與測量工具，研究結果確實可以發現華人雙文化的心理特性對個人的生活適應帶來廣泛影響，且雙文化取向心理特性的程度差異、雙方的契合情形，皆影響到不同人際類型的關係品質與情緒感受，關係品質與情緒感受之間為正相關，雙方取向愈契合，則關係品質愈佳、正向感受也愈高；此外，雖然目前研究以現代性與傳統性的相關內涵，探討對個人的幸福感、心理適應上的影響結果尚無一致的方向與模式，但是，分析上述人際關係研究，雖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之不同，但仍可大致歸納出，若雙方取向差異形成愈符合華人文化所重視的家庭、男性、權威等有上下階層的關係特性，即上位者有較高的傳統性，較容易造成下位者的負面影響，相反地，若下位者能知覺到上位者有較高的現代心理特性，則較易帶來正向感受。

另外，簡華姣（2007）直接針對諮商關係，探討華人文化脈絡中諮商者的反移情處理能力，以及受到孝道信念與順道行為的影響為何，結果支持諮商者的反移情處理能力會直接和透過焦慮影響其與個案知覺的工作同盟，而相互性孝道信念也會直接影響其所知覺的工作同盟。簡華姣的研究中，對反移情處理能力的定義與測量包含自我覺察、自我整合、焦慮處理、同理與概念化技巧五個要素，結果也驗證了反移情處理對諮商關係的影響，個案仍可以敏感地知覺到諮商者隱微的情緒狀態，藉此推論，諮商情境中，社會取向自我與個人取向自我的衝突，除了發生在諮商者的個人內在，或其與個案的契合，都有可能引發焦慮感、產生反移情等，對諮商關係造成不利。

總之，越來越多研究指出諮商者貼近華人案主的社會文化脈絡，才能建立良好的諮商關係，增加理解與促進諮商的進展（陳祥美，2005；許雅惠，2009）。但是，研究者好奇諮商者在諮商中是否存在與覺知內在自我的衝突？又若社會取向自我傾向較多的諮商者遇到了在關係衝突中想追求獨立自主的個案，又或相反，個人取向自我傾向較強的諮商者遇到了重視關係和諧、社會取向自我明顯的個案，會發生什麼事呢？個案能否在諮商初期就知覺到諮商者的同理而建立良好的諮商關係嗎？無論如何，至此可見不僅求助者，助人工作者在工作情境中的表

現，確實深受雙文化自我取向之影響。具有本土化概念的自我覺察，以及省思專業學習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激盪，都是諮商者必須面對的問題與重要功課，也促使研究者欲以雙文化自我為題進行相關的實徵研究，以獲得更多資料佐證，提供諮商實務參照。

綜上所述，本研究擬探討諮商雙方（諮商者與個案）各自的雙文化自我取向以及彼此間的契合性如何影響諮商效能，因此具體的研究問題大致可以界定為以下三類：（1）諮商專業工作者的社會取向和個人取向的自我概念的表現狀況，與諮商效能的關係為何？（2）個案的社會取向和個人取向的自我概念的表現狀況，與諮商效能的關係為何？（3）諮商者與個案的自我概念取向的契合程度，與諮商效能的關係為何？總之，本研究結果將能提供更多資訊，以澄清諮商雙方個人主觀因素中「自我概念」對諮商效能的影響，也以具有文化意涵的自我概念構念與療效指標，增加對華人諮商療效特性的了解，並能以本研究結果提供諮商專業工作者對自我和諮商關係的覺察更務實之依據。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有五節，第一節描述研究參與者特性，包括諮商專業工作者及與其晤談之個案。第二節說明本研究架構的諮商雙方各自的自我概念取向及其契合度與諮商效能的關係之理論模式。第三節介紹本研究使用之測量工具。第四節敘述資料蒐集與分析過程。第五節說明研究倫理議題之處理。

第一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邀請諮商專業工作者與其個案配對參與研究，茲針對研究參與對象之情形分別說明如下。

一、諮商專業工作者

本研究以全台灣各地從事成年個案諮商工作的專業工作者為對象。其範圍包括：諮商心理與輔導等相關系所碩三以上碩博士研究生，高中職和大專院校之專、兼任輔導老師，以及社區諮商機構與個人執業之諮商工作者。

在本研究中，共有 98 位諮商專業工作者參與研究（詳細人口背景資料如表 3-1）。其中女性佔大多數，有 84 位（86%），男性有 14 位（14%）；且以未婚者居多（ $n=67$; 68%）。教育程度以具碩士學歷者最多（ $n=48$; 49%），其次為碩三專職實習生（ $n=32$; 32%）。專業身份以具有執照之諮商心理師最多（ $n=41$; 42%），其次為學校輔導老師（ $n=27$; 28%），再其次為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 $n=23$; 23%）。工作區域以北部最多（ $n=46$; 47%），其次為東部（ $n=23$; 24%），再其次為南部（ $n=22$; 23%）。工作地點以學校機構最多（ $n=93$; 95%）。在督導與否部分，以無接受督導者居多（ $n=51$; 52%）。在專業證照方面，以有專業證照者居多（ $n=64$; 65%）。諮商與心理治療專業工作者的年齡分佈於 23~53 歲間，平均年齡為 31.52 歲（ $SD=6.91$ ），專業工作年資分佈於 0~27 年間，平均專業工作年資為 4 年（ $SD=5.43$ ），平均督導時數為 0.54 小時（ $SD=.71$ ）。

表 3-1
諮商專業工作者人口變項資料表

		人數(N = 98)	百分比 (%)
性別	男性	14	14
	女性	84	86
婚姻狀況	未婚	67	68
	已婚	30	31
	離婚/分居	1	1
教育程度	學士畢	14	14
	碩士生	32	33
	碩士畢	48	49
	博士生	3	31
	博士畢	1	1
專業身分	諮商心理師	41	42
	輔導老師	27	28
	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	23	23
	其他	7	7
工作區域	北部	46	47
	東部	23	24
	南部	22	22
	中部	7	7
工作地點	學校機構	93	95
	其他	5	5
督導	無	51	52
	有	47	48
專業證照	無	34	35
	有	64	65
	心理師	42	43
	教師	17	17
	其他	5	5

二、個案

參與本研究之個案需年滿 16 歲，性別不拘與晤談議題不拘，且與上述之諮商專業工作者當面晤談達三次以上，經由諮商者邀請後，同意自願參與。

在本研究中，共有 98 位個案參與研究（詳細人口背景資料如表 3-2），平均年齡為 19.84 歲（ $SD = 3.91$ ），以女性為主（ $n = 59; 60\%$ ）；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

生為最多 ($n=47; 48\%$)，其次為高中職生 ($n=28; 29\%$)。職業身分以學生最多 ($n=92; 94\%$)。晤談次數以 5 次最多，佔 12%，其次為 7 次，佔 11%，再其次為 4 次，佔 10%，平均晤談次數為 9.21 次 ($SD=7.05$)。主訴議題以自我探索最多 ($n=19; 19\%$)，其次為人際關係 ($n=19; 16\%$)。

表 3-2
個案人口變項資料表

		人數($N = 98$)	百分比 (%)
性別	男性	39	40
	女性	59	60
教育程度	國中畢	1	1
	高中職畢	1	1
	高中職就讀中	28	29
	專科就讀中	9	9
	大學畢	3	3
	大學就讀中	47	48
	研究所(含以上)畢	1	1
	研究所(含以上)就讀中	8	8
職業	學生	92	92
	非學生	6	6

第二節 模式架構

本研究依據雙文化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指標文獻探討結果，建構「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和「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之假設，並進行模式適配度的考驗。

一、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

針對諮商者與個案各自的自我概念取向與諮商效能間的關係探究，本研究建構出「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如圖 3-1 所示。模式包含 4 個潛在變項 (latent variables)：在潛在自變項部分，有諮商者自我概念 (co 自我概念) 與個案自我概念 (cl 自我概念)，在潛在依變項部分，有諮商者評定諮商效能 (co

諮商效能)與個案評定諮商效能(CI 諮商效能)。並依據研究文獻分析,對上述潛在變項的關係假定為諮商者自我概念(CO 自我概念)對諮商者評定諮商效能(CO 諮商效能)與個案評定諮商效能(CI 諮商效能)有直接效果,以及個案自我概念(CI 自我概念)對諮商者評定諮商效能(CO 諮商效能)與有直接效果。

以及,共使用9個觀察變項(observed variables)作為潛在變項的測量指標。在潛在自變項中,諮商者自我概念(CO 自我概念)分為諮商者的個人取向自我概念(CO 獨)與諮商者的社會取向自我概念(CO 互)兩個測量指標,個案自我概念(CI 自我概念)分為個案的個人取向自我概念(CI 獨)與個案的社會取向自我概念(CI 互)兩個測量指標;在潛在依變項中,而諮商者評定諮商效能(CO 諮商效能)分為諮商者評定關係親密感(CO 親)與諮商者評定工作同盟(CO 工)兩個測量指標,個案評定諮商效能(CI 諮商效能)則分為個案評定關係親密感(CI 親)、個案評定工作同盟(CI 工)與個案評定中國人幸福感(CI 幸)三個測量指標。另外,2個潛在依變項與9個觀察變項亦各有一個測量誤差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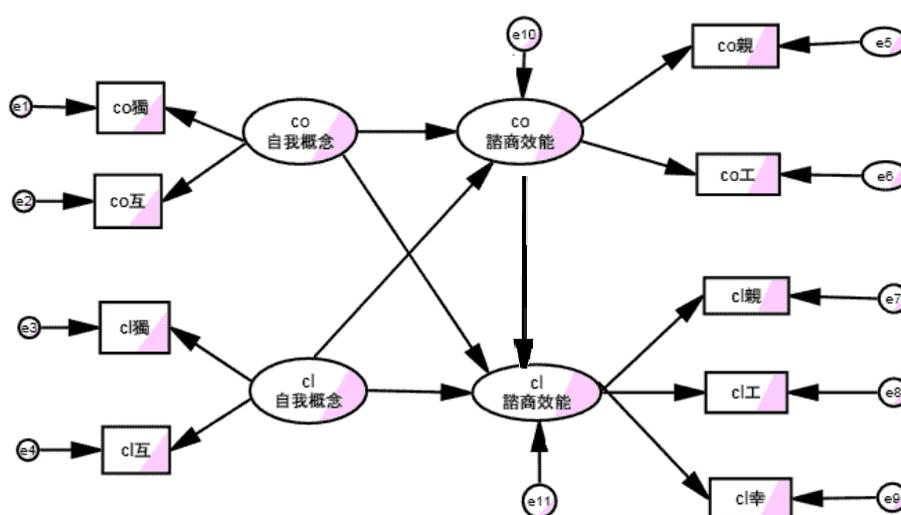


圖 3-1

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

註：模式圖中潛在變項以橢圓形表示，觀察變項以矩型表示，小圓形代表殘差，單項箭頭(A" B)代表變項 A 對變項 B 有預測能力。

二、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

首先，界定本研究中所謂諮商者與個案自我概念的契合度，即為諮商者與其配對之個案，雙方在個人取向自我概念與社會取向自我概念表現上的差異程度，在統計上則為將諮商者在獨立我與互依我量表上的得分分別減去配對個案的獨立我與互依我量表得分，得兩個自我取向的差異程度後，再取絕對值以代表獨立我契合度（簡稱獨差異）與互依我契合度（簡稱互差異），該分數越小，即為雙方差異愈小、越契合。因此在本研究中共有「獨差異」和「互差異」兩自變項。

本研究所建構的「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如圖 3-2 所示。在自變項部分，有諮商者與個案雙方在個人取向自我概念契合度（獨差異）與社會取向自我概念契合度（互差異）2 個觀察變項；在依變項部分，包含 2 個潛在依變項（latent variables）：有諮商者評定諮商效能（CO 諮商效能）與個案評定諮商效能（CI 諮商效能）。並依據研究文獻分析，對上述變項的關係假定為諮商者與個案個人取向自我概念（獨差異）對諮商者評定諮商效能（CO 諮商效能）與個案評定諮商效能（CI 諮商效能）有直接效果，以及諮商者與個案個人取向自我概念（互差異）對諮商者評定諮商效能（CO 諮商效能）與有直接效果。

以及，共使用 5 個觀察變項（observed variables）作為潛在依變項的測量指標，包括諮商者評定諮商效能（CO 諮商效能）分為諮商者評定關係親密感（CO 親）與諮商者評定工作同盟（CO 工）兩個測量指標，個案評定諮商效能（CI 諮商效能）則分為個案評定關係親密感（CI 親）、個案評定工作同盟（CI 工）與個案評定中國人幸福感（CI 幸）三個測量指標。另外，2 個潛在依變項與 5 個觀察變項亦各有一個測量誤差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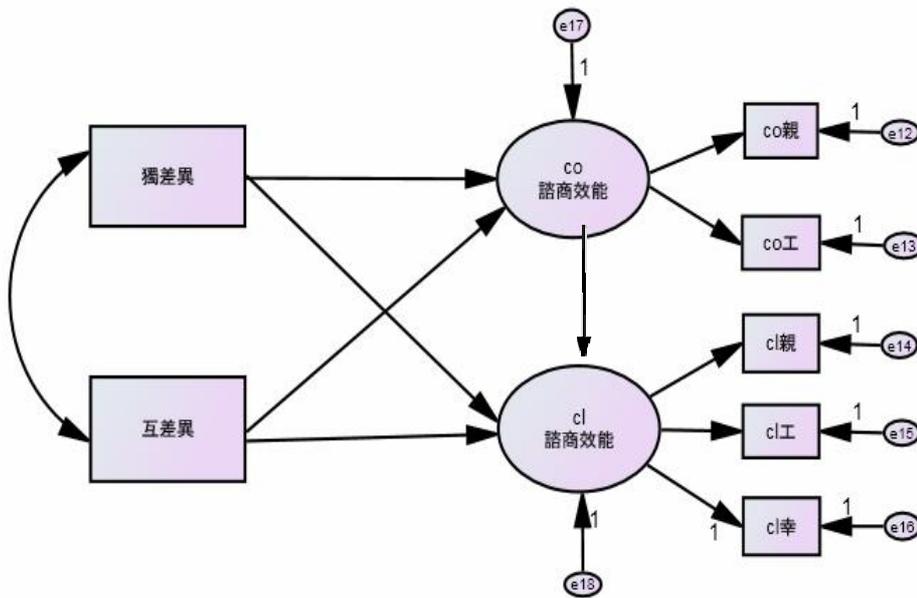


圖 3-2

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

註：模式圖中潛在變項以橢圓形表示，觀察變項以矩型表示，小圓形代表殘差，單項箭頭(A" B)代表變項 A 對變項 B 有預測能力。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工具有「文化信念與專業效能問卷」與「文化信念與晤談經驗問卷」，前者由參與本研究之諮商專業工作者填寫（如附件一），後者由參與本研究之個案填寫（如附件二）。除基本資料外，兩份問卷皆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測量研究參與者雙文化取向自我概念情形之「獨立我與互依我量表」，第二部分為研究參與者對諮商效能的評定，包括「工作同盟量表」和「社會互動量表」，個案部分除前兩項，再增加「中國人幸福感量表」。各量表分別說明如下：

一、雙文化取向自我概念的評定：獨立我與互依我量表

在本研究中，「雙文化自我概念」分指「個人取向自我概念」和「社會取向自我概念」。個人取向自我概念為受現代工商社會文化影響的面向，強調個人的自主、獨立及自足，而社會取向自我概念為受傳統農業社會文化影響的部份，強

調有效維持個人與關係中的對方、個別權威、家族（或其他團體）、及非特定他人之和諧或融洽的關係（楊國樞，2004）。

本研究採取 Lu 與 Gilmore(2007) 的獨立我與互依我量表長版(IISS)，用以評定諮商專業人員和個案雙方的個人與社會取向自我概念之情況。本量表依據 Markus 與 Kitayama(1991)理論編製，採 Likert 七點計分，請研究參與者對題目描述表達自己的看法，分別給予每個題目 1 分（非常不同意）至 7 分（非常同意）的評定，長版量表共 42 題，分別以各 21 題的分數加總代表「獨立我」和「互依我」概念面向的得分，分數愈高表示該概念面向的表現愈強。本研究以獨立我的得分代表個人取向自我概念、互依我的得分代表社會取向自我概念之表現。

獨立我概念面向包含保有個人的獨立性/一致性、表達自我（信念，感受，想法）、實現內在特徵（潛能，特徵，興趣）、促進個人目標、直接溝通（面對環境）、疏離內團體（separation from in-group）、唯情自立(self-reliance with hedonism)等七個因素；互依我概念面向則包含歸屬與適應（團體）、佔據適當的社會位置（角色、地位）、表現適當行為（做人）、促進他人的目標（團體目標）、間接溝通（察言觀色）、家庭統整（family integration）、互依的社會性(interdependence with sociability)等七個因素。

關於本量表的信度考驗，Lu 與 Gilmore(2007)以台灣的學生與民眾為施測對象（共 606 名，女性 53.5%、男性 46.7%，平均年齡為 23.83、 $SD = 8.28$ ），得到內部一致性係數在獨立我面向為.86、互依我面向為.89，且獨立我和互依我兩面向為.24 之低度相關。在本研究樣本中，得到諮商者填寫版本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在獨立我面向為.91、互依我面向為.89，個案填寫版本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在獨立我面相為.85、互依我面向為.83。效度考驗方面，該量表有良好的表面效度，也與個人/集體主義傾向量表（IC scale）有良好的同時效度，另外，檢驗社會期望偏差的可能性，結果顯示，既不獨立又不相依的自我與社會讚許性得分相關為.06 和.05。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Lu & Gilmore, 2007)。

二、諮商效能的評定：

指諮商專業工作者透過諮商會談，促使個案在感受與功能上有所改善的效果。在本研究中包含以同盟關係、關係親密感與幸福感三項作為測量指標。

(一) 同盟關係的評定：工作同盟量表

本研究採取工作同盟量表-簡式 (Working Alliance Inventory-short form, WAI-S) 用以瞭解本研究之諮商者和個案雙方對工作同盟的知覺。本量表共有 12 題，其中有兩題反向題，採 Likert 七點計分，請研究參與者根據自己的感受與想法分別給予每個題目 1 分 (從未) 至 7 分 (總是) 的評定。量表分為三個因素，分別是：「情感連結」指治療雙方關係的連結；「目標共識」指雙方對治療目標的共識；「任務共識」指雙方對達成目標所需完成的任務之共識。本研究使用量表的總分進行分析，得分愈高代表研究參與者所知覺到的工作同盟愈佳。

關於本量表之信度考驗，Busseri 與 Tyler (2003) 以大學學生輔導中心的諮商者與個案為對象，得到諮商者和個案填寫版本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為 .83 與 .98。在簡華奴 (2007) 的研究中，得到諮商者和個案填寫版本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為 .90 與 .88。以本研究樣本施測得到諮商者和個案填寫版本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89 和 .87。效度考驗方面，國內部分，簡華奴 (2007) 的研究得到本量表與晤談感受量表的相關為 .55；國外部分，Busseri 與 Tyler (2003) 以談問題改善為效標，得到相關在諮商者版本為 .42，個案版本為 .34，均達 .01 的顯著水準，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效標關連效度。

(二) 關係親密感的評定：社會互動量表

本研究採用林以正、黃金蘭 (2006) 修訂羅徹斯特社會互動量表 (Rochester Interaction Record, RIR)，作為評定諮商者與個案自評於諮商互動中「晤談感受」之「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原量表共 24 題，採 Likert 七點計分 (1=一點也不，7=非常符合)，其中自我表露包括「傾吐事實」及「傾吐內在感受及

情緒」二個項目；知覺同伴回應則包括「了解我」、「關切我的感受與情緒」及「引起共鳴」三個項目，分別代表了解、關懷及肯定三個反應向度，因此本研究採以上五個項目得分加總代表關係親密感程度。惟為不使諮商者在填寫時有語意突兀之感，將「自我表露」兩個項目修改成「知覺個案之自我表露程度」。

信度考驗方面，原量表以大學生為對象，自我表露之折半相關為.93，知覺同伴回應之折半相關為.93，顯示社會互動行為具有跨情境的穩定性（林以正、黃金蘭，2006）。以本研究樣本施測得到個案填寫版本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為.82，而諮商者填寫版本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為.79。效度考驗方面，原量表以大學生為對象，上學期的自我表露（ $r = .32, p < .01$ ）與知覺同伴回應（ $r = .40, p < .01$ ）對下學期親密感的預測具有顯著穩定性與預測力，共可解釋關係親密感全部變異量的19%（林以正、黃金蘭，2006）；另外，該研究以Q分類法測量人際親密感，結果顯示關係親密度達顯著相關（ $r = .6, p < .01$ ），以及請受試者對喜歡、信任、對關係的確定感、內外團體區辨等進行同樣的分類作業，結果顯示親密與信任的相關為0.75、親密與自己人的相關為0.79、信任與自己人之間的相關為0.75，顯示三者概念仍存有差異，但確實有高度相關性（林以正、黃金蘭，2006）。因此，在本研究中，以參與者對該次晤談評定的社會互動分數代表關係親密感，得分愈高，表示關係親密感愈佳。

（三）幸福感的評定：中國人幸福感量表

本研究採用「中國人幸福感量表」極短版（陸洛，1998），作為評量本研究之幸福感之用。該量表總計10題，以四點量表評量正向情感與整體生活滿意，再加總計分，分數愈高表示個案的主觀幸福感愈高。量表包括「樂觀」、「工作成就」、「正向情感」、「自我滿足」、「身體健康」、「樂天知命」六個內涵因素。信度考驗部分，原版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 α 係數.90，極短版以公私立大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生為對象，得到內部一致性信度 α 係數.91（陸洛、翁克成，2007）。以本研究樣本施測得到個案填寫版本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為.88。效度考驗

部分，原版量表與生活滿意量表（代表認知層面）及快樂量表（代表情緒層面）的相關分別為.52和.48的中度相關（陸洛，1998）。

第四節 資料蒐集、整理與分析

一、邀請研究與資料蒐集

（一）邀請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欲探討諮商專業工作者雙文化取向自我概念表現狀況，及其與個案契合情形對於諮商效能的關係。研究者認為，自我概念會普遍影響國人之心理健康、適應行為與人際關係等議題，因此本研究在取樣上並不限定個案來談的核心議題。另一方面，過去研究顯示工作同盟在第三次晤談以後才會達到穩定的狀態，因此本研究設定晤談須達三次以上才納入本研究範圍。

在研究參與者的選取上，考量到諮商工作專業人員須邀請個案參與研究，涉及個案的意願與相關保密議題，為增加樣本回收的可行性，乃採便利取樣與滾雪球的方式邀請研究參與者。研究者先蒐集潛在研究參與者名單，包括台灣各大專院校諮商／學生輔導中心、相關諮商社區機構以及系所通訊錄等，再以電話及電子郵件聯繫名單中的專業人員，除了說明研究目的與參與方式，邀請其參與研究，亦請其推薦其他符合資格之專業人員或委請其代為邀請其他符合資格之對象。

（二）問卷發放與回收

在研究參與者同意參與研究後，研究者即發送完整問卷。每份問卷均包含兩個資料夾，其中一個為「專業人員版」之資料夾，內含給專業人員之研究邀請函、「文化信念與專業效能問卷」和回郵信封各一份；另一個為「當事人版」之資料夾，內含給個案的研究說明函、「文化信念與晤談經驗問卷」和信封各一份。每一份問卷上均壓以編號以利後續配對分析。此外，在問卷發放的過程中，若相關單位需要發送公文或欲了解更詳細的研究相關資訊，研究者均配合辦理。

本研究自 100 年 11 月下旬開始邀請與發放問卷，於 101 年 1 月底完成回收。總計發出 250 對問卷，其中專業人員版問卷共回收 108 份，當事人版問卷回收 106 份，回收率為 42.8%。

(三) 問卷配對之處理

在回收問卷後，研究者發現專業人員版部分，未能與當事人版配對的有 3 份，當事人版部分未能與專業人員版配對的有 1 份，另外，有 7 對可配對但當事人版問卷內容為無效填答之問卷，因此剔除未配對成功與無效作答之問卷，專業人員版問卷有 10 份，當事人版問卷有 8 份，最後總計有 98 對問卷納入分析。

二、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一) 遺漏值之處理

1. 諮商專業工作者部分

在納入分析的 98 份問卷中，除了一份在評估造成個案困擾的核心議題與其獨立和互依之相關程度的兩題未填寫外，其餘基本資料均完整填寫。在量表部分，有一份問卷的遺漏值發生在工作同盟量表，遺漏題數為 2 題。考量本研究資料收集不易，且遺漏之百分比不大於 2%，因此在分析中以該量表之平均數取代遺漏值。

2. 個案部分

在納入分析的 98 份問卷中，除了一份未填寫職業外，其餘基本資料均完整填寫。在量表部分，有一份問卷的遺漏值發生在關係親密感評定的量表上，遺漏的題數為 1 題，有一份問卷的遺漏值發生在工作同盟量表，遺漏的題數為 2 題，另外有一份問卷的遺漏值發生在中國人幸福感量表，遺漏的題數為 1 題。考量本研究資料收集不易，且遺漏值之百分比均不大於 2%，因此在分析中以該量表之平均數取代遺漏值。

(二) 統計分析

本研究採用 SPSS for Windows 套裝軟體 19 版進行參與者人口變項對治療

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迴歸分析 (Regression) 和相關分析 (Correlation)，並以 Amos 軟體 20 版對「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和「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進行結構方程模式 (SEM) 適配度分析與考驗。

第五節 倫理議題

在相關的研究倫理議題方面，本研究進行以下處理，以確保研究參與者權益。

一、關於研究參與者之權利

(一) 了解研究之權利

每份問卷中均包含給諮商專業人員之「研究邀請函」與給個案的「研究說明函」，除交代研究者身分和聯絡方式外，並說明本研究目的、進行程序、參與人員資格及參與研究所需時間。

(二) 了解研究結果之權利

研究者於「研究邀請函」與「研究說明函」中均註明若研究參與者欲了解研究結果，可利用函中所附聯絡方式與研究者聯繫，即可無償索取。

二、自願參與原則

本研究尊重研究參與者之參與意願，除了於邀請時當面告知外，亦於「研究邀請函」與「研究說明函」中特別註明其有不參與研究之權利，且其權益絕對不會因此受到影響。

三、保密處理

(一) 所有問卷均採匿名方式，且研究進行中所有資料均以編號處理，不會透漏個人隱私相關資料。

(二) 所蒐集資料只做整體分析之用，且在資料報導時以群體結果呈現，不會對個別資料進行分析與描述。

(三) 所蒐集資料僅作本研究之用，並在研究完成與發表後全數銷毀，不另提供他用。

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呈現研究結果，第一節呈現前導分析的結果，第二、三節則分別驗證本研究架構的「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和「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之情形。

第一節 前導分析

在前導分析中，本研究依變項「諮商效能」分為諮商者評定與個案評定兩部分，前者採合計諮商者評定工作同盟與關係親密感兩量表之平均分數，簡稱「諮評效能」；後者採合計個案評定工作同盟、關係親密感與中國人幸福感三量表之平均分數，簡稱「案評效能」。以下茲就本研究各個變項之前導分析結果報導：

一、諮商專業中作者的人口變項與諮商效能之相關分析

本部分檢視諮商者的基本人口變項對諮商效能是否有影響。在人口變項的類別項目部分，本研究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諮商者之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專業身分、工作區域、工作地點、督導有無以及專業證照對各效能指標之平均數差異。結果發現這些人口變項對諮商者評定與個案評定之諮商效能均無統計考驗上之差異（如表 4-1 至表 4-8），代表上述諮商者的人口變項對諮商效能沒有顯著的影響力，因此以下將不再針對上述變項進行進階分析。

表 4-1
諮商者之性別對諮商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	自由度	均方	F值
諮評效能	組間	.06	1	.06	.04 n.s
	組內	138.96	96	1.45	
	總變異	139.02	97		
案評效能	組間	.88	1	.88	.36 n.s
	組內	236.10	96	2.46	
	總變異	236.98	97		

n.s $p > 0.05$

表 4-2

諮商者之婚姻狀況對諮商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	自由度	均方	F值
諮評效能	組間	5.50	2	2.75	1.79 n.s
	組內	133.53	95	1.41	
	總變異	139.02	97		
案評效能	組間	1.02	2	.51	.23 n.s
	組內	235.96	95	2.48	
	總變異	236.98	97		

n. s $p > 0.05$

表 4-3

諮商者之教育程度對諮商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	自由度	均方	F值
諮評效能	組間	4.54	4	1.14	.79 n.s
	組內	134.48	93	1.45	
	總變異	139.02	97		
案評效能	組間	2.13	4	.53	.21 n.s
	組內	234.85	93	2.53	
	總變異	236.98	97		

n. s $p > 0.05$

表 4-4

諮商者之專業身分對諮商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	自由度	均方	F值
諮評效能	組間	2.40	4	6.0	.41 n.s
	組內	136.63	93	1.47	
	總變異	139.02	97		
案評效能	組間	4.28	4	1.07	.48 n.s
	組內	232.70	93	2.50	
	總變異	236.98	97		

n. s $p > 0.05$

表 4-5

諮商者之工作區域對諮商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	自由度	均方	F值
諮評效能	組間	4.46	3	1.49	1.04 n.s
	組內	134.56	94	1.43	
	總變異	139.02	97		
案評效能	組間	8.24	3	2.75	1.13 n.s
	組內	228.74	94	2.43	
	總變異	236.98	97		

n. s $p > 0.05$

表 4-6

諮商者之工作地點對諮商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	自由度	均方	F值
諮評效能	組間	6.14	3	2.05	1.45 n.s
	組內	132.88	94	1.41	
	總變異	139.02	97		
案評效能	組間	1.48	3	.49	.20 n.s
	組內	235.50	94	2.51	
	總變異	236.98	97		

n. s $p > 0.05$

表 4-7

諮商者之有無督導對諮商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	自由度	均方	F值
諮評效能	組間	.00	2	.00	.00 n.s
	組內	139.02	95	1.46	
	總變異	139.02	97		
案評效能	組間	2.90	2	1.45	.72 n.s
	組內	234.08	95	2.46	
	總變異	236.98	97		

n. s $p > 0.05$

表 4-8

諮商者之專業證照對諮商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	自由度	均方	F值
諮評效能	組間	2.96	5	.59	.40 n.s
	組內	136.06	92	1.48	
	總變異	139.02	97		
案評效能	組間	5.13	5	1.03	.41 n.s
	組內	231.85	92	2.52	
	總變異	236.98	97		

n. s $p > 0.05$

二、年齡、專業工作年資與晤談次數對諮商效能之迴歸分析

在諮商專業工作者的年齡、專業工作年資與晤談次數部分，屬於連續變項，因此本研究採用迴歸分析考驗其對諮商效能的影響。結果發現諮商者的年齡、專業工作年資與晤談次數對諮商效果的影響均未達顯著水準（如表 4-9 至表 4-11），代表諮商者的年齡、工作年資與晤談次數變項對諮商效能沒有顯著的影響力，因此以下將不再針對上述變項進行進階分析。

表 4-9

諮商者之年齡對諮商效能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r^2	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F
諮評效能	.04	.19	3.65 n.s
案評效能	.00	-.01	.02 n.s

n. s $p > 0.05$

表 4-10

諮商者之專業工作年資對諮商效能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r^2	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F
諮評效能	.02	.15	2.23 n.s
案評效能	.00	.01	.01 n.s

n. s $p > 0.05$

表 4-11

晤談次數對諮商效能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r^2	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F
諮評效能	.01	.09	.82 n.s
案評效能	.03	.02	2.97 n.s

n. s $p > 0.05$

三、諮商者評估造成個案困擾核心議題與各量表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在專業人員版問卷的基本資料中，請諮商者評估造成該個案困擾核心議題與其「追求個人獨立自主和自足」及「維持與他人和諧融洽的關係」的相關程度，表4-12為該題填寫之次數與百分比，表4-13為該評估與其他量表的相關，可以發現諮商者評估造成個案困擾的核心議題與「獨立」和「相依」的相關程度都以「大部分相關」百分比為最多（44.9%、46.9%），對「與獨立之相關程度」與「與相依之相關程度」的評估達顯著相關（ $r = .29, p < .01$ ），顯示諮商者評估造成個案困擾之核心議題，具有獨立我和相依我的程度相關且同時偏高之情形。

與諮商效能的相關方面，可以發現諮商者對個案困擾核心的評估與其雙方的獨立我、互依我的相關均未達顯著，但諮商者對困擾核心的相依相關性之評估與諮商者自評諮商效能達顯著相關（ $r = .23, p < .05$ ），顯示個案困擾之核心議題愈與互依性有關，諮商者在晤談時所知覺的效能愈佳。

表 4-12
諮商者評估造成個案困擾之核心議題與獨立和相依之相關程度填寫次數與百分比

	困擾核心與「獨立」之相關程度		困擾核心與「相依」之相關程度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完全無關	1	1.0	1	1.0
少部分相關	16	16.3	13	13.3
中等相關	23	23.5	26	26.5
大部分相關	44	44.9	46	46.9
完全相關	12	12.2	9	9.2
遺漏	2	2.0	3	3.1
總和	98	100	98	100.0

表 4-13
諮商者評估造成個案困擾之核心議題與獨立和相依的相關程度與各量表之相關

	困擾核心 與「獨立」 相關程度	個案核心 與「相依」 相關程度	個案 獨立我	個案 相依我	諮商者 獨立我	諮商者 相依我	諮評效能	案評效能
困擾核心與「獨立」 之相關程度	--	.29**	.08	.09	.11	-.13	.02	.09
困擾核心與「相依」 之相關程度	--	--	.11	.17	.05	.12	.24*	.13

* $p < 0.05$, ** $p < 0.01$

第二節 諮商者與個案的自我概念取向與諮商效能關係之分析

本研究問題一和問題二，主要是要了解諮商者與個案的自我概念取向表現情況、以及諮商雙方的自我概念取向與諮商效能之關係。將以98對的諮商專業工作者與個案為觀察樣本，估計方法採最大概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進行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考驗，並以分析結果說明研究變項間的效果關係。

一、諮商者與個案的自我概念取向表現情形之分析

表 4-14 為本研究中各量表平均數與標準差的情形，表 4-15 為各量表的相關矩陣。從表 4-14 自我概念量表之平均數來看，可以發現與 Lu 和 Gilmore(2007) 針對國內民眾與大學生所收集的資料比較 (獨立我 $M = 110.40$, $SD = 13.76$; 互依我 $M = 112.07$, $SD = 15.78$)，在本研究中諮商者的獨立我 ($M = 106.27$, $SD = 13.77$) 與相依我 ($M = 108.20$, $SD = 12.12$) 的表現程度平均皆較其低，且均達顯著差異 ($t = 2.75$, $p < .01$; $t = 2.32$, $p < .05$)。再檢視其彼此的相關程度，諮商者本身的獨立我和相依彼此達顯著相關 ($r = .37$, $p < .01$)，顯示本研究諮商者部分獨立與相依取向的自我概念有顯著相關。

個案部分，仍從自我概念量表之平均數來看，與諮商者的資料相反，可以發現個案的獨立我 ($M = 114.11$, $SD = 14.25$) 與相依我 ($M = 117.43$, $SD = 12.77$) 的表現程度平均則較 Lu 和 Gilmore(2007) 之研究資料 (獨立我 $M = 110.40$, $SD = 13.76$; 互依我 $M = 112.07$, $SD = 15.78$) 高，亦達顯著差異 ($t = -2.46$, $p < .01$; $t = -3.19$, $p < .01$)。再檢視其彼此的相關程度，個案本身的獨立我和相依我亦達顯著相關 ($r = .55$, $p < .01$)，此部份與諮商者情況相同，顯示本研究樣本之獨立與相依取向的自我概念有顯著相關，而且個案無論在獨立和相依取向的自我概念表現上皆比諮商者為高。

表 4-14
各量表平均數與標準差

	個數	單題 平均數	單題 標準差	單題 最小值	單題 最大值	總分 平均數	總分 標準差	總分 最小值	總分 最大值
諮商者的獨立我	98	5.06	.66	3.57	6.57	106.27	13.77	75.00	138.00
諮商者的互依我	98	5.15	.58	3.52	6.57	108.20	12.12	74.00	138.00
個案的獨立我	98	5.43	.68	3.71	6.62	114.11	14.25	78.00	139.00
個案的互依我	98	5.59	.61	3.57	6.67	117.43	12.77	75.00	140.00
諮商者評關係親密感	98	5.85	.64	4.20	7.00	29.24	3.22	21.00	35.00
諮商者評工作同盟	98	5.40	.66	3.50	6.67	64.76	7.91	42.00	80.00
個案評關係親密感	98	6.15	.72	3.80	7.00	30.77	3.58	19.00	35.00
個案評工作同盟	98	5.76	.75	4.12	7.00	69.16	8.96	50.00	84.00
個案評幸福感	98	2.13	.52	1.20	3.6	21.31	5.19	12.00	36.00

註：獨立我與互依我量表，共 42 題，採 Likert 七點計分（1 分＝非常不同意，7 分＝非常同意），分別以各 21 題的分數加總代表「獨立我」和「互依我」概念面向的得分，分數愈高表示該概念面向的表現愈強。工作同盟量表，共有 12 題，採 Likert 七點計分（1 分＝從未，7 分＝總是），本研究以總分進行分析，得分愈高代表研究參與者所知覺到的工作同盟愈佳。羅徹斯特社會互動量表，原量表共 24 題，採 Likert 七點計分（1＝一點也不，7＝非常符合），本研究採其中反映自我表露及知覺同伴回應的五個項目得分加總代表關係親密感程度，分數愈高表示對關係親密感的知覺愈佳。中國人幸福感量表，極短版共 10 題，以四點量表評量，再加總計分，分數愈高表示個案的主觀幸福感愈高。

表 4-15
各量表之相關矩陣 (n = 9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諮商者的獨立我	--	.37**	-.05	.09	-.34**	-.00	.34**	.31**	.10	.01	.02
2 諮商者的互依我		--	-.05	-.03	-.13	.28**	.28**	.11	.05	-.14	-.24*
3 個案的獨立我			--	.55**	.12	.16	.13	.19	.26*	.37**	.32**
4 個案的互依我				--	-.00	.19	.07	.15	.39**	.33*	.16
5 獨立我契合					--	.30**	-.17	-.28**	-.02	.02	-.04
6 互依我契合						--	-.02	.01	.13	.26*	.27
7 諮商者評定關係親密感							--	.69**	.30**	.25*	.07
8 諮商者評定工作同盟								--	.22*	.36**	.28**
9 個案評定關係親密感									--	.54**	.18
10 個案評定工作同盟										--	.51**
11 個案評定中國人幸福感											--

* $p < 0.05$, ** $p < 0.01$

二、諮商者與個案的自我概念取向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之考驗

本研究從模式基本適配度、模式整體模式適配度與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三方面，進行模式外在與內在品質的考驗，以評估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情形。

在模型估計步驟上，本研究以 AMOS 套裝軟體對本模式進行 SEM 分析後，並參考該軟體分析提供的模式修正指標值，在不違反 SEM 假定前提下，依據部分修正指標逐一進行修正嘗試，達到模式最佳的適配數值後停止修正。圖 4-1 即呈現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標準化徑路係數與參數估計值之分析結果。以下茲就各個模式適配度面向之考驗結果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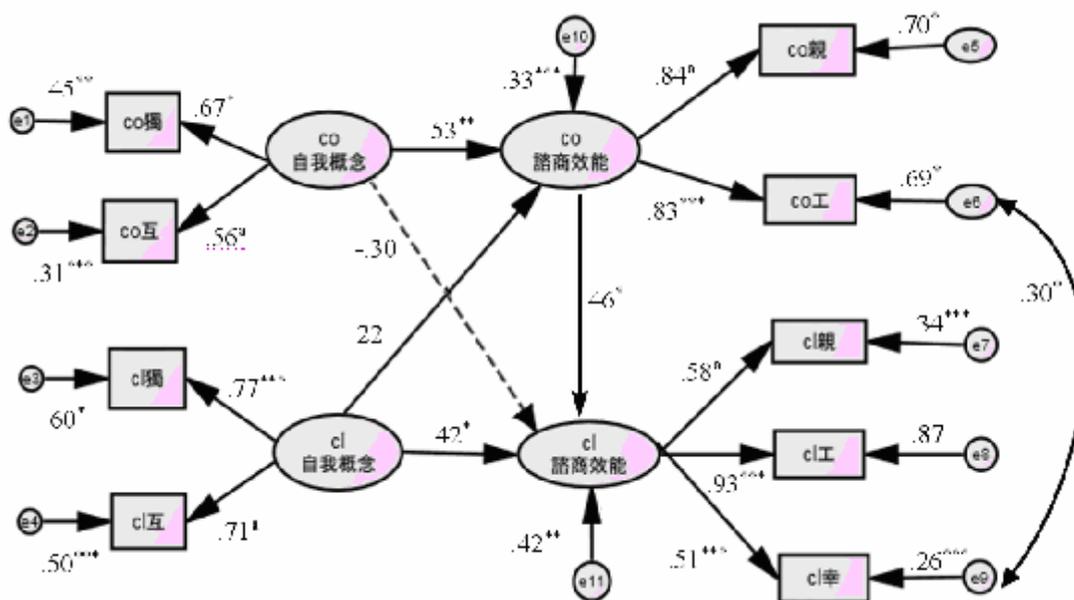


圖 4-1

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標準化徑路係數

註：^a 為參照指標，虛線代表不顯著。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一) 基本適配度考驗

首先，分析資料中不能有負的標準誤，從表4-16可知，觀察變項的測量誤差（即e1至e9）與潛在依變項的殘餘誤差（即e10和e11）介於至0.26到0.87之間，沒有出現負的誤差變異。其次，潛在變項與其測量指標間的因素負荷量不能太低（低於0.5）或太高（高於0.95），表4-16顯示，9個觀察指標介於0.51至0.93之間，符合評鑑標準（吳明隆，2009）；最後一項標準要求資料不能有很大的標準誤，分析結果顯示，各估計參數的標準誤介於0.04至35.14之間，未能完全符合。

表 4-16

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的估計參數顯著性考驗與標準化數值

參數	ML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標準化估計值
co自我概念—co諮商效能	.22	.08	2.62**	.54
cl自我概念—cl諮商效能	.10	.04	2.48*	.42
co自我概念—cl諮商效能	-.09	.06	-1.55	-.30
cl自我概念—co諮商效能	.07	.04	1.67	.22
co諮商效能—cl諮商效能	.35	.14	2.49*	.46
co獨—co自我概念	1.37	.53	2.57*	.67
co互—co自我概念	1.00	---	---	.56
cl獨—cl自我概念	1.22	.33	3.66***	.78
cl互—cl自我概念	1.00	---	---	.71
co親—co諮商效能	1.00	---	---	.84
co工—co諮商效能	2.46	.46	5.34***	.83
cl親—cl諮商效能	1.00	---	---	.58
cl工—cl諮商效能	4.04	.91	4.44***	.93
cl幸—cl諮商效能	1.26	.31	4.04***	.51
e1—co獨	103.67	35.14	2.95**	.45
e2—co互	100.62	22.30	4.53***	.31
e3—cl獨	80.02	32.56	2.46*	.60
e4—cl互	80.09	23.61	3.39***	.50
e5—co親	3.05	1.30	2.34*	.70
e6—co工	19.64	7.92	2.48*	.69
e7—cl親	8.40	1.44	5.85***	.34
e8—cl工	10.36	12.05	.86	.87
e9—cl幸	19.39	2.95	6.58***	.26
e10—co諮商效能	4.82	1.42	3.40***	.33
e11—cl諮商效能	2.47	.93	2.07**	.42
e6—e9	5.82	2.68	2.17*	.30

註：未列標準誤者為參照指標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因此，在基本適配度考驗中，潛在變項與其測量變項間的因素負荷量符合評鑑標準，但潛在自變項的測量指標出現較大的標準誤，顯示模式尚能反應觀察資料，但測量指標未能足夠反應潛在自變項。

(二) 整體模式適配度考驗

表4-17為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整體適配度考驗結果。在絕對適配度方面，表中顯示 $\chi^2 (21, N = 98) = 35.22, p < .05$ ，此結果表示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的 H_0 (虛無假設) 必須拒絕，即本研究建構的模式與觀察資料不適配。然而， χ^2 受到估計參數與樣本數影響很大，因此，本研究除了卡方考驗的結果外，亦參

酌其他適配度指數來考驗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

首先，在絕對適配度指標上，GFI 指數表示由理論模式所能解釋觀察資料變異數與共變量比例，表4-17指出本模式的GFI指數為.93，符合.90以上的理想數值(吳明隆，2009)；RMSEA為漸進殘差均方和平方根，數值愈小表示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越好，本研究所得的RMSEA指數為0.08，學者指出RMSEA數值小於.05表示模式適配度非常良好、小於.08即有合理適配；而SRMR為標準化殘差均方和平方根，可以接受的範圍值在.07以下(Browne & Cudeck, 1993)，本研究所得的SRMR為0.08，略高於可接受的數值。大致而言，本模式具有合理的絕對適配度。

其次，相對適配度是理論模式和獨立模式比較的結果，而NFI、NNFI、CFI與IFI指標的數值代表理論模式和獨立模式比較起來能增加多少的適配度，數值愈接近1表示適配度愈佳，一般判別標準則為0.90以上(吳明隆，2009)。根據表4-17得知，本研究的NFI、NNFI、CFI與IFI依序為0.87、0.89、0.94、0.94，大致超過或趨近於0.90的理想標準值。

最後，在精簡適配度方面，本研究以PNFI與PGFI為精簡適配度指標，以評估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是否精簡。結果顯示，本研究的PNFI與PGFI分別為0.50與0.43，趨近0.5的判別標準(吳明隆，2009)，顯示本研究建構的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大致符合精簡模式。

表 4-17
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整體適配度考驗結果

1. 絕對適配指標	(1) Degrees of Freedom = 21 Minimum Fit Function Chi-Square = 35.22 (P=0.03) (2)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 0.93 (3)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 0.08 (4)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 = 0.07
2. 相對適配指標	(1) Normed Fit Index (NFI) = 0.87 (2) Non-Normed Fit Index (NNFI) = 0.89 (3)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 0.94 (4)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 = 0.94
3. 簡效適配指標	(1) Parsimony Normed Fit Index (PNFI) = 0.50 (2) Parsimony Goodness of Fit Index (PGFI) = 0.43

由上可知，本研究提出的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整體適配度考驗結果，顯示本模式與觀察資料在絕對適配度部分有合理適配水準，相對與精簡適配指標部分則大致符合與趨近理想標準。

（三）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考驗

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的評鑑方面，本研究參考學者Bogozzi與Yi(1998)所提出的評鑑標準數值。首先，從表4-17中顯示，測量模式中的因素負荷量均達顯著水準， t 值介於2.57到5.34之間， $p < 0.01$ ，符合因素負荷量應達顯著水準的考驗標準，顯示指標變項的效度良好，可以反應它所代表的潛在變項；再者，所參數估計值需達顯著性的檢定，從表4-17中顯示，除了除了e8之外，均達0.5以上的顯著水準；第三，指標變項的 R^2 反應潛在變項的信度，從表4-18中可知，CO獨、CI獨、CO親、CO工和CI工等五項個別指標信度超過0.50的判斷標準，但CO互、CI互、CI親與CI幸等四項則未能達到；第四，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部分，為反應測量指標間的一致性指標值，CO自我概念、CI自我概念、CO諮商效能與CI諮商效能四個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依序為0.55、0.71、0.82與0.73，大致符合或趨近0.60以上的檢核標準；最後，在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數抽取量部分，代表潛在變項所能解釋指標變項變異量的程度，在表4-19中，CO自我概念、CI自我概念、CO諮商效能與CI諮商效能四個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數抽取量依序為0.38、0.56、0.70、0.49，僅有CO自我概念較低，其餘變項則超過或接近0.50以上的評鑑標準。

整體而言，有關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的內在品質評鑑，結果顯示測量模式的因素負荷量皆達顯著水準；在測量指標的個別信度上僅部分符合評鑑標準，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與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的部份則大致符合過檢核標準。以上可見，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尚未具有非常理想的內在品質，測量指標仍有待更精緻的修正。

表 4-18

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的個別指標信度、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

變項	個別指標信度	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	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
Co自我概念			
co獨	.45	.55	.38
co互	.31		
Cl自我概念			
cl獨	.61	.71	.56
cl互	.50		
Co諮商效能			
co親	.71	.82	.70
co工	.69		
Cl諮商效能			
cl親	.34		
cl工	.89	.73	.49
cl幸	.26		

綜合言之，有關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的適配度考驗，結果顯示模式具有合理適配度，簡約與相對適配指標也趨近良好；另外在內在品質檢驗的部分，結果顯示各潛在變項的測量指標有良好的關連程度，但測量指標的個別信度和潛在變項所能解釋指標變項變異量的程度兩方面則未能完全符合評鑑標準。因此，整體而言，模式的適配度雖然沒有完全符合理想水準，但仍具有合理的適配性，為尚可之模式，對了解諮商雙方自我概念取向與諮商效能關係的影響路徑具有一定參考性。

三、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潛在變項間之效果

在進行完模式的內外品質考驗後，分析結果顯示本模式具有合理之適配度，因此以下進一步了解各潛在變項間關係效果。從表 4-17 中可知，co 自我概念對 co 諮商效能的直接效果達顯著水準 ($t = 2.62, p < 0.01, \beta = 0.54$)，而 co 自我概念的測量指標中，co 獨和 co 互的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0.67 和 0.56，以 co 獨較 co 互略大，但是 co 自我概念對 cl 諮商效果是直接效果則未達顯著水準 ($t = -1.55, p > 0.05$)；以及，cl 自我概念對 cl 諮商效能的直接效果達顯著水準 ($t = 2.48, p < 0.01, \beta = 0.42$)，而 cl 自我概念的測量指標中，cl 獨與 cl 互的因素負荷量分別

為 0.78 和 0.71，顯示兩項均高，但是 CI 自我概念對 CO 諮商效能的直接效果則未達顯著水準 ($t=1.67, p>0.05$)；最後，CO 諮商效能對 CI 諮商效能的直接效果達顯著水準 ($t=2.49, p<0.05, \beta=0.46$)。

因此，本研究發現諮商者與個案的自我概念對本身自評的諮商效能均有顯著直接預測效果，而且諮商者評定的諮商效能對個案評定的諮商效能也有顯著的預測效果，然而諮商者與個案的自我概念對各自評定的諮商效能則未有交互和直接的顯著影響。

第三節 諮商者與個案自我概念取向的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之分析

本節主要分析研究問題三，主要是要了解諮商者與個案的自我概念取向契合度與諮商效能之關係。以 98 對的諮商專業工作者與個案為觀察樣本，進行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考驗，並依據分析結果，說明研究變項間的關係效果。

一、諮商者與個案的自我概念取向契合情形之分析

本研究界定之自我取向契合度採諮商者的獨立我和互依我量表得分分別減去個案獨立我與互依我量表得分，得兩自我取向契合的差異程度後，再取絕對值以代表獨立我契合度（簡稱獨差異）與互依我契合度（簡稱互差異）。表 4-19 呈現諮商者與個案的獨差異和互契差異的平均數與標準差等資料。

表 4-19
諮商者與個案自我概念取向契合度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獨差異	98	1	53	18.04	12.01
互差異	98	1	63	15.98	12.13

二、諮商者與個案的自我概念取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初始模式之考驗

在模式的適配度考驗上，本研究先評鑑其模式基本適配度。表 4-20 為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初始模式的估計參數顯著性考驗與標準化數值資料。

從表 4-20 中可知，估計參數 e13 和 e15 出現負的誤差變異數，且其標準化係數均超過 1，不符合評鑑標準，表示模式可能有敘列誤差的問題存在，而無法進行後續參數的評估，意即研究者所提的理論模式，無法反應出觀察資料及變項的真正特質。因此，基於初始模式可能觸犯敘列誤差的統計問題，依據不違反理論文獻與回答研究問題的原則，因而修改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架構。

表 4-20
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初始模式的估計參數顯著性考驗與標準化數值

參數	ML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標準化估計值
獨差異—CO諮商效能	-.05	.02	-2.44*	-.30
互差異—CI諮商效能	.18	.07	2.47*	.23
互差異—CO諮商效能	.02	.02	1.01	.10
獨差異—CI諮商效能	.04	.08	.49	.05
CO親—CO諮商效能	1.00	--	--	.67
CO工—CO諮商效能	3.76	.94	3.99***	1.03
CI親—CI諮商效能	.20	.05	4.09***	.52
CI工—CI諮商效能	1.00	--	--	1.04
CI幸—CI諮商效能	.27	.07	3.87***	.49
獨差異—互差異	42.50	15.26	2.79**	.30
e12—CO親	5.65	1.31	4.30***	.45
e13—CO工	-3.35	14.59	-.23	1.05
e14—CI親	9.18	1.43	6.40***	.28
e15—CI工	-5.74	16.30	-.35	1.07
e16—CI幸	20.31	3.11	6.53***	.24
e17—CO諮商效能	4.24	1.42	2.98**	.08
e18—CI諮商效能	70.63	20.02	3.53***	.17

註：未列標準誤者為參照指標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三、諮商者與個案的自我概念取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修改模式之考驗

依據文獻探討可知，Bordin (1979)定義工作同盟的內涵包括指治療雙方關係的連結 (bond)、雙方對治療目標的共識 (goal) 指雙方對達成目標所需完成的任務之共識 (task)。於初始模式中，本研究使用量表的總分進行分析，得分愈高代表研究參與者所知覺到的工作同盟愈佳，但是由初始模式的適配結果可知，諮商者與個案評定的工作同盟，可能與其他測量指標有共線性問題，因此，在不刪減自變量的情況下，決定將工作同盟量表採三個因素分別計分的方式，作為三個觀察變項 (名稱為工 Goal、工 Task、工 Bond)，修改後的模式如圖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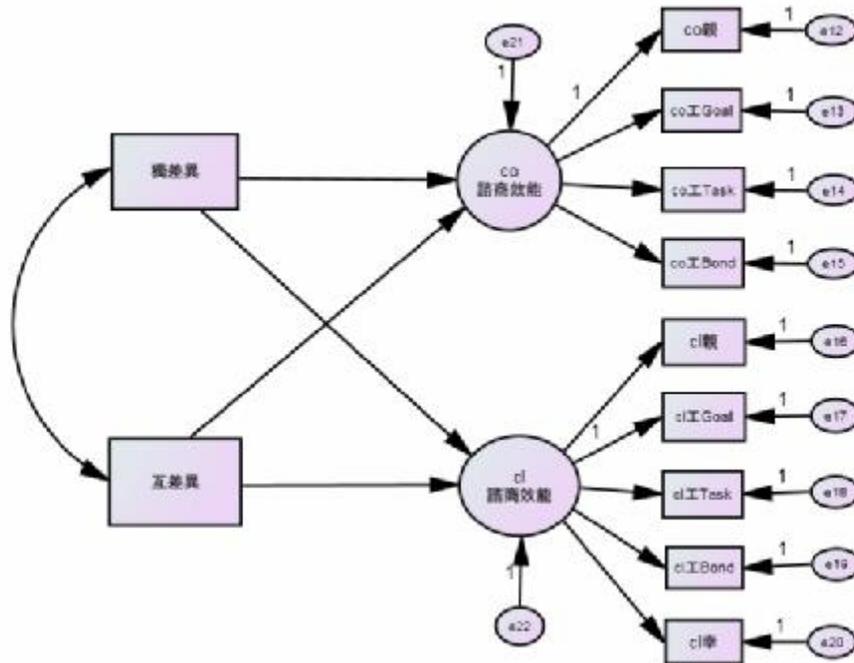


圖 4-2

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修改模式

以下即以修改後的模式，進行模式的適配度考驗。在模型估計步驟上，本研究以 AMOS 套裝軟體對本模式進行 SEM 分析後，並參考該軟體分析提供的模式修正指標值，在不違反 SEM 假定前提下，依據部分修正指標逐一進行修正嘗試，達到模式最佳的適配數值後停止修正。圖 4-2 即呈現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標準化徑路係數與參數估計值之分析結果。

本研究從模式基本適配度、模式整體模式適配度與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三方面，進行模式外在與內在品質的考驗，以評估修改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情形。茲就各個模式適配度面向之考驗結果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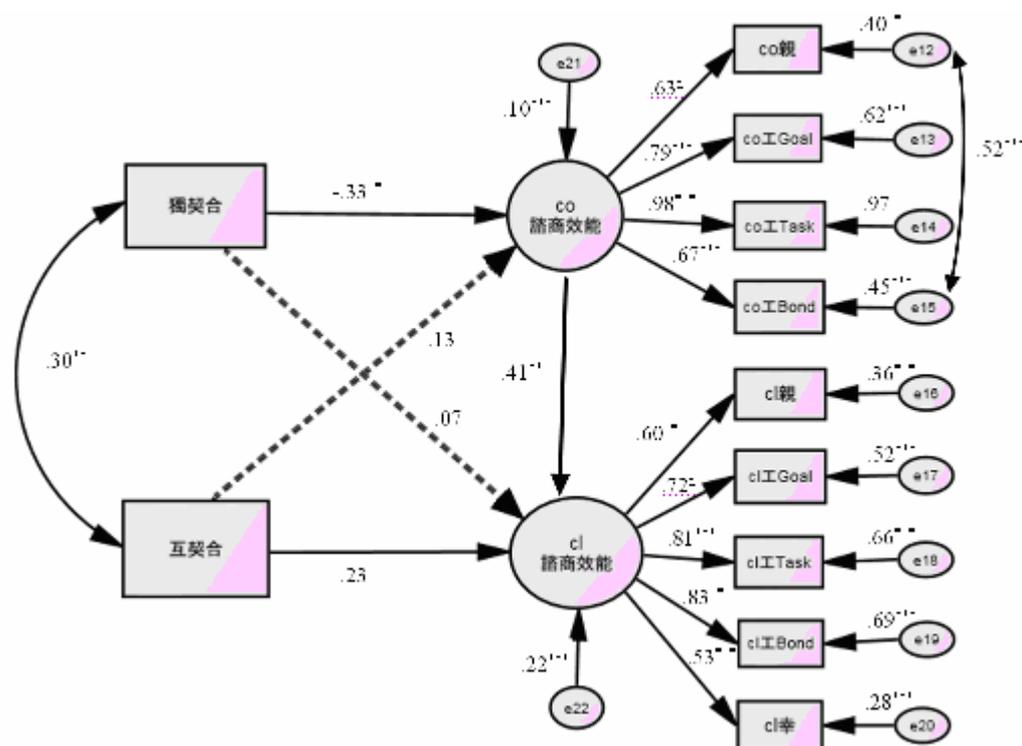


圖 4-3
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標準化徑路係數

註：^a 為參照指標，虛線代表不顯著。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一) 基本適配度考驗

首先，分析資料中不能有負的標準誤，從表4-21可知，觀察變項的測量誤差（即e12至e20）與潛在依變項的殘餘誤差（即e21和e22）介於至0.10到0.97之間，沒有出現負的誤差變異；其次，潛在變項與其測量指標間的因素負荷量不能太低（低於0.5）或太高（高於0.95），表4-21顯示，7個觀察指標的因素負荷量介於0.53至0.98之間，僅coIGoal項目不符合該項標準（吳明隆，2009）；最後一項評鑑要求資料不能有很大的標準誤，分析結果顯示，各估計參數的標準誤介於0.02至15.26之間，未能完全符合。

因此，在基本適配度考驗中，資料沒有負的標準誤，潛在變項與其測量變項間的因素負荷量也符合評鑑標準，顯示模式尚能反應觀察資料，但標準誤的資料顯示測量指標可能未能足夠反應潛在變項。

表 4-21

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修正模式的估計參數顯著性考驗與標準化數值

參數	ML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標準化估計值
獨差異—CO諮商效能	-.06	.02	-2.98**	-.33
獨差異—CI 諮商效能	.02	.03	.59	.07
互差異—CI 諮商效能	.05	.03	2.10*	.23
互差異—CO諮商效能	.02	.02	1.28	.13
CO諮商效能—CI 諮商效能	.57	.18	3.24**	.41
獨差異—互差異	42.50	15.26	2.79**	.30
CO親—CO諮商效能	1.00	--	--	.63
CO工Goal—CO諮商效能	1.61	.23	6.92***	.79
CO工Task—CO諮商效能	1.61	.23	6.92***	.98
CO工Bond—CO諮商效能	.79	.09	8.40***	.67
CI 親—CI 諮商效能	.76	.14	5.38***	.60
CI 工Goal—CO諮商效能	1.00	--	--	.72
CI 工Task—CO諮商效能	.99	.14	7.25***	.81
CI 工Bond—CO諮商效能	.87	.12	7.42***	.83
CI 幸—CI 諮商效能	.96	.20	4.85***	.53
e12—CO 親	6.14	.94	6.54***	.40
e13—CO 工 Goal	3.93	.75	5.23***	.62
e14—CO 工 Task	.36	.77	.47	.97
e15—CO 工 Bond	3.16	.48	6.66***	.45
e16—CI 親	8.04	1.28	6.30***	.37
e17—CI 工 Goal	7.32	1.28	5.73***	.53
e18—CI 工 Task	4.06	.88	4.61***	.66
e19—CI 工 Bond	2.68	.63	4.24***	.69
e20—CI 幸	19.29	2.95	6.54***	.28
e21—CO 諮商效能	3.70	1.10	3.37***	.10
e22—CI 諮商效能	6.28	1.65	3.82***	.22
e12—e15	2.29	.54	4.22***	.52

註：未列標準誤者為參照指標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二) 整體模式適配度考驗

表4-22為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整體適配度考驗結果。首先，在絕對適配度方面，表中顯示， $\chi^2(39, N = 98) = 49.13, p > .05$ ，此結果表示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的 H_0 (虛無假設) 必須接受，即本研究建構的模式與觀察資料符合適配檢定。此外，本研究除了卡方考驗的結果外，亦參酌其他適配度指數來考驗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修正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

首先，在絕對適配度指標上，GFI 指數表示由理論模式所能解釋觀察資料變異數與共變量比例，表4-22指出本模式的GFI指數為.92，符合.90以上的理想數值；RMSEA為漸進殘差均方和平方根、SRMR為標準化殘差均方和平方根，數值愈小表示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越好，小於.05為適配良好的標準(Browne & Cudeck, 1993)，本研究所得的RMSEA與SRMR指數均為.05，剛好符合，表示本模式與觀察資料絕對適配度佳。

其次，相對適配度是理論模式和獨立模式比較的結果，而NFI、NNFI、CFI與IFI指標的數值代表理論模式和獨立模式比較起來能增加多少的適配度。根據表4-21得知，本研究的NFI、NNFI、CFI與IFI依序為0.90、0.97、0.98、0.98，均達到0.90的理想標準值(吳明隆，2009)。

最後，在精簡適配度方面，本研究以PNFI與PGFI為精簡適配度指標，以評估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是否精簡。結果顯示，本研究的PNFI與PGFI分別為0.64與0.54，大於0.5的標準(吳明隆，2009)，顯示本研究建構的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是一個精簡模式。

由上可知，本研究提出的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在整體適配度考驗部分大致符合評鑑標準，顯示本模式與觀察資料有良好適配。

表 4-22

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整體適配度考驗結果

1. 絕對適配指標	(1) Degrees of Freedom = 39 Minimum Fit Function Chi-Square = 49.13 (P = 0.13)
	(2)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 0.92
	(3)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 0.05
	(4)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 = 0.05
2. 相對適配指標	(1) Normed Fit Index (NFI) = 0.90
	(2) Non-Normed Fit Index (NNFI) = 0.97
	(3)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 0.98
	(4)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 = 0.98
3. 簡效適配指標	(1) Parsimony Normed Fit Index (PNFI) = 0.64
	(2) Parsimony Goodness of Fit Index (PGFI) = 0.54

(三) 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考驗

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的評鑑方面，本研究參考學者Bogozzi 與Yi (1998) 所提出的評鑑標準數值。首先，從表4-21中顯示，測量模式中的因素負荷量均達顯著水準， t 值介於4.85到8.40之間， $p < 0.001$ ，符合因素負荷量應達顯著水準的考驗標準，顯示指標變項的效度良好，可以反應它所代表的潛在變項；再者，所參數估計值需達顯著性的檢定，從表4-21中顯示，除了除了e14之外，均達0.001以上的顯著水準。

第三，指標變項的 R^2 反應潛在變項的信度，從表4-23中可知，co工Goal、co工Task、cl工Goal、cl工Task和cl工Bond等五項個別指標信度超過0.50的判斷標準，但co親、co工Bond、cl親與cl幸等四項則未能達到；第四，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部分，為反應測量指標間的一致性指標值，從表4-23中可知，co諮商效能與cl諮商效能兩個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分別為0.86與0.83，均符合在0.60以上的檢核標準；最後，在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數抽取量部分，代表潛在變項所能解釋指標變項變異量的程度，表4-23資料顯示，co諮商效能與cl諮商效能兩個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數抽取量分別為0.61與0.50，也均超過0.50的評鑑標準。

表 4-23

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的個別指標信度、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

變項	個別指標信度	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	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
Co 諮商效能			
co 親	.40		
co 工 Goal	.62	.86	.61
co 工 Task	.96		
co 工 Bond	.45		
Cl 諮商效能			
cl 親	.36		
cl 工 Goal	.52	.83	.50
cl 工 Task	.66		
cl 工 Bond	.69		
cl 幸	.28		

整體而言，有關自我取向與諮商效能關係修正模式的內在品質評鑑，結果顯示測量模式的因素負荷量皆達顯著水準，雖然在測量指標的個別信度上，僅部分符合評鑑標準，但是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和變項的組合信度上的表現均相當理想。以上可見，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尚具足夠理想的內在品質，惟測量指標仍有待更精緻的修正。

綜合言之，有關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修正後的模式之適配度考驗，結果顯示模式有良好的內外品質，整體而言為良好適配模式，能夠反應觀察資料，對了解諮商雙方自我概念取向的契合度與諮商效能關係之影響路徑具有一定參考性。

四、自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模式潛在變項間之效果

基於適配分析結果良好，以下將進一步了解自變項與潛在變項間關係效果。從表 4-21 中可知，獨差異對 Co 諮商效能的直接效果達顯著水準 ($t = -2.98$, $p < 0.01$, $\beta = 0.33$)，獨差異對 Cl 諮商效能的直接效果則未達顯著水準 ($t = -0.64$,

$p > 0.05$)；以及，互差異對 CI 諮商效能的直接效果達顯著水準 ($t = 2.10, p < 0.05, \beta = 0.23$)，但是互差異對 CO 諮商效能的直接效果則未達顯著水準 ($t = 1.28, p > 0.05$)；另外獨差異與互差異亦達顯著相關 ($r = 0.30, p > 0.01$)；最後，CO 諮商效能對 CI 諮商效能的直接效果達顯著水準 ($t = 3.24, p < 0.01, \beta = 0.41$)。

由上可知，研究結果顯示諮商者與個案的自我概念取向契合度，個人取向契合度（獨差異）對諮商者評定的諮商效能有顯著直接預測效果，且為負向關係，意即諮商雙方獨立我契合度愈大，諮商者評定的諮商效能愈差，換句話說，諮商雙方獨立我表現程度差異愈小，諮商者所知覺的諮商效能愈佳；而社會取向契合度（互差異）對個案評定的諮商效能也有顯著的預測效果，但為正向關係，意即諮商雙方互依我的契合度愈大，個案對諮商效能的評定愈佳，換句話說，諮商雙方互依我表現程度差異愈大，個案所知覺的諮商效能愈佳；而且諮商雙方的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自我概念契合度之間有顯著相關；以及，諮商者評定的諮商效能對個案評定的諮商效能有顯著直接預測效果。

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兩節，第一節針對第四章呈現之研究結果加以討論，第二節提出本研究之限制與建議。

第一節 結果討論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究諮商專業工作者與個案各自的雙文化自我概念取向以及彼此間的契合性如何影響諮商效能，研究發現主要包括：一、諮商者與個案的自我概念確實具有雙文化取向的建構表現，且與原量表或個案之平均數比較，諮商者的雙文化自我概念表現顯著偏低；二、在各自雙文化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的關係部分，結果支持諮商者與個案的自我概念，對各自評定的諮商效能有顯著影響；三、針對彼此自我概念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之分析，結果顯示雙方個人取向的契合度對諮商者自評諮商效能有顯著負向影響，換言之，彼此獨立我的表現程度愈契合，能有效預測諮商者對諮商效能的知覺愈佳，另外，雙方社會取向自我概念的契合與個案自評諮商效能也有顯著正向影響，顯示彼此互依我的表現程度愈契合，個案對諮商效能的知覺反而愈不理想；以及，四、無論在自我概念或自我契合對諮商效能的關係模式中，諮商者評定諮商效能對個案評定諮商效能均達顯著影響。

本節將依研究問題順序逐一討論上述研究結果之意義，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二部分分別針對諮商者與個案，討論其雙文化自我概念的表現情形，以及其各自雙文化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之關係，結果和文獻異同之處；第三部分將討論諮商雙方自我概念取向的契合與諮商效能之關係與該結果的意義；最後，第四部分則討論本研究選取之效能指標。

一、諮商者的雙文化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之關係

首先討論諮商者雙文化自我概念表現情形。文獻指出當今華人為兼顧個人「獨立性」與人際「關聯性」雙重需求，已展現出全新的「雙文化自我」(陸洛，2003，2007；楊國樞，2004；Lu & Yang, 2006)。在本研究中諮商者的獨立我和互依我表現，或是兩傾向自我的相關性，均與上述理論相符，顯示出具有雙文化同時並存的自我建構特色，亦與過去研究結果一致(韓貴香，2003；簡晉龍，2003；簡晉龍、李美枝、黃曬莉，2009)。

進一步分析，諮商者的獨立我和互依我的表現，雖然與簡晉龍、李美枝和黃曬莉(2009)的研究結果一致，符合台灣民眾兩傾向自我的分數均有偏高趨勢，且相依我強度高於獨立我強度之情形。但是，諮商者在兩取向自我的平均分數卻都顯著較原量表低，研究者推測，這樣的結果可能反映出從事諮商專業工作者自我概念的文化特色。

楊中芳(2001)曾指出中庸實踐思維的意涵，是一種推崇使自己與萬物的動態和諧均衡的狀態，能以依情境不同而施以變通、均衡的行事思考準則，並且以「誠」為修養，去除偏見與私我，亦即能做到自我的約束，而找到「恰如其分、不偏不倚」的均衡點，因此誠也是實踐中庸的手段；楊氏進一步說明誠就是無我，就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是要求沒有意見在自己心中，自己沒有意見才能接受別人的，也就是一種自我的淡化。研究者認為在養成過程與諮商情境中，諮商者的自我亦受到上述華人社會文化脈絡一定的影響，研究者推測從事諮商專業工作者在以西方理論為基礎的養成過程中，不僅強調自我覺察能力的培養，亦常被訓練成為空白螢幕以反映個案內在，或是做到盡量的價值中立、不坦露自我、區隔工作與個人生活等表現，雖意涵不同，但在諮商情境下，卻可以說同樣是一種類似自我淡化的結果。

此外，簡里娟(2008)針對諮商者情緒智能對療效影響的研究結果中，也發現諮商專業工作者無論在西方情緒智能或華人情緒智能兩表現皆較其他產業工作

者與諮商實習的學生佳，且西方情緒智能中的「情緒評估」因素與華人情緒智能中的「自我修身」因素相關達顯著，以及西方情緒智能的「社交能力」與華人情緒智能的「自我修身」兩因素皆為顯著的療效預測因子。研究者認為簡氏的研究結果亦支持華人情緒管理特性中，自我節制、自我內斂達到致中和與人際和諧的重要性，呼應諮商者的自我表現並非全然為西方理論內涵養成之特性，亦展現出相當華人自我之特性。因此，依據上述諮商者的養成訓練類似自我淡化的結果，以及諮商者自我修身的情緒智能表現佳等討論，研究者認為至少在諮商專業工作與個案的互動的情境下，應可以解釋相較於一般學生或民眾，何以諮商者的雙文化自我強度表現偏弱，但是諮商者的自我修養或是中庸思維的表現特色是否達到一定水準，則尚須以相關量表進一步探究與驗證。

其次，討論諮商者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的關係。研究發現無論諮商者雙文化自我的表現對其自評諮商效能有直接預測效果，而且諮商者評定諮商效能對個案評定諮商效能也有直接影響，均為正向關係，這樣的結果，支持本研究的推論。

從文獻探討中可知，自我概念為人格結構中的重要核心構念、個人經驗彙整的中樞，更是個體行為表現的參照架構，許多研究都指出自我概念和行為、生活適應、人際關係、心理健康關係密切(侯雅齡, 1998; 郭為藩, 1972; 陸洛, 2003); Lu 和 Gilmour(2004)、及 Lu、Gilmour 和 Kao(2001)的研究也發現獨立我對主觀幸福感受有正向影響; 而廖鳳池(1994)的研究更發現諮商者的一般、晤談中和人際三種型態的自我認知，會透過諮商關係或諮商策略為中介途徑，影響到個案的晤談感受。以上的文獻和研究已初步顯示自我與療效的關連性，而本研究結果亦支持這樣的推論，顯示諮商者的自我概念對其自評諮商效能有顯著影響，且諮商者與個案雙方對效能的知覺之間也為正向的影響關係。

進一步檢視，結果顯示諮商者的自我概念中，獨立我的因素負荷量較互依我高，這樣的結果，研究者推測可能與諮商者對諮商效能的知覺，受到諮商情境下自覺角色定位的影響有關。從文獻探討中可知，華人對人際間關係的判斷與互動，

重視情感成分與人情資源，並以其作為劃分親疏程度與情感表露、互動行為等之判斷依據（黃光國，1988；費孝通，1948；楊中芳、彭泗清，2005）。基於此，研究者推測以個案角度來看，作答問卷的情境與問題，可能即為評估在彼此互動中自己的反應與表現，因而可以自然交替運用獨立我與互依我，其中，雖然獨立我有表達自我感受的因素，但仍以互依我的內涵，例如適當的角色、表現適當行為、互依的社會性等因素，更能反應其對關係互動知覺的評估依據。但是，在諮商者的部份，研究者推測，如果仍以華人對自己的表現評分，為依據其身分、位置是否扮演適當角色與行為這樣的概念，那麼對諮商者而言，評估關係親密感中，自己是否了解與關切個案、引起個案共鳴，反而較偏屬評估自己在工作上的專業表現程度，需要理性的思維，而不僅僅是反應對關係的知覺感受，因而形成其對關係親密感與工作同盟的評估，可能會以個人取向自我概念有較強的運作影響。

另外，結果顯示諮商者的自我概念對個案評定的諮商效能之間的影響路徑未達顯著，但是廖鳳池（1994）的研究顯示諮商者的自我認知是透過諮商關係中介而影響個案晤談感受的結果，而本研究諮商效能的測量指標採工作同盟與關係親密感，偏屬對諮商關係的知覺評估，加以研究結果顯示諮商者之覺得諮商效能對個案評定的效能確實有正向影響。因此，研究者推測雖然諮商者的自我概念對個案評定的諮商效能未能有直接影響，但這樣的結果並不代表諮商者的自我概念對個案的效能知覺沒有影響力，而是諮商者的自我概念對個案的效能知覺，是透過諮商關係才對個案有所影響，如此中介影響的可能性，也留待自我取向契合與諮商效能關係的部份再進行相關討論。此外，研究者認為此結果也可能和諮商者在諮商情境中常須維持專業工作者角色、表現出空白螢幕等自我內斂態度有所關連，致使個案對諮商者自我概念表現的感受，或許就不容易明顯與直接地知覺。

因此，研究結果發現諮商者自我概念對自評諮商效能的影響顯著，諮商者評定諮商效能對個案評定諮商效能也有直接預測效果，但諮商者以運作獨立我對諮商效能的知覺之解釋，是否如研究者推測可能是一種文化因素的隱性影響，以及

諮商者的自我概念是否具有中庸思維的特性，均尚需進一步研究釐清。

二、個案的雙文化自我概念取向與諮商效能之關係

仍先討論個案的雙文化自我概念表現情形。此部份與諮商者的相同，個案顯示出具有雙文化同時並存的自我建構特色，且個案獨立我和互依我之表現，則與簡晉龍、李美枝和黃曬莉（2009）的研究結果一致，符合兩取向自我的分數均偏高、且相依我強度高於獨立我強度之情形。甚且，個案雙文化的強度表現顯著高於原量表資料，因此研究者認為此結果可能顯示本研究參與者個案的樣本部分，反映新世代下多元社會文化匯流，雙文化取向有更為偏高的趨勢之表現。

再者，討論個案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的關係。研究發現個案自我概念的表現與其自評的諮商效能達顯著影響。

與諮商者相同，結果顯示個案自我概念對自評諮商效能的影響顯著。從個案雙文化取向均偏高的表現，以及，文獻指出個人認同的文化價值與信念對個人的主觀幸福感才有意義與助益（陸洛、翁克成，2007）。據此，研究者推測這樣的結果，一方面和本研究中的個案樣本以大學生為主、平均年齡 20 歲有關，該族群受到媒體資訊和西方社會文化影響深厚，更容易擁有追求自尊之個人價值、透過自我控制以獲得個人幸福的概念；另一方面，從簡晉龍、李美枝和黃曬莉（2009）針對自我建構探討幸福感來源因素的相關研究結果中，可以發現相依我以與他人的相融和諧獲得其幸福感，但獨立我的「自我表達」因素亦有助於與人相融和諧，因而獨立我透過整體自尊也影響個人主觀幸福，表示當前年輕學子們的幸福感受，與華人所重視的文化價值與互依我也可能有關。對應本研究結果，個案互依我與獨立我對自我概念的因素負荷量均達顯著，而自我概念也對諮商效能有直接預測效果。

總之，研究結果顯示個案自我概念兩取向表現均偏高的情形符合文獻，也發現個案自我概念能有效預測本身對諮商效能的知覺，而其對療效的知覺亦受諮商者評定諮商效能顯著影響。

三、諮商者和個案自我概念的契合與諮商效能之關係

以下討論有關諮商雙方自我契合與效能間的分析結果與其意涵。

(一) 個人取向自我概念的契合對諮商者評定的諮商效能有直接顯著影響

在本研究中，發現諮商者與個案在配對下，雙方獨立我的契合度，對諮商者評定諮商效能有直接預測效果，呈現負向關係；以及，諮商者評定的諮商效能對個案評定的諮商效能有直接預測效果。此結果顯示雙方獨立我的差異愈大，諮商者對效能的知覺愈差，換言之，雙方獨立我愈契合，諮商者對諮商效能的知覺愈佳，而且諮商者所知覺的效能愈佳，個案對效能的評定也愈佳。

呼應 Wampold (2007)指出必須關注諮商者與個案人際交互作用的影響，且相關研究文獻顯示人際雙方的自我概念契合度與關係品質具有顯著相關，個人與社會取向表現的差異，帶來不同的情感感受（高旭繁、陸洛，2006；張依君，2009；陳芬憶，2001；陸洛、翁克成，2007）。據上述文獻，本研究推論諮商者與個案雙方的自我概念取向之契合性愈高，應對諮商關係的建立有助益，意即有較好的諮商效能，由此可見，研究結果支持這樣的推論。另外，結果顯示諮商者與個案雙方對效能的知覺之間也為正向的影響關係，也與相關研究文獻一致（張依君，2009；陸洛、翁克成，2007；廖鳳池，1994），呈現關係品質與正向感受相關的情形。

此外，此結果之意涵，若再與前述研究結果：「諮商者與個案的自我概念對其自評諮商效能的知覺均有顯著影響」，以及諮商者與個案對效能的評定間有正向影響關係的發現同時討論，或許可以更能清楚發現自我概念契合與效能的關聯，可以歸納出若諮商者和個案具有愈相同程度、愈高的獨立我，能帶來愈佳的諮商效能。

總之，研究發現諮商雙方獨立我愈契合，諮商者對諮商效能的知覺愈佳，而諮商者所知覺的效能愈佳，個案對效能的評定也愈佳。不過，或許此結果部分反映諮商歷程中，西方個人主義所強調的價值之影響力，但值得注意的是，文獻也

指出諮商介入須符合華人看重關係和諧和社會秩序的文化脈絡、人我關係協調的目標下，才能發揮療效（范嵐欣，2008；陳秉華，2001；陳秉華、李素芬、林美珣，2008；趙容嬋，2010）。因此，雖然研究結果顯示個人取向自我概念的契合對諮商關係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是自我概念對諮商關係的影響機制，還需要更多的探究，值得未來研究繼續關注。

（二）社會取向自我概念的契合對個案評定的諮商效能有直接顯著影響

從文獻探討可知，關係對華人形塑自我有重要影響，發展出「關係中的自己」的互依自我之構念，且儘管社會變遷，互依自我仍傳承著對華人文化中所核心關注的人我關係與和諧（陸洛，2003、2007；楊中芳，1991b；楊國樞，2005b；Ho, 1995）。然而，研究結果發現互依我的契合程度對個案評定的諮商效能有顯著影響，可是，在這樣的關係互動中，結果顯示影響效能的變項，並非雙方互依我愈相似，反而是雙方互依我的差異愈大，個案對的諮商效能的知覺愈佳。

首先，研究者認為此結果可能顯示在配對的人際互動中，個案運作互依我或受互依我影響的程度可能比受獨立我影響的程度更多，以及個案對諮商關係的定位或感受，並非華人傳統的上下位階特性等涵意，但是，也顯示所謂的相融和諧關係的意涵可能不如研究者初始對文獻的理解與預設，相融和諧的關係可能並不一定代表雙方互依自我的契合，貼近華人案主的文化脈絡也不一定表示雙方互依我表現程度一致。

從文獻探討可知，在華人文化的脈絡下，整體的自我概念會依涉及的互動場域或情境的合適性，運作不同社會取向和個人取向的心理特性（楊國樞，2004），且華人展現的本來就是一種能依據不同情境表現出不同價值與態度的「互依包容的自我」（陸洛，2003），均說明華人互依自我建構與運作方式的複雜性。因此，研究者推測，可能在諮商情境下，個案對諮商關係的感受，與生活中其他人際互動類型和人我關係困擾，有不同的知覺定位，因而互依我的強度高，展現對維繫相融和諧的影響，對諮商關係反而有益；又或許，因獨立我和互依我的契合度有

顯著相關，因而在與獨立我契合的影響同時發生下，互依我的表現差異愈大，對諮商關係的影響才反而可能產生正向作用；也因個案自我概念對其自評諮商效能有顯著影響，所以當個案的互依我傾向愈高，或許可能表示其運作互依我來幫助自己進行關係交往與情境表現等適應之能力愈佳。限於本研究的限制，無論上述何種解釋的可能性，都需要後續更多的文獻探討或研究探究澄清，但是這樣的結果也更加反映華人互依自我建構與對人際關係影響的複雜性，無法以簡單的路徑就能清楚說明與理解，實是研究華人療效或諮商關係，重要但不容易克服的議題。

此外，雖然文獻指出現代華人同時具備個人與社會兩種自我取向，但也證實原生的社會取向自我影響大於個人取向自我（楊國樞，2004；簡晉龍、李美枝、黃曬莉，2009）。不過，上述討論卻可以發現雙方自我的契合與療效的感受間，似乎個案受到互依我的契合影響較多，而諮商者受到獨立我契合的影響較多。研究者推測這樣的結果可能顯示在諮商專業工作的情境下，為符合專業人員的角色定位與推動諮商架構，諮商者以個人取向自我概念的運作較強，對彼此在工作內容的共識形成投入較多關注；然而，個案的角色不需要這些後設思考，反而能夠在諮商關係中，自然地顯現出受社會取向自我概念差異程度的影響較強。意即，研究者推測，這樣的結果，或許也與華人重視依據自己在群體中的身分做出合宜的行為之文化特性並無二致(hsu, 1985)，為具有文化意涵之結果。

綜合言之，研究結果顯示諮商者和個案具有愈相同程度、愈高的個人取向自我，能帶來愈佳的諮商效能，但是雙方社會取向自我的表現差異愈大，個案對效能的知覺反而愈佳。但是，社會取向自我概念與彼此的契合，如何透過諮商關係情境影響雙方對效能的知覺與評定，仍需要進一步研究釐清。

四、關係親密感與幸福感可做為諮商效能指標之一

為能反映華人內在心理特性與對諮商關係的知覺，透過文獻探討，本研究初次採用關係親密感與幸福感作為諮商效能指標，在本研究中，分別以社會互動量表與中國人幸福感作為測量之工具。所以亦特別討論該此部份之意涵。

文獻指出諮商關係是跨情境療效因子的核心，對於正向的諮商成效有顯著且實質的貢獻，特別是針對工作同盟對療效影響與預測的研究，更是獲得相當一致的支持(Beutler et al., 2004; Horvath, 2001; Horvath & Greenberg, 1994; Horvath & Symonds, 1991; Pos, Greenberg, & Warwar, 2009; Wampold, 2001, 2007)。但是，文獻探討中也發現華人個案對諮商既定關係中人情互動的法則，與西方工作同盟關係的內涵有所不同。

華人文化強調關係取向，人際關係更被視為是一種情感型態，關係現象呈現豐富的內涵與獨特性，因而華人的關係具有情感成分決定親疏關係的特性，而親密感是社會互動轉化為人際關係的重要基礎，是關係親疏程度的關鍵（林以正、黃金蘭，2006；陸洛，2003；黃光國，1988；楊國樞，2004；鄭伯壘，1999），文獻亦支持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兩因素對親密感歷程的重要性，與正向諮商關係發展之知覺密切相關（林以正、黃金蘭，2006；陳斐娟，1996；許雅惠，2009；Collins & Miller, 1994; Derlega, Metts, Petronio, & Margulis, 1993; Stricker & Fisher, 1990; Wheelless & Grotz, 1977)。而在心理健康與文化意涵的部分，文獻探討中也顯現幸福感與心理健康、正向情感的意義密切關連，並具不同的文化內涵，華人對情感和幸福的認定與反映，偏受其關係狀態的影響，更偏愛和諧等內在感受（陸洛，1998；李怡真，2009；簡晉龍，2003；Lu, 2005, 2008)。因而，研究者採以關係親密感與幸福感，作為契合華人關係建構歷程與反映內在情感感受之工具，此部份獲得研究結果支持。

基於本研究結果，兩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之結果，無論在諮商者和個案的版本分別皆有良好之表現，且均與已被廣泛使用作為治療效果指標的工作同盟量表之相關達顯著水準，另外也在潛在變項的因素負荷量均大致表現良好。由此可見，關係親密感與中國人幸福感應能反映華人心理內在與對關係的知覺，以及華人關係建構歷程，可做為效能指標之一，值得未來針對諮商效能之相關研究繼續採用。

第二節 限制與建議

本節將整合對研究結果、討論及研究流程與方法，提出本研究之限制與建議。

一、雙文化自我概念取向與諮商效能的關係方面

本研究結果發現諮商者與個案的雙文化自我概念及其契合與諮商效能間具有一定之關聯與影響。以具有華人文化意涵的自我概念結構為出發，並蒐集諮商者與個案的配對資料，以實徵的方式探索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的關係與影響，結果發現諮商雙方各自的自我概念均對其自評諮商效能有顯著影響，且雙方個人取向自我概念的契合對諮商者知覺的諮商效能有顯著影響、社會取向自我概念的契合對個案知覺的諮商效能也有顯著影響，此為本研究之主要貢獻。

然而，本研究結果僅能呈現雙文化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間確實有相關，至於其中的影響歷程或機制仍無法有清楚樣貌（如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自我概念的運作方式及諮商者與個案的運作差異、兩取向自我契合程度對雙方的意涵、及個案互依我對諮商關係的定位與感受等）。建議未來研究可再採取質性研究，例如訪談、晤談逐字稿分析等；或是增加中介變項的研究設計，如諮商者的諮商策略、焦慮情緒等影響路徑；或是蒐集更多足夠的樣本資料，將雙方的自我取向強度差異情形進行更細緻的分組，了解不同的配對組別與療效的關係；另外，基於研究結果顯示契合度與雙方對關係的知覺密切關連，因此若將諮商關係作為中介變項，更改以來談問題改善、心理症狀增減等評估，作為效能指標，或許也可以更加釐清其中影響機制。以上研究建議，均是期待能對雙文化自我概念與諮商效能間之關連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另外，針對本研究結果發現互依我在關係契合的分析中，彼此差異愈大對個案知覺的諮商效能有顯著影響，此點是否與互依我具有「情境中心取向」、「關係中的自我」的文化特性有關，以及互依我對諮商者是否具有潛在影響，致使諮商者基於諮商工作情境下的角色定位，因而獨立我的表現程度較強，以上問題均仍

待進一步探究釐清，但一致呈現在華人文化脈絡下所孕育而來的互依我，不僅內涵複雜，且確實與關係具有密切關連，顯示未來研究諮商效能相關議題時，文化因素和互依我對諮商關係的影響，不僅是無法忽略的考量，更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最後，具備多元文化意識與技能、了解案主的文化脈絡，是維護案主最佳利益的重要倫理守則，在此觀點中，諮商者必須對自我文化、價值觀與其影響進行探索，有所自我覺察（陳秉華，2003；Sue & Sue, 2007）。研究者認為在台灣的諮商專業工作者受到人我關係與東西方文化衝擊影響，在如此養成過程與文化內涵交錯的背景下，對自身這個重要的諮商工具，以及與諮商效能的關係應有更多瞭解，同時基於本研究結果，建議諮商工作者在華人文化的諮商情境中，了解自己、個案與諮商關係皆受到雙文化自我建構影響的狀態，在此脈絡的幫助下，朝向雙元自我平衡的發展、彈性的運作，對自我和諮商工作的覺察、省思及調整，能有更務實的依據。

二、研究設計方面

在資料蒐集方面，樣本數會影響統計方法與結果推論的適用性與穩定度，然而本研究需要諮商者與個案配對研究，涉及個案的隱私和意願，影響到諮商者與機構的參與度，蒐集資料的困難度因而增加，另外，限於人力與時程上的不足，也使得回收狀況未盡理想。因此，整體樣本數較少，以及本研究參與者多集中於學校工作場域，個案樣本以學生為主、諮商者的專業工作年資歷較為年輕的狀況，是為推論本研究結果之限制。就此，研究者建議，未來若仍要進行配對的研究設計，需要預留更長的時間，並擴充精神醫療機構或社區諮商機構等場域，以蒐集足夠與多樣性的資料。

在模式架構與驗證方面，雖然結果顯示本研究架構的理論模式適配度評鑑結果尚屬理想，但也發現自我概念或諮商效能兩部分潛在變項中，可能存在其他尚未被涵括的觀察指標或關係路徑，此結果更顯示要確實澄清與理解療效因子的不容易，以及要反映現代華人自我建構，或許可以採用其他具有文化意涵的自我概

念量表，但自我對療效具有影響的方向，大致無誤，建議未來相關研究繼續探究，以累積更多資料。

另外，本研究採取社會互動量表測量諮商者與個案對彼此關係親密感的知覺，原量表有良好之信效度，但是本研究在諮商者版本的部份，為避免諮商者填寫時有語意突兀之感，修改部分題目敘述，將「自我表露」兩個項目修改成「知覺個案之自我表露程度」，因而取得諮商者版本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略低，雖仍在可接受的範圍，然而嚴謹視之，此點亦為推論本研究結果之限制。若後續仍採以配對的研究設計時，恐怕須要注意此問題，例如增加評量之題目或是先建構修改題目後的量表之信效度等方式予以克服。

總之，綜合本章討論，本研究提出以下結論。本研究採以雙文化自我概念的建構反映華人心理特色，並對諮商效能與自我概念之關係提供實證支持，結果顯示無論諮商者和個案自我概念對自評的諮商效能之影響均達顯著，且為正向關係；在自我概念契合的部分，諮商雙方在個人取向自我概念的差異程度，對諮商者自評諮商效能有顯著負向影響，在社會取向自我概念的差異程度，則對個案評定諮商效能有顯著正向影響。此外，透過文獻探討與研究結果，本研究也顯示關係親密感與中國人幸福感量表可做為具有文化意涵之效能指標。最後，依據研究結果對未來研究方向提出建議外，為促進諮商的正向發展，對從事諮商專業工作者建議，須檢視本身與個案自我概念取向的表現程度，以及雙方的差異在諮商關係建立歷程中隱含之影響。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王怡文、陳亮全、黃光國 (2006)：華人社會中的信任策略。**本土心理學研究**，25，199-241。
- 王叢桂 (2004)：家暴事件中助人工作者的專業判斷與和諧價值觀的關聯。**本土心理學研究**，21，127-161。
- 李怡真 (2009)：安適幸福感的構念發展與情緒調控機制之探討。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邢占軍 (2005)：對主觀幸福感測量的反思。**本土心理學研究**，24，301-323。
- 林以正、黃金蘭 (2006)：親密感之日常社會互動基礎：一個縱貫式的研究。**中華心理學刊**，48 (1)，35-52。
- 吳明隆 (2009)：結構方程模式 AMOS 的操作與應用。台北：五南。
- 侯雅齡 (1998) 自我概念理論新趨向：多向度階層化建構。**輔導季刊**，34 (1)，11-23。
- 洪莉竹、陳秉華 (2005)：臺灣諮商人員對西方諮商與華人文化信念衝突與轉化經驗。**教育心理學報**，37 (1)，79-98。
- 范嵐欣 (2008)：華人夫妻關係衝突之人我關係協調諮商改變歷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論文。
- 高旭繁、陸洛 (2006)：夫妻傳統性現代性的契合與婚姻適應之關聯。**本土心理學研究**，25，47-100。
- 張依君 (2009)：個人傳統性—現代性心理特徵、個人—組織契合度對幸福感之影響—職場關係品質的調節效果。南台科技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春興 (1989)：張氏心理學辭典。台北：東華。
- 張娟鳳 (2001)：短期諮商的效能因素與工作同盟之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2 (2)，71-102。
- 張詩音 (2007)：人際關係中的情緒表現。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雅惠 (2009)：台灣諮商人員諮商關係建構經驗之分析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6，85-119。

- 郭為藩 (1972)：自我心理學。台南：開山。
- 陳秉華 (2001)：華人「人我關係協調」之諮商工作架構。測驗與輔導，167，3511-3515。
- 陳秉華 (2003)：重建台灣/華人諮商倫理的文化思考。亞洲輔導學報，10 (1)，11-32。
- 陳秉華、李素芬、林美珣 (2008)：諮商中伴侶關係的自我協調歷程。本土心理學研究，29，117-282。
- 陳芬憶 (2001)：親子在個人傳統性/現代性及孝道上的契合與幸福感之相關。高雄醫學大學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祥美 (2005)：台灣地區心理諮商本土化經驗之初探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所博士論文。
- 陳斐娟 (1996)：諮商歷程中的重要事件、工作同盟與諮商結果之分析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陸洛 (1998)：中國人幸福感之內涵、測量及相關因素探討。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8，115-137。
- 陸洛 (2003)：人我關係之界定----折衷自我的現身。本土心理學研究，20，139-207。
- 陸洛 (2007)：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自我觀：概念分析與實徵測量。中美教育評論，4 (2)，1-23。
- 陸洛、翁克成 (2007)：師生的心理傳統性與現代性、關係契合性對師生互動品質及學生心理福祉的影響。本土心理學研究，27，81-118。
- 陸洛、高旭繁、陳芬憶 (2006)：傳統性、現代性、及孝道觀念對幸福感的影響：一項親子對偶設計。本土化心理學研究，25，243-278。
- 曾文星 (1996)：從文化的角度談華人的心理治療。載於曾文星 (主編)，華人的心理與治療 (655-678)。台北：桂冠。
- 曾素真 (2010)：情感關係中女性失去自我的經驗與自我的轉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論文。
- 費孝通 (1948)：鄉土中國。台北：綠洲。
- 黃光國 (1988)：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載於黃光國 (主編)，中國人的權力遊戲 (7-55)。台北：巨流。

- 黃光國 (2001): 儒家關係主義的理論建構及其方法論基礎。教育與社會研究, 2, 1-34。
- 黃光國 (2005): 心理學本土化的方法論基礎。載於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 (主編), 華人本土心理學 (上冊) (57-79)。台北: 遠流。
- 楊中芳 (1991a): 回顧港台「自我」研究: 反思與展望。載於楊中芳、高尚仁 (主編), 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 (15-92)。台北: 遠流。
- 楊中芳 (1991b): 試論中國人的「自己」: 理論與研究方向。載於楊中芳、高尚仁 (主編), 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 (93-146)。台北: 遠流。
- 楊中芳 (2001): 中國人的世界觀: 中庸實踐思維初探。載於楊中芳 (主編), 如何理解中國人: 文化與個人論文集 (269-287)。台北: 遠流。
- 楊中芳、彭泗清 (2005): 人際交往中的人情與關係: 概念化與研究方向。載於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 (主編), 華人本土心理學 (下冊) (483-519)。台北: 遠流。
- 楊國樞 (2004): 華人自我的理論分析與實徵研究: 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的觀點。本土心理學研究, 22, 11-80。
- 楊國樞 (2005a): 本土心理學的意義與發展。載於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 (主編), 華人本土心理學 (上冊) (3-54)。台北: 遠流。
- 楊國樞 (2005b): 華人社會取向的理論分析。載於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 (主編), 華人本土心理學 (上冊) (172-213)。台北: 遠流。
- 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 (2001): 中國人的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 概念與測量。載於楊國樞、黃光國 (主編), 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 (241-306)。台北: 桂冠。
- 楊國樞、陸洛 (2005): 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心理特徵: 概念分析與實徵衡鑑。本土心理學研究, 23, 71-143。
- 葉寶玲 (2010) 華人家庭倫理脈絡下諮商師透過個人心理治療與母親情感關係改變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論文。
- 廖鳳池 (1994): 諮商員自我認知對諮商關係暨諮商行為影響之研究。中華輔導學報, 2, 1-24。
- 趙容嬋 (2010): 從「忍氣吞聲」到「輕安自在」: 自我與人際拿捏困境者之諮商經驗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論文。
- 趙曉美 (2001): 自我概念多層面階層結構之驗證暨增進自我概念課程之實驗效

果。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博士論文。

劉琨輝 (2001)：臨床心理學 (一) 理論基礎。台北：天馬。

鄭伯璜 (1999)：華人人際關係研究的困境與出路。本土心理學研究，12，203-214。

韓貴香 (2003)：自我概念差異、不同生活向度滿足與正負向情感感受之關係—以台灣女性幼教老師為例。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6 (4)，1-22。

簡里娟 (2008)：臺灣諮商與心理治療專業工作者的情緒智力與治療效能之關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論文。

簡晉龍 (2003)：自我建構與主觀幸福感：自尊與相融和諧的角色。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簡晉龍、李美枝、黃曬莉 (2009)：幸福之路：雙重自我建構的分流與匯合。中華心理學刊，51 (4)，453-470

簡華姝 (2007)：華人文化脈絡中諮商與心理輔導專業工作者之反移情處理能力、孝道信念與順道行為對諮商效能的影響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論文。

西文部分

- Bachelor, A. (1988). How clients perceive therapist empathy: A content analysis of “received” empathy.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5(2), 227-240.
- Baldwin, S., Wampold, B., & Imel, Z. (2007). Untangling the alliance-outcome correlation: Explor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rapist and patient variability in the allianc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5(6), 842-852.
- Baskin, T., Tierney, S., Minami, T., & Wampold, B. (2003). Establishing specificity in psychotherapy: A meta-analysis of structural equivalence of placebo control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1(6), 973-979.
- Baxter, L. A. (1979). Self disclosure as a relationship disengagement strategy: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5(3), 215-222.
- Bagozzi, R. P., & Yi, Y. (1998). On the evalu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Academic of Marketing Science*, 16, 76-94.
- Beutler, L. E., Malik, M., Laimohamed, S., Harwood, T. M., Talebi, H., Noble, S., & Wong, E. (2004). Therapist variables. In M. J. Lambert (Eds.), *Handbook of psychotherapy and behavior change* (5th ed., pp. 227-306). New York, NY: Wiley.
- Bike, D., Norcross, J., & Schatz, D. (2009). Processes and outcomes of psychotherapists' personal therapy: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20 years later.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Training*, 46(1), 19-31.
- Blatt, S., Sanislow, C., Zuroff, D., & Pilkonis, P. (1996). Characteristics of effective therapists: Further analyses of data from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gram.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4(6), 1276-1284.
- Bordin, E. S. (1979).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the psychoanalytic concept of the working alliance.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6, 252-260.
- Bowman, D., Scogin, F., Floyd, M., & McKendree-Smith, N. (2001). Psychotherapy length of stay and outcome: A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herapist sex.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Training*, 38(2), 142-148.
- Browne, M. W. & Cudeck, R. (1993). Alternative ways of assessing model fit. In: K. A. Bollen & J. S. Long (Eds.), *Tes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pp. 136-162). Newbury Park, CA: Sage.

- Busseri, G. M. & Tyler, J. D. (2003). Interchangeability of the working alliance inventory and working alliance inventory, short form.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5 (2), 193-197.
- Collins, N. L., & Miller, L. C. (1994). Self-disclosure and liking: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6(3), 457.
- Cozby, P. C. (1973). Self-disclosure: A literature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9(2), 73.
- Derlega, V. J., Metts, S., Petronio, S., & Margulis, S. T. (1993). *Self-disclosure*. Newbury Park, CA: Sage
- Farber, B. A., & Metzger, J. A. (2009). The therapist as secure base. In J. H., Obegi, & E. Berant (Eds), *Attachment theory and research in clinical work with adults*. (pp. 46-70). New York, NY: Guilford.
- Fonagy, P., & Target, M. (2002). Early interven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lf-regulation. *Psychoanalytic Inquiry*, 22(3), 307-335.
- Gable, S. L., Reis, H., Impett, E. A. & Asher, E. R. (2004). What do you do when things go right? The intra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benefits of sharing positive ev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228-245.
- Ho, D. Y. F. (1995). Selfhood and identity in Confucianism, Taoism, Buddhism, and Hinduism: Constructs with the west.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25, 115-139.
- Horvath, A. (2001). The alliance.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Training*, 38(4), 365-372.
- Horvath, A. O., & Greenberg, L. S. (Eds.). (1994). *The working alliance: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Sons.
- Horvath, A. O., & Symonds, B. D. (1991). Relation between working alliance and outcome in psychotherapy: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38, 139-149.
- Horvath, A. O., Del Re, A., Flückiger, C., & Symonds, B. D. (2011). Alliance in individual psychotherapy. In J. C. Norcross (Ed.), *Psychotherapy relationships that work* (2nd ed., pp.17-32).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su, F. L. K. (1985). The self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In A. J. Marsella, G. Devos & F. L. K. Hsu (Eds.), *Culture and self: 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 (pp.

24-55). New York, NY: Tavistock.

- Hunsley, J., & Lee, C. (2007). Research-informed benchmarks for psychological treatments: Efficacy studies, effectiveness studies, and beyond.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38(1), 21-33.
- Hwang, K. H. (2009). Self-cultivation: Culturally sensitive psychotherapies in confucian societies.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7(7), 1010-1032.
- Ibrahim, F. A. (2001). Worldview: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needed directions. In J. G. Ponterotto, J. M. Casas, L. A. Suzuki, & C. M. Alexander (Eds.), *Handbook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2nd ed., pp.425-456).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Jennings, L., & Skovholt, T. (1999). The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rel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aster therapist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6(1), 3-11.
- Lambert, M., & Barley, D. (2001). Research summary on the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and psychotherapy outcome.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Training*, 38(4), 357-361.
- Lu, L. (2005).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The cultural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WB.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47(2), 99-112.
- Lu, L. (2008). Culture, self,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ultur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Psychologia*, 51, 290-303.
- Lu, L., & Yang, K. S. (2006). The emergenc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traditional-modern bicultural self of people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ocietie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9, 167-175.
- Lu, L., & Gilmour, R. (2007). Developing a new measure of independent and interdependent views of the self.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1, 249-257.
- Lu, L., & Gilmour, R. (2004). Culture, self and ways to achieve SWB: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Chinese Societies*, 5, 269-291.
- Lu, L., Gilmour, R. & Kao, S.F. (2001). Culture values and happiness: An east-west dialogu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1,447-493.
- Lutz, W., Leon, S., Martinovich, Z., Lyons, J., & Stiles, W. (2007). Therapist effects in outpatient psychotherapy: A three-level growth curve approach.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4(1), 32-39.

- Markus, H. R., & Kitayma S. (1991). Culture and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2), 224-253.
- Martin, D. J., Garske, J. P., & Davis, M. K. (2000). Relation of the therapeutic alliance with outcome and other variables: A meta-analytic review.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8(3), 438-450.
- Orlinsky, D. E., Ronnestad, M. H. & Willutzki, U. (2004). Fifty years of psychotherapy process-outcome research: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 J. Lambert (Ed.), *Handbook of psychotherapy and behavior change* (5th ed., pp. 307-389). New York, NY: Wiley.
- Owen, J., Wong, Y., & Rodolfa, E. (2009). Empirical search for psychotherapists' gender competence in psychotherapy.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Training*, 46(4), 448-458.
- Pedersen, P. (2000). *A handbook for developing multicultural awareness* (3rd ed.), Alexandria, VA: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 Pistole, M. C. (1999). Caregiving in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A perspective for counselors.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77, 437-446.
- Pos, A., Greenberg, L., & Warwar, S. (2009). Testing a model of change in the experiential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7(6), 1055-1066.
- Sroufe, L. A. (2005). Attachment and development: A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 from birth to adulthood. *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 7, 349-367.
- Stricker, G., & Fisher, M. (1990). *Self-disclosure in the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New York, NY: Plenum.
- Sue, D. W., & Sue, D. (2007). *Counseling the culturally diverse: Theory and practice* (5th ed.).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 Triandis, H. C. (2001).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nd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9(6), 907-924.
- Vasquez, M. J. T., & Texas, A. (2007).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the therapeutic alliance: An evidence-based analysi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2(8), 878-885.
- Wampold, B. E. (2001). *The great psychotherapy debate: Model, methods, and findings*. Mahwah, NJ: Erlbaum.
- Wampold, B. E. (2007). Psychotherapy: The humanistic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62(8), 857-873.

Wampold, B. E., & Brown, G. (2005). Estimating variability in outcomes attributable to therapists: A naturalistic study of outcomes in managed car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3(5), 914-923.

Wheless, L. R., & Grotz, J. (1977). The measurement of trust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elf disclosure.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3), 250-257.

Yang, K. S. (1999). Towards an Indigenous Chinese Psychology: A Selective Review of Methodological,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ccomplishments.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41(2), 181-211.

Yang, K. S. (2000). Monocultural and cross-cultural indigenous approaches: The royal ro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balanced global psychology.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 241-263.

Zuroff, D., & Blatt, S. (2006). The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in the brief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Contributions to clinical improvement and enhanced adaptive capaciti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4(1), 130-140.

附錄

附錄一 諮商專業工作人員版問卷

專業人員版

研究邀請函

親愛的諮商與心理治療工作者，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生江曉珍，目前在王麗斐教授指導下，進行碩士論文研究。首先感謝您願意參與本研究，提供您寶貴的時間與經驗為本研究蒐集資料。本研究欲探討文化對自我的影響與專業工作的關係，以期作為提昇國內諮商與心理治療的專業服務品質與當事人的福祉之參考。本研究需要您以及一位正在與您晤談三次(含三次)以上的個案一同參與，研究不會佔用太多時間，請您與個案在晤談完後約花 5-10 分鐘填寫量表即可。以下是關於參與本研究的說明，請您詳閱，謝謝！

一、關於諮商與心理治療專業人員

1. 本研究需要從事心理治療專業工作人員參與，包含學校輔導、諮商心理、社會工作、精神醫療等相關領域。全職實習諮商/治療人員亦可參與。
2. 您與個案的資料均以不記名方式處理，僅作學術研究之用，絕對保密，請您放心。

二、關於個案

1. 本研究需要治療師與個案配對參與，因此請您邀請一位與您晤談三次(含三次)以上正在晤談的個案一同參與研究。
2. 個案的性別與晤談議題不拘，但需年滿 16 歲。
3. 本研究需要大量的研究參與者，因此您與個案的參與非常重要。但本研究絕對尊重研究參與者的權益和參與意願，若個案堅持不願意，本研究仍尊重其意願，並請告知其諮商權益完全不受參與本研究與否影響。

三、實施程序

1. 請您邀請一位願意參與研究、且與您以晤談超過三次以上、正在晤談的個案，簡單說明本研究目的、參與方式與保密原則，以徵得對方的同意。
2. 問卷分成專業人員版與當事人版，您所填寫的為「專業人員版」、個案填寫「當事人版」。請您於其中一次的晤談結束後，與個案分別花約5~10 分鐘、立即填寫問卷。
3. 本研究提供回郵信封，請您與個案填答完後，將問卷放入回郵信封內並密封，由您一同寄回。原先裝問卷的透明資料夾敬請留下，為感謝您參與本研究之回饋，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4. 請您於填答後一週內寄回。

竭誠邀請您參與本研究，若您有任何疑問或建議，或與瞭解研究結果，歡迎您以下列方式與我聯繫。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
指導教授 王麗斐教授
研究生 江曉珍敬上
聯絡方式：09*****
100 年 11 月 18 日

文化信念與專業效能問卷

親愛的諮商與心理治療工作者，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冗填答本問卷！本研究欲瞭解文化對自我的影響與專業工作的關係。您提供的所有資料將僅供學術研究之用，個人隱私資料絕對保密，請您放心填答！

本問卷中的題目並無正確答案，請依照您的真實情況作答即可。答案沒有對錯之分，通常您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最好的答案！作答完後，請您務必再檢查一次，確認每一題都有作答。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與我聯繫！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

指導教授 王麗斐教授

研究生 江曉珍敬上

聯絡方式：09*****

【基本資料】

1. 性別：(1) 男 (2) 女，實足年齡：_____歲
2. 晤談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填答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本次晤談為第____次晤談。
3. 婚姻狀況：(1) 未婚 (2) 已婚 (3) 離婚/分居 (4) 其他：_____
4. 專業工作年資：_____年（不含兼職、全職實習）
5. 教育程度：(1) 學士畢 (2) 碩士生 (3) 碩士畢 (4) 博士生 (5) 博士畢
6. 專業身分：(1) 諮商心理師 (2) 臨床心理師 (3) 精神科醫師 (4) 輔導教師
(5) 社工師 (6) 社工員 (7) 護理人員 (8) 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
(9) 全職實習臨床心理師 (10) 其他：_____
7. 工作區域：(1) 北部(基隆、台北、桃園、新竹) (2) 中部(苗栗、台中、彰化、雲林、南投)
(3) 南部(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4) 東部(宜蘭、花蓮、台東)
(5) 離島(澎湖、金門、馬祖) (6) 其他：_____
8. 工作地點：(1) 學校機構 (2) 精神醫療 (3) 社區機構 (4) 企業機構
(5) 戒治機構 (6) 私人執業 (7) 其他：_____
9. 目前是否有督導：(1) 有，每週_____小時。 (2) 無
10. 專業證照：(1) 有，• 心理師， 社工師 *f* 醫師 „ 教師 ... 護士
† 護理師 *‡* 其他：_____ (2) 無。
11. 此個案的主訴議題：(請圈選一個最主要的來談議題，若無符合選項，請在其他註明。)
(1) 自我探索 (2) 人際關係 (3) 情緒困擾 (4) 感情問題 (5) 家庭問題
(6) 生涯議題 (7) 課業學習 (8) 親子教養 (9) 婚姻關係 (10) 壓力調適
(11) 經濟問題 (12) 精神疾病 (13) 性議題(如性認同) (14) 其他：_____
12. 以下想了解您對個案議題的評估，請您分別於適當的數字上圈選。
您認為造成此個案困擾的核心議題與_____(以下題目)_____的相關程度為何？
(1) 追求個人的獨立自主和自足，例如表達自我想法或促進個人目標。
• 完全無關， 少部分相關 *f* 中等相關 „ 大部分相關 ... 完全相關
(2) 維持與他人和諧融洽的關係，例如表現適合自己身分的行為。
• 完全無關， 少部分相關 *f* 中等相關 „ 大部分相關 ... 完全相關

第一部分 想要瞭解您與個案在這次晤談的互動情況。請根據您的真實感受與想法，圈選適當的數字。

	一點也不	1	2	3	4	5	6	7	非常符合
此案主傾吐事實		1	2	3	4	5	6	7	
此案主傾吐內在感受及情緒		1	2	3	4	5	6	7	
我瞭解此案主		1	2	3	4	5	6	7	
我關切此案主的感受及情緒		1	2	3	4	5	6	7	
我的談話引起案主的共鳴		1	2	3	4	5	6	7	

第二部分 想要瞭解您和此案主晤談的工作情況。請依據您真實的感受或想法作答，圈選適當的數字。

	從未	甚少	偶爾	有時	時常	經常	總是
1. 對於改善此案主的狀況所要做的事，案主和我的看法相同。	1	2	3	4	5	6	7
2. 此案主和我都相信，在會談過程中所做的事情是有用的。	1	2	3	4	5	6	7
3. 我相信此案主喜歡我。	1	2	3	4	5	6	7
4. 在會談過程中，此案主不了解我努力想要達成的事情。	1	2	3	4	5	6	7
5. 我相信我有能力幫助此案主。	1	2	3	4	5	6	7
6. 此案主和我正朝著共同的目標而努力。	1	2	3	4	5	6	7
7. 我覺得此案主可以感受到我對他(她)的尊重。	1	2	3	4	5	6	7
8. 對於此案主重要且需要處理的事情，我們有一致的看法。	1	2	3	4	5	6	7
9. 此案主和我之間彼此信任。	1	2	3	4	5	6	7
10. 對於此案主真正的問題，他(她)和我有著不同的看法。	1	2	3	4	5	6	7
11. 對於什麼樣的改變將有利於此案主，我們已經建立了共識。	1	2	3	4	5	6	7
12. 此案主相信我們一起處理問題的方法是正確的。	1	2	3	4	5	6	7

第三部分 想要了解文化對人的信念有哪些影響。請您表達對下列每句話的看法，圈選適當的數字。

	非常不同意	1	2	3	4	5	6	7	非常同意
1. 我相信人應該努力實現自己的志趣。		1	2	3	4	5	6	7	
2. 我相信人應該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		1	2	3	4	5	6	7	
3. 我相信人應該有自己的理想，並努力實現。		1	2	3	4	5	6	7	
4. 我相信人在任何處境中，都應該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		1	2	3	4	5	6	7	

5. 我相信我們應該直接面對環境的挑戰。	1	2	3	4	5	6	7
6. 我認為自己的目標一旦確定，就應全力以赴。	1	2	3	4	5	6	7
7. 我相信幸福的人生要靠自己努力。	1	2	3	4	5	6	7
8. 我相信人應該追求自己的福祉。	1	2	3	4	5	6	7
9. 我認為在人際互動中應該表達自己的感受。	1	2	3	4	5	6	7
10. 我認為團體生活中，人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1	2	3	4	5	6	7
11. 我認為人要自立自強，自給自足。	1	2	3	4	5	6	7
12. 我相信人際溝通應該直接。	1	2	3	4	5	6	7
13. 我認為我們應該在公眾場合中發表自己的意見。	1	2	3	4	5	6	7
14. 我認為人應該獨特且與眾不同。	1	2	3	4	5	6	7
15. 我認為即使是家人，也應該保持各自的獨立性。	1	2	3	4	5	6	7
16. 對我而言，自我認同應該不受他人影響。	1	2	3	4	5	6	7
17. 我相信與人相處應該直接了當。	1	2	3	4	5	6	7
18. 我認為人生的重要決策不應受到親友的影響。	1	2	3	4	5	6	7
19. 我相信人應該不惜一切代價，去達成自己的目標。	1	2	3	4	5	6	7
20. 我認為在任何情境中，都應該堅持自己的想法。	1	2	3	4	5	6	7
21. 我認為人在外面和在家裡應該一樣。	1	2	3	4	5	6	7
22. 我認為家庭是我們自我的本源。	1	2	3	4	5	6	7
23. 我認為團體的成功比個人的成就更重要。	1	2	3	4	5	6	7
24. 人際互動中應照顧到別人的面子。	1	2	3	4	5	6	7
25. 一旦成為團體的一員，就應該努力適應團體的要求。	1	2	3	4	5	6	7
26. 我認為人應該在團體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	1	2	3	4	5	6	7
27. 當個人與團體發生衝突時，我認為應以團體為先。	1	2	3	4	5	6	7
28. 我認為保持團體和諧很重要。	1	2	3	4	5	6	7
29. 為了所屬團體的利益，我們應該犧牲自己的私利。	1	2	3	4	5	6	7
30. 我相信家人應是生命共同體。	1	2	3	4	5	6	7
31. 我認為家庭的榮辱攸關我的自我認同。	1	2	3	4	5	6	7
32. 我認為人應該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	1	2	3	4	5	6	7
33. 我認為應該視場合或情境的不同，表現適當的行為。	1	2	3	4	5	6	7
34. 我認為親近的人，對個人自我而言是重要的一部分。	1	2	3	4	5	6	7
35. 我認為應該視自己的身份與角色，表現適當的行為。	1	2	3	4	5	6	7
36. 團體的歸屬對我的自我認同很重要。	1	2	3	4	5	6	7
37. 進退有據，是我做人的重要準則。	1	2	3	4	5	6	7
38. 我認為親密關係會反應一個人的自我認同。	1	2	3	4	5	6	7
39. 為維持人際和諧，應採迂迴溝通的方式。	1	2	3	4	5	6	7
40. 我認為在作決定前，應先考慮別人的觀點與反應。	1	2	3	4	5	6	7
41. 對親近的人我會有很強的認同感。	1	2	3	4	5	6	7
42. 我的自我認同來自自我的社會身份。	1	2	3	4	5	6	7

研究說明函

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生江曉珍，非常感謝您願意參與本研究，提供您寶貴的時間與經驗為本研究蒐集資料！本研究希望了解您在晤談中的經驗，作為提升心理治療專業品質與教育訓練之參考，您的填答對於本研究有極大的貢獻。

以下是填寫問卷的相關說明，請您在填答前務必詳閱，謝謝！

1. 本問卷**不會佔用您太多的時間**，只要在本次晤談結束後利用**5~10分鐘**填寫。問卷**採不記名的方式**，並只作為學術研究之用，**您的個人資料絕對保密**，請您放心。
2. 請您於本次晤談完後，**立即填寫**問卷，作答完放入信封密封，再交由與您晤談的心理專業人員一併寄回即可。原先裝問卷的透明資料夾敬請留下，為感謝您參與本研究之回饋，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3. 本研究需要收集大量的資料，因此您的參與相當重要。但若您堅持不願意，我們亦尊重您的意願，**您的諮商權益絕對不會因為是否參加本研究而受到任何的影響，請您放心！**
4. 請在閱讀每一部分的作答說明之後再填答。**題目沒有正確答案，只要依照您的真實感受選擇最適當的答案即可，填答時不需要思考太久，通常您第一個想到的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
5. 作答完後，請您務必再檢查一次，**確認每一題都有作答。**

再次感謝您的參與！

若您有任何問題或想瞭解研究結果，歡迎您與我聯絡。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

指導教授 王麗斐教授

研究生 江曉珍敬上

聯絡方式：09*****

100年11月18日

當事人版 編號：

晤談經驗問卷

【基本資料】

1. 晤談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填答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本次晤談為第____次晤談。
2. 性別：(1) 男 (2) 女，實足年齡：_____歲
3. 教育程度：(1) 無 (2) 國小畢 (3) 國中畢 (4) 高中職畢 (5) 高中職就讀中
(6) 專科畢 (7) 專科就讀中 (8) 大學畢 (9) 大學就讀中
(10) 研究所(含以上)畢 (11) 研究所(含以上)就讀中。
4. 職業：(1) 軍 (2) 公 (3) 教 (4) 商/服務業 (5) 工
(6) 家管 (7) 自由業 (8) 學生 (9) 待業 (10) 其他：_____

第一部分 想要瞭解您與心理專業人員在這次晤談的互動情況。請根據您的真實感受與想法，圈選一個最適當的數字。

	一點也不						非常符合
我傾吐事實	1	2	3	4	5	6	7
我傾吐內在感受及情緒	1	2	3	4	5	6	7
他(她)瞭解我	1	2	3	4	5	6	7
他(她)關切我的感受及情緒	1	2	3	4	5	6	7
他(她)的談話引起我的共鳴	1	2	3	4	5	6	7

第二部分 想要瞭解您和心理專業人員晤談的工作情況。請依據您真實的感受或想法作答，圈選一個最適當的數字。

	從未	甚少	偶爾	有時	時常	經常	總是
1. 他(她)和我對改進我問題的做法看法相同。	1	2	3	4	5	6	7
2. 和他(她)談話，讓我學到新的方法來看自己的問題。	1	2	3	4	5	6	7
3. 我相信他(她)喜歡我。	1	2	3	4	5	6	7
4. 他(她)不了解在會談過程中，我努力想要達成的事情。	1	2	3	4	5	6	7
5. 我相信他(她)有能力幫助我。	1	2	3	4	5	6	7
6. 我和他(她)正朝著共同的目標而努力。	1	2	3	4	5	6	7
7. 我覺得他(她)尊重我。	1	2	3	4	5	6	7
8. 我認為重要且需要處理的事情，他(她)和我的看法相同。	1	2	3	4	5	6	7
9. 他(她)和我之間彼此信任。	1	2	3	4	5	6	7
10. 對於什麼是我真正的問題，他(她)和我的看法不同。	1	2	3	4	5	6	7
11. 我和他(她)對如何改變對我有利的看法相同。	1	2	3	4	5	6	7
12. 我相信他(她)處理我的問題的方法是正確的。	1	2	3	4	5	6	7

第三部分 想要瞭解自從接受晤談後，您對自己與生活的感受與想法。請根據您真實的情況，勾選一個R最適當的選項。

- | | | | | |
|--------------|---------------------------------------|--------------------------------------|---|--|
| 1. 我覺得自己 | <input type="checkbox"/> • 是在混日子 | <input type="checkbox"/> , 喜歡現在的生活 | <input type="checkbox"/> f 非常喜歡現在的生活 | <input type="checkbox"/> „ 熱愛現在的生活 |
| 2. 我覺得生命 | <input type="checkbox"/> • 沒有意義、沒有目標 | <input type="checkbox"/> , 有意義、有目標 | <input type="checkbox"/> f 很有意義、很有目標 | <input type="checkbox"/> „ 非常有意義、非常有目標 |
| 3. 我的工作 | <input type="checkbox"/> • 不能帶給我成就感 | <input type="checkbox"/> , 偶而能帶給我成就感 | <input type="checkbox"/> f 常常能帶給我成就感 | <input type="checkbox"/> „ 總是能帶給我成就感 |
| 4. 我過去的生活 | <input type="checkbox"/> • 並沒有特別愉快的記憶 | <input type="checkbox"/> , 有一些事情是愉快的 | <input type="checkbox"/> f 所有事情似乎都是愉快的 | <input type="checkbox"/> „ 所有事情都是非常愉快的 |
| 5. 我覺得自己 | <input type="checkbox"/> • 不快樂 | <input type="checkbox"/> , 快樂 | <input type="checkbox"/> f 相當快樂 | <input type="checkbox"/> „ 快樂得不得了 |
| 6. 我對現在生活中 | <input type="checkbox"/> • 沒有任何事感到滿意 | <input type="checkbox"/> , 一些事感到滿意 | <input type="checkbox"/> f 大部分的事感到滿意 | <input type="checkbox"/> „ 每一件事都很滿意 |
| 7. 我覺得自己 | <input type="checkbox"/> • 沒有活力 | <input type="checkbox"/> , 相當有活力 | <input type="checkbox"/> f 非常有活力 | <input type="checkbox"/> „ 有無窮的活力 |
| 8. 我對未來 | <input type="checkbox"/> • 不樂觀 | <input type="checkbox"/> , 有些樂觀 | <input type="checkbox"/> f 樂觀 | <input type="checkbox"/> „ 充滿了希望 |
| 9. 喜悅興奮的感覺，我 | <input type="checkbox"/> • 從未有過 | <input type="checkbox"/> , 有時會有 | <input type="checkbox"/> f 經常會有 | <input type="checkbox"/> „ 隨時都有 |
| 10. 對生命的意義，我 | <input type="checkbox"/> • 不能理解 | <input type="checkbox"/> , 偶爾能理解 | <input type="checkbox"/> f 經常能理解 | <input type="checkbox"/> „ 總是能理解 |

第四部分 想要了解文化對人的影響。請您表達對下列每句話的看法，「圈選」合適的數字。

- | | 非常不同意 | 1 | 2 | 3 | 4 | 5 | 6 | 7 | 非常同意 |
|-----------------------------|-------|---|---|---|---|---|---|---|------|
| 1. 我相信人應該努力實現自己的志趣。 | | 1 | 2 | 3 | 4 | 5 | 6 | 7 | |
| 2. 我相信人應該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 | | 1 | 2 | 3 | 4 | 5 | 6 | 7 | |
| 3. 我相信人應該有自己的理想，並努力實現。 | | 1 | 2 | 3 | 4 | 5 | 6 | 7 | |
| 4. 我相信人在任何處境中，都應該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 | | 1 | 2 | 3 | 4 | 5 | 6 | 7 | |
| 5. 我相信我們應該直接面對環境的挑戰。 | | 1 | 2 | 3 | 4 | 5 | 6 | 7 | |
| 6. 我認為自己的目標一旦確定，就應全力以赴。 | | 1 | 2 | 3 | 4 | 5 | 6 | 7 | |
| 7. 我相信幸福的人生要靠自己努力。 | | 1 | 2 | 3 | 4 | 5 | 6 | 7 | |
| 8. 我相信人應該追求自己的福祉。 | | 1 | 2 | 3 | 4 | 5 | 6 | 7 | |
| 9. 我認為在人際互動中應該表達自己的感受。 | | 1 | 2 | 3 | 4 | 5 | 6 | 7 | |
| 10. 我認為團體生活中，人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 | 1 | 2 | 3 | 4 | 5 | 6 | 7 | |

- | | | | | | | | |
|-----------------------------|---|---|---|---|---|---|---|
| 11. 我認為人要自立自強，自給自足。 | 1 | 2 | 3 | 4 | 5 | 6 | 7 |
| 12. 我相信人際溝通應該直接。 | 1 | 2 | 3 | 4 | 5 | 6 | 7 |
| 13. 我認為我們應該在公眾場合中發表自己的意見。 | 1 | 2 | 3 | 4 | 5 | 6 | 7 |
| 14. 我認為人應該獨特且與眾不同。 | 1 | 2 | 3 | 4 | 5 | 6 | 7 |
| 15. 我認為即使是家人，也應該保持各自的獨立性。 | 1 | 2 | 3 | 4 | 5 | 6 | 7 |
| 16. 對我而言，自我認同應該不受他人影響。 | 1 | 2 | 3 | 4 | 5 | 6 | 7 |
| 17. 我相信與人相處應該直接了當。 | 1 | 2 | 3 | 4 | 5 | 6 | 7 |
| 18. 我認為人生的重要決策不應受到親友的影響。 | 1 | 2 | 3 | 4 | 5 | 6 | 7 |
| 19. 我相信人應該不惜一切代價，去達成自己的目標。 | 1 | 2 | 3 | 4 | 5 | 6 | 7 |
| 20. 我認為在任何情境中，都應該堅持自己的想法。 | 1 | 2 | 3 | 4 | 5 | 6 | 7 |
| 21. 我認為人在外面和在家裡應該一樣。 | 1 | 2 | 3 | 4 | 5 | 6 | 7 |
| 22. 我認為家庭是我們自我的本源。 | 1 | 2 | 3 | 4 | 5 | 6 | 7 |
| 23. 我認為團體的成功比個人的成就更重要。 | 1 | 2 | 3 | 4 | 5 | 6 | 7 |
| 24. 人際互動中應照顧到別人的面子。 | 1 | 2 | 3 | 4 | 5 | 6 | 7 |
| 25. 一旦成為團體的一員，就應該努力適應團體的要求。 | 1 | 2 | 3 | 4 | 5 | 6 | 7 |
| 26. 我認為人應該在團體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 | 1 | 2 | 3 | 4 | 5 | 6 | 7 |
| 27. 當個人與團體發生衝突時，我認為應以團體為先。 | 1 | 2 | 3 | 4 | 5 | 6 | 7 |
| 28. 我認為保持團體和諧很重要。 | 1 | 2 | 3 | 4 | 5 | 6 | 7 |
| 29. 為了所屬團體的利益，我們應該犧牲自己的私利。 | 1 | 2 | 3 | 4 | 5 | 6 | 7 |
| 30. 我相信家人應是生命共同體。 | 1 | 2 | 3 | 4 | 5 | 6 | 7 |
| 31. 我認為家庭的榮辱攸關我的自我認同。 | 1 | 2 | 3 | 4 | 5 | 6 | 7 |
| 32. 我認為人應該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 | 1 | 2 | 3 | 4 | 5 | 6 | 7 |
| 33. 我認為應該視場合或情境的不同，表現適當的行為。 | 1 | 2 | 3 | 4 | 5 | 6 | 7 |
| 34. 我認為親近的人，對個人自我而言是重要的一部分。 | 1 | 2 | 3 | 4 | 5 | 6 | 7 |
| 35. 我認為應該視自己的身份與角色，表現適當的行為。 | 1 | 2 | 3 | 4 | 5 | 6 | 7 |
| 36. 團體的歸屬對我的自我認同很重要。 | 1 | 2 | 3 | 4 | 5 | 6 | 7 |
| 37. 進退有據，是我做人的重要準則。 | 1 | 2 | 3 | 4 | 5 | 6 | 7 |
| 38. 我認為親密關係會反應一個人的自我認同。 | 1 | 2 | 3 | 4 | 5 | 6 | 7 |
| 39. 為維持人際和諧，應採迂迴溝通的方式。 | 1 | 2 | 3 | 4 | 5 | 6 | 7 |
| 40. 我認為在作決定前，應先考慮別人的觀點與反應。 | 1 | 2 | 3 | 4 | 5 | 6 | 7 |
| 41. 對親近的人我會有很強的認同感。 | 1 | 2 | 3 | 4 | 5 | 6 | 7 |
| 42. 我的自我認同來自自我的社會身份。 | 1 | 2 | 3 | 4 | 5 | 6 | 7 |

附錄三 獨立我與互依我量表使用授權同意書

使用授權同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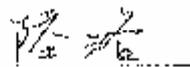
茲同意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諮商心理學組碩士生江麗珍，基於研究需要，在王麗聖教授指導下，於「台灣諮商學界」作者與個案在雙文化自我概念的契合性對治療效能的影響」碩士論文中，使用本人所編製之「獨立我與互依我量表」(IIS)。

本同意書僅限於同意研究者將本量表作為學術研究之用，用於論文適當處註明發表出處，以符合學術著作之規定。研究者於論文口試通過後，請寄贈修訂版論文一份。 特此函覆。

此致

江麗珍小姐

同意同意人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錄四 修訂羅徹斯特社會互動量表使用授權同意書

使用授權同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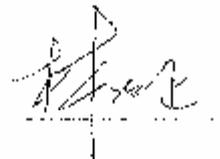
茲同意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商心理學組碩士生江曉珍，基於研究需要，在王麗豐教授指導下，於「台灣籍與專業工作者與個體在雙文化自我概念的契合性對治療效果的影响」碩士論文中，使用本人所編製之「修訂羅徹斯特社會互動量表 (Rochester Interaction Record, RIR)」。

本同意書僅限於同意研究者將本量表作為學術研究之用，縮於論文送交暨雜誌刊登未出版，以符合學術著作之規定。研究者於論文出版後，請寄贈修訂版論文一份。特此函覆。

此致

江曉珍小姐

王麗豐 謹啟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錄五 中國人幸福感量表使用授權同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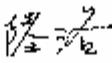
使用授權同意書

茲同意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諮商心理學組碩士生江曉珍，基於研究需要，在王淑姿教授指導下，於「台灣諮商專業工作者與個案改變文化自殺概念的契合性與治療效能的影響」碩士論文中，使用本人所編製之「中國人幸福感量表 (CUI)」。

本同意書僅限於同意研究者將本量表作為學術研究之用，論於論文發表處註明量表出處，以符合學術著作之規定。研究者於論文口試通過後，請寄贈後訂版論文一份。尚此函覆。

此致

江曉珍小姐

同意人  _____

中華民國一〇五年十二月十二日